新建設

第一卷第十二期

私營資本主義經濟　北大經濟系系會
工商業政策　薛暮橋
北大的政治課　鄧華
中國語言學的新方向　羅常培
漫談山水畫　徐悲鴻
師大改進工作的重點——課程　黎錦熙
從教育前途看師大改造　董渭川
師大改制的思想教育意義　焦菊隱
天津私營企業勞資協商會議的示範　張高峰
台灣農業資源與其發展　王政
繁榮着的人民民主國家　斐凌譯
蘇聯國民經濟計劃的任務與工作　蒲希平譯
浙江支前運動　紹聲
石家莊人民法院監獄參觀記　夏楚
解放以來的上海經濟動態（續）　戎文佐

新建設雜誌社發行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帝國主義供給的粮食、燃料、工業原料等，已經逐漸擺脫依賴，採取了自力更生，例如八月份上海粮價高漲時，在人民政府努力下，東北大米大力支援上海，使吃慣洋米的上海市民，第一次嘗到了東北大米的滋味，最近上海米價又有波動之象，東北大米五萬噸又適時運滬，基本上解決了上海的粮荒，緩和了米價上漲的幅度，工業原料方面，如棉紡織業需要的原棉，毛紡織業需要的羊毛，造紙工業所需的木漿，電工器材所需的膠木粉，捲烟工業所需的紙圈和煙葉等，過去都全部或大部依靠帝國主義國家的供給，但是在人民政府鼓勵和援助下，原棉方面，公私營紗廠已成立了一個聯合購棉委員會，向內地產棉地區採購國棉，國營中紡紗廠各廠已經將部份紡細紗的紗錠，改紡粗紗，使能適應國棉性能，毛紡織業需要的羊毛，公私營毛紡廠已在西北蘭州方面着手聯合採購國產羊毛，以代替沃州羊毛，造紙工業所需的木漿，也有經營造紙工業人士設計自造。電工器材業所需的膠木粉自私營公信電器廠試製絕緣性膠木粉成功後，已有二十五家私營膠木廠共同投資開設膠木粉製造廠，捲煙工業所需紙圈已逐漸全部代以國產民豐紙圈，煙葉方面，上海烟廠已逐漸改以國產許昌烟葉代替美葉，在燃料方面，上海最大發電廠上海電力公司在解放後經政府大力扶助，正努力擺脫燃料的對外依賴性，把原來燃油的七座鍋爐，陸續改裝燃煤設備，該公司發電廠第十七號燃油鍋爐，已經於近日全部改裝完竣，元月六日後就可正式試用，第廿八號鍋爐經過經常的整修後，亦可於七日修復使用。預計從七號起，該公司發電總量可達十四萬瓩、為解放後的新高峯，據該公司發言人說：這個發電量，供應目前工業的耗電量，已綽有餘裕，以用電量最大的棉紡織工業而言，如果開足全部紗錠，用電總量亦不到六萬瓩，此外該公司其他各號鍋爐改裝工程，第十九號鍋爐可在一月十五日完成，第十四，十六，廿三等號鍋爐，估計可在四月十五日完竣，尚餘廿一，廿五貳號鍋爐，也可在六月十五日完成，各項改裝工程完成後，該公司的發電量，預料可恢復解放前的最高供應量。

金融業的改造和整肅

五月廿七日上海解放以後，人民政府即開始接管原來國民黨官僚資本所屬中，中、交、農、二局，一庫及江蘇、蘇農、浙江、台灣、上海五個省市銀行，以及以私營姿態出現的山西裕華，亞東、廣東等銀行，和監督整頓改組中實、四明、通商、新華、國貨等五家官商合營銀行，使原來屬於四大家族與反動官僚資本所有，為反動官僚統治階級服務的金融機構，轉變為人民服務和為人民所有，同時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在上海解放後三天的五月三十日即正式宣告成立，七個月來人民銀行在澄清舊的金融機構，建立新的金融秩序，醫治舊的百孔千瘡的經濟，復甦癱瘓的工商企業，恢復和發展城鄉物資交流，協助交通運輸事業各方面，都有了重大的成就。據解放日報去年十二月十七日載：「本市國家銀行半年來的扶植生產工作」報告中，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半年來對於公用事業和公私營生產事業的放款，都對恢復和發展生產，起了重大的效果，據該報告統計此種放款情況如下：（單位萬元）「公用事業放款餘額」

六月份	一八，二五一一
七月份	七六，四四五〇
八月份	一〇八，六二八一
九月份	一〇八，四四四一
十月份	一一五，一七〇八
十一月份	二八八，五八九八

動力是一切生產事業之毌，而上海又是一個近六百萬人口的大都市，該行的公用事業貸款，保證了全市市民在水電，交通方面的供應，減輕了人民和生產事業在這一方面的負担，給工商業的恢復和發展準備了充分的前提，在反封鎖鬥爭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此外該行業務部及中國銀行上海分行業務部對生產事業的貸欵亦逐有進展，據該報告該項貸欵半年來統計如下：

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業務部貸欵總額（單位萬元）

	公營事業	私營事業	合計
六月份	六，九四二九	一九，八三五四	二二，七七八三
七月份	二五，〇三九五	七二，三七九八	九七，四一九三
八月份	三六，八七九一	一四二，四〇八四	一七九，二八七四
九月份	四四，五四七二	二一八，五一一四	二六三，〇五八六
十月份	七三，三二五七	二九一，九一二九	三六五，二三八六
十一月份	二三三、一二九三	七二八，五五五九	九六一，六八五二

（下轉廿六頁）

新建設 雙周刊

第一卷·第十一期

負責人 費青

編輯委員（以姓氏筆劃為序）
向達 吳晗 李廣田
袁翰青 張志讓 費青
費孝通 聞家駟 雷潔瓊
鄭昕 樊弘 潘靜遠
錢偉長 錢端升 嚴景耀

董事 王艮仲 費振東 潘祖丞

出版者 新建設雜誌社
社址：北京東長安街南夾道六十二號
電話：（五）五九六六
上海辦事處：上海(5)乍浦路景林廬十四號
電話：四〇六九六

零售：每冊一千五百元

訂閱：
三個月六期 八千五百元
一卷十二期 一萬六千元
二卷廿四期 三萬元
（掛號郵資另加）

東北區 零售每冊東北幣三萬元

訂閱：
一卷十二期 東北幣三十二萬元
二卷廿四期 東北幣六十萬元
東北代訂處：瀋陽東北新華書店總店郵購科

北平市軍管會登記證新字第五十號
華北郵政總局登記證第七十二號
華北郵政總局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值出售，社會主義的商品價值，工廠計算好後，到市場上就是按這個價值用貨幣數量表示而出售，很明顯的，市場法則在新中國的私營資本主義經濟裡，其本質沒有變。

（二）特殊性——由私營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經濟關係去了解，這可分兩方面來講：

甲：新中國的私營資本主義經濟的運動，是在國營經濟領導下運動的：這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經濟獨自決定其運動有很明顯的不同；共同綱領第三十條規定：「凡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事業，人民政府應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並扶助其發展」，但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尤其是在帝國主義時期，情形却完全相反，資本主義經濟偏喜向不利而且有害於國計民生的軍火工業，高貴奢侈品工業發展，因獨佔資本家的戰爭狂和享受狂使得這兩種工業的利潤最高 ，但在新民主主義中國的私營經濟，若要向這方面發展，就要受到限制，限制是領導的消極的一面，積極方面，還要鼓勵並扶助其向有利於國計民生方面發展，茲就國家經濟對私營經濟的領導方面分作下列四點來講：

（1）私營經濟發展的部門：那些部門鼓勵並扶助私營資本主義的發展，那些祇允其少量發展，那些限制其發展。國家有調劑的權力，在今天，凡有利於國計民生的，都容許其發展，但發展要有原料，市場，銷路需求的輕重緩急……等條件，國家經濟可從進出口數量，關稅，稅收，銀行放欵等政策來行使調劑作用，這就是一種具體的領導。

（2）勞動待遇：國家從勞動待遇領導私營經濟的發展，可分兩方面講，一方面是國家給勞工權利，使勞工有權向資本家提出要求：按照各地各業的具體情況，協議出公平合理的勞動待遇，這不僅對勞工有利，而且具體體現了勞資兩利的政策，可以減少勞資糾紛，對國家及私營資本主義均有利。另一方面是國營經濟以身作則，將國營企業中的勞動待遇定出一適當標準，以作為私營資本主義經濟的參考，解放城市初期公私企業間的工資很不一致，上海等地的部分私營資本主義工廠的工資，曾一度提得過高，資本家抱着吃完關廠的態度，後經國營企業的勸說，工人即自動減低，現在各城市本身間的勞動待遇已漸趨一致，這些事實中就可看到國營經濟的領導作用。

（3）價格政策：國營經濟對私營資本主義經濟的第三方面領導，體現在價格政策上，因私營資本主義經濟，其商品必需通過市場價格才能實現其價值，因此，國營經濟可通過市場價格而加以領導，若市場上某種商品過多了，國營經濟就可有計劃地壓低其價格，反之，就主動的提高價格，例如：上海煤量不夠用，國營經濟就將上海煤價提高至北京的六倍，以鼓勵華東區煤的生產，又如為着原棉不夠用，就將原棉價每斤主動提高到八——十斤小米的價格，以鼓勵棉花的生產，同時亦用以給私營棉紡業的利潤以限制，故國營經濟可以用提高和壓低市場價格的方法，領導（包括獎勵和限制）私營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4）稅收政策：商業稅重于工業稅 輕工業稅重于重工業，輕工業中必需的生活資料輕于不必需的，商業中與社會的生產密切有關的商業輕于與生產關係小的，例如與生產關係極小的消費性的茶館酒樓等商業稅，就要比與生產有密切關係的五金商業為重，故國家可通過稅收的政策，領導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

由于以上四方面的領導，使得資本主義經濟法則，在新中國私營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中產生了特殊性，使其發展部門不能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自由放任，而祇能向有利于國計民生的部門發展，使其工資鐵律因受國營經濟在勞動待遇方面的領導而受到限制，不再像資本主義社會裡那樣祇有資方有利，勞方無利，而是勞資兩利，使其價格法則，在價值的基礎上，不僅由盲目供需決定，而還得加上國營經濟的調劑，使其稅收政策不再是單獨服從資本家的利益，而是服從于全體人民的利益。這樣就保證了私營資本主義的發展，必能符合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大目標。

乙：新民主主義中的私營資本主義向着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向發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前期的資本主義（即工業資本主義），或自由資本主義，一定向着獨佔資本主義（即金融資本主義）發展，但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裡，由于國營經濟的有力領導，就改變了這種私營資本主義的內在法則，而使其向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在今日的東北，由於國營經濟的有力領導，許多私營資本主義經濟都要求與國營經濟合作而成為國家資本主義，例如東北的小礦山和林場，大半都已發展為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因為私營資本主義經濟認識到必需和國營經濟合作，才能兩利。

國家資本主義是私營資本主義向國營經濟發展的過渡形式，它使私營資本主義經濟更靠近于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由于這種私營資本主義發展方向的特殊性質，因而減低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對立性，使私營資本主義不再走向垂死的獨佔資本主義的老路，而走向和平轉變為社會主義的新路，這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都是有利的。

發展的現實性

最後，說到私營資本主義發展的現實性，因為有些同學對私營資本主義經濟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都了解了，也明白新中國允許私人資本主義發展，但他們却舉出一些私營百貨商店對貿易公司的訴苦說：「國營貿易公司的發展，就妨害私營百貨店的發展」（實質上是私營商店的利潤太高了），因此，他們說若允許私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而它却不可能發展，那麼私營資本主義經濟還是不能發展今準對這問題分兩點來說：

甲：由於國營經濟發展的不完整性：國營經濟是五種經濟中最進步的生產方式，它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它有計劃，無勞資對立，無浪費現象，故這種進步的生產方式，一定壓倒較落後私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以，假若國營經濟在各個經濟部門都發展完整了，那麼，即使允許私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它也就不能發展了，蘇聯新經濟政策的後期列寧提出「誰戰勝誰」的口號，等到國營經濟發展完整，就可用政治力量來把私營資本主義經濟消滅，但在今天中國，國營經濟祇有在鎖鑰工業和紡織業佔了一半，故各部門都有私營資本主義發展的現實性，國營經濟要發展到完整，還是相當長期的將來的事情。解放後各城市，經過極短的時期，私營資本主義就恢復和發展起來，就是最好的證明。

乙：小生產的廣大存在，產生着資本主義：目前五種經濟內，個體經濟雖然落後，但數量卻極龐大，據一九三三年——三四年的統計：近代工業生產祇佔12.3%，小生產佔 87.7 %，經過這十多年的戰爭。大工業生產遭受很大破壞，故目前祇佔10 %左右，小生產佔90%，小生產是資本主義發展滋長的良好基地，小生產發展的結果，遺成了階級分化，分化出資產階級來，在新民主主義前期，因合作社還不普遍，就必不可免地，在鄉村中分化出新富農 ，在城市裡分化出資產階級。另一方面，小商品生產者當國營經濟還未用合作經濟去把他們團結和組織起來時，他們是自由市場的俘虜，亦即商業資本家的俘虜，受資本家的剝削，營養了私人資本主義，所以廣大小生產者的存在，是私營資本主義發展的物質基礎，在相當長期的將來，合作經濟代替了個體經濟，也就堵住了私營資本主義在這一基礎上的發展、

9200
0210.10

私營資本主義經濟

——一般性、特殊性、及發展的現實性

北大經濟系系會

我們近來討論新中國的經濟結構和工商業政策時，對私營資本主義經濟，發生很多不同的意見。有同學認為既是私營資本主義，則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經濟法則，在新民主中國的私營經濟中，也完全可以適用。有同學則恰與此意見相反，認為私營資本主義經濟既是在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領導下發展的，那麼，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法則，就完全失其作用了。所以新中國的私營資本主義經濟有其特殊的經濟法則，完全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法則不同。在討論工商業政策時，有同學提出這樣的問題：國營經濟和私營經濟的性質是完全不同，互相矛盾的，兩種經濟如何能同時發展呢？故共同綱領中雖說鼓勵和扶助私營經濟事業的發展，但私營資本主義經濟卻無發展的現實性。這些問題據說在別的學校同學中也存在，因此把我們的看法發表出來，希望大家不吝指正。

一般性和特殊性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經濟法則是主導的法則，但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資本主義經濟祇是五種經濟成分之一，故其法則就不是主導的法則，它不能代表全社會的經濟法則，它不但不能支配其他各種經濟法則，相反的，它要受其他各種經濟法則的支配和影響，因此，我們可知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經濟法則有和資本主義社會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即有其一般性和特殊性，這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所沒有的　茲就其一般性和特殊性加以說明：

（一）一般性——由私營資本主義的本質上去分析

甲：勞資對立：國營企業中，由於國營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工人和廠方已不是勞資關係而是公私關係，故沒有對立的性質，但在私營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方佔有生產資料，勞方出賣勞動力，勞資對立在本質上沒有改變，勞資兩利的政策，祇是在價值的分配上，使資方取得合法利潤，勞方取得足夠的生活資料，故勞資兩利的政策並未改變勞資兩個階級的對立性。今天用簽訂集體合同，即將有關工資，工時，勞動紀律，解雇，勞工福利等勞動條件，具體寫成合同，勞資雙方都遵照實行的辦法，也就是為解決勞資對立間的糾紛，使階級鬥爭在人民政府的領導下，遵照法定的鬥爭方式和範圍，更能獲得合理的有步驟的發展，但這裡所說的「法定的鬥爭方式和範圍」，和第二國際所標榜來欺騙工人階級的「合法鬥爭」沒有絲毫相同之處，因第二國際所說的法是資產階級國家的法律，合法就是合資產階級利益，向資產階級投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法律是保護勞動人民的，遵照法定的鬥爭方式，就是保護勞動人民的利益，例如北京初解放時，曾有部分工人向資方提出過高的工資要求，致妨礙了勞資兩利的政策，甚至有個別工人提出封門分物的，這些都是違反政府法令政策，亦即違反工人階級長遠利益的行為，所以，資本主義中之勞資對立，雖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基本上沒有變，但鬥爭的目的和方式卻不同了。今天勞資鬥爭的目的是為了勞資兩利，為了團結和發展生產，鬥爭的方式必需遵照國家的法令和政策，例如用集體合同和人民代表會議等方式來解決勞資對立間的糾紛。

乙：剝削關係：承認資本家存在，就得允許其剝削，故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剝削關係，在新中國的私營資本主義經濟中仍然存在，這種資本主義剝削，在目前不但對資本家，即對勞動人民也是有利的，但資本主義各國的剝削中，常常帶有封建性的超經濟剝削，剝削率是大得驚人的，例如北京解放前，很多小型工廠存在着對工人的打罵制，工時平均超過十一小時，所得實際工資，因受通貨膨脹影響，常常連個人的最低限度生活都維持不了，更談不上維持家庭，電車工人在解放前的幾個月，每月工資祇能買十多斤棒子麵，故在新中國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中，其剝削率必然因執行勞資兩利和廢除封建超經濟剝削等政策而比資本主義各國及舊中國為低，但工人在生活改善，及階級覺悟提高後，勞動積極性必然高漲，就再無罷工怠工等現象發生，所以雖然剝削率低，但資本家所獲得的剝削數量（即利潤數量）卻反可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大，例如北京市解放後的窰業、鐵工業、造紙業、麵粉業……等，雖然工資提高，剝削率減低，但由於工人積極生產，資本家反倒比解放前獲利，各業都有顯著的發展，不但舊的都擴大了規模，且有新工廠開設，如北京私營機器鐵工廠由解放前七百四十五廠增至一千零一廠，職工較解放前增加一倍。窰業由三十九家增至四十一家。

丙：生產的盲目性：資本主義經濟的價值法則，資本家為獲取利潤，而不是為人民謀福利而生產，造成了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生產的盲目性，這種生產的盲目性，在新中國的私營資本主義經濟中，雖有國營經濟的領導，但當私人資本主義還未轉變為國家資本主義時，並不能克服這種盲目性，因為祇有當資本主義發展到獨佔資本主義時，即托拉斯佔統治地位時，國家政權一轉變，國家就可對所有的生產機構實行有計劃的監督生產，但今天，我國的私營資本主義是中、小的，分散的，還未形成集中的獨佔的組織，故國家經濟在今天尚無此種能力監督全國的私營資本主義的生產，故今天對私營資本主義生產的盲目性還不能克服，而且前期資本主義需通過這種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展開自由競爭，向前以最快速度發展，故只可漸漸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加強對私營資本主義的監督和領導，慢慢的引導它服從國家的生產計劃。例如北京解放後，私營肥皂和針織品工業，因部隊和鄉間的需要激增，價格上漲，生產者可獲豐厚利潤，於是盲目生產，致肥皂和針織物充斥市場而銷不出去，價格因此大跌，倒閉了多家肥皂廠和針織廠，故私營資本主義生產的盲目性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將相當長期的存在，但隨着私人資本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化的發展，而減少此種生產的盲目性。

丁：市場法則：資本主義的市場法則，其特點是資本家必需通過市場交換才能實現其生產物的價值，資本家可以確定商品同個別勞動價值，但在市場上未必能按此價

金和物資逃避到香港台灣和外國，僅在國內留下搬不走工廠和機器，現在沒有辦法繼續生產，就把一切困難都推在政府身上。近來情形已有轉變，逃避到香港的資金已有一部份回來，這是很好的現象；但大部份仍留在海外。對於由於這個原故而發生的困難，無法幫助，唯一的辦法是將存留海外的資金和物資轉回國內，解決困難，繼續生產。第二種困難也是自己造成的，過去在物價上漲時他們購存了大量的黃金和外幣，在去年十月十一月間物價上漲時，他們又囤積了大量的物資，那時政府號召大家拋售物資抑平物價，但一部份廠家囤貨不賣，寧願出高利到銀行去借款供工廠開支，甚至還有借了錢來搶購囤積的。因此政府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從各地趕運物資調節供求，把物價穩定下來。這時候囤積的資本家就叫苦了，他們所用的銀行貸款月息都在百分之四十以上，甚至有高到百分之一百以上的。物價平穩下來，物資無法出手，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月息當然是個很大的負担，於是就發生困難了。對於由於這種原因而發生困難的廠家，當然只能讓他們接受這一次教訓。但完全不管也不行，我們只好在可能的範圍內收購一部份存貨，幫助一部份工廠渡過難關。除了上述兩種情形外，也有許多工廠的確是存在着困難的。其中一部份是存在着暫時的困難，今後仍有發展希望，我們應當盡可能地給以幫助；另一部份由於設備和經營方法特別落後，已無生存條件，這亦只能希望他們自行改革，決非依靠政府援助所能解決。所以對於各種困難要分別看待，對於自己製造的困難，很難幫助；對於真正有困難，而有前途的，應該幫助。最好是由國家銀行帶頭，動員私營銀行和社會閑散資金，來共同克服目前的困難。現在解放戰爭已快勝利結束，今後的財政狀況漸見改善，生產和交通事業漸見恢復，物價將較過去平穩，上述困難情形是很快就會渡過的，繼此而來的將是工商業的迅速恢復，以至蓬勃發展。

商業資本，商業資本與工業資本不同，它不能夠創造價值，商業資本溝通城鄉物資交流，調劑各地物資供求，這對生產發展有很大的幫助，是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應予獎勵。但一部份的商業資本帶着濃厚的投機性、封建性、買辦性，這就需要限制和改造。過去中國的商業資本對推銷帝國主義商品很感興趣，洋貨業很發達，現在我們要保護民族工業，外貨進口就要限制，一部份的洋貨商就只有轉而銷售國貨，又有些帶封建性的商業資本，例如過去農村中一般的糧食行、土產行，往往用高利貸來剝削農民，對於這種封建性的商業資本，當然也不能保護。又因過去在國民黨統治下正當的工商業不易存在，只有投機才能賺錢，許多資本都轉入投機市場，變為投機資本，這種投機資本哄抬物價，擾亂市場，對生產發展和人民生活都是很大的威脅，所以我們對於投機資本不但不應保護，還要緣力的限制和改造。現在我們正用許多方法與投機資本進行鬥爭，不戰勝投機資本，物價就不能穩定，正當的工商業就不能發展。現在國營貿易機構所掌握物資還不十分充足，因此投機商人有時還能哄抬物價，擾亂市場，但這只是暫時的現象，國營經濟正一天天發展，尤其是國營商店和合作社，它們發展很快，逐漸有力控制市場，掌握物價，投機資本不能再像過去那樣興風作浪，必須轉向正當的有益於生產的事業。去年春天東北糧價一度上漲，投機資本到處搶購和囤積糧食，其實當時國營機構掌握的糧食非常充足，故意觀望等待一下，到糧價漲至一定程度時大量拋出，把糧價平抑下去，這樣一來，投機者就吃了大虧，經過這次打擊後他們就老實了。上海那次物價波動平息後，一部份的投機商人也着了慌；他們用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月息借回來的資金都用在囤積上，如果物價穩定，囤一月就快要虧本一半，囤兩月就差不多全部完了。我們是能夠打擊投機活動的，過去國民黨之所以不能打擊投機，是因為官僚資本本身在領導投機活動，軍隊和政府機關所領到的經費均用高利存入私營銀行，私營銀行用更高的利息放給投機商人，大部份的國家資金就用在投機活動上面，要打擊投機平抑物價當然不可能。今天情形完全不同，國營經濟絕不會參加投機活動，軍政經費也不許存入私營銀行，它們不再支持投機活動，反過來與投機活動鬥爭。想應用過去的經驗在今天從事投機活動，結果遲早只有失敗一條路。但正當的貿易則受到國家的保護，它們還是有發展前途的。

銀行資本，銀行資本既不生產物資，也不調劑物資供求，它比商業資本更差。如果銀行資本吸收社會游資，投入生產事業，則它們的活動也是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但今天中國大多數的私營銀行吸收了游資，不投入正當的工商業，而將資金供給投機商人使用，它們與投機活動關係最密切。在國民黨統治時代，正當的工商業和農業不能發展，資本家不願投資，銀行就來收集這些資金投入投機市場，買賣黃金買賣外匯，獲得豐厚利潤，金融業就因此而得到了畸形的發展，今天私營銀行銀號錢莊的數量，已經超過了實際需要，必須有一部份轉業，私營銀行資本家也承認這一點。因此對銀行資本要進行嚴格的管理，改造它們，使它們的資金能投入正當的工商業。

對各種不同的私營經濟，應按具體情況而有不同的對待辦法。一般的說，對工業要多獎勵，對商業應按其不同的性質，而予以獎勵或限制；對銀行應多限制，其有益於國計民生者當然也要保護。總之我們對於私營經濟中的有利於國計民生者應獎勵，不利於國計民生者應限制；不分皂白一概獎勵或一概限制都是錯誤的。

在扶助私營經濟的同時，另一方面要儘量的發展國營經濟，使國營經濟能取得并鞏固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現在，工業中的鋼鐵、煤礦、機器等都已大部掌握在國家手裡；交通中的主要部份如全部鐵路及一部份的輪船，亦已由國家掌握；商業方面，各貿易公司已漸掌握糧食布棉等類主要生活資料。只有國營經濟取得領導地位，人民生活才有充份保障，整個國民經濟就可以遵循着新民主主義的道路順利發展。

(二)勞資兩利——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關係問題

在說明勞資關係時，首先必須承認資產階級剝削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的生產是為了追求利潤，利潤的來源是無產階級所創造的剩餘價值，必須剝削剩餘價值才能產生利潤，不剝削就不能產生利潤，不能產生利潤的生產在他們是認為毫無意義的。因此凡是資產階級都要剝削無產階級，有些資本家說，還不是剝削，而僅是「大貧小貧」之別，這種說法違反真理，我們不能承認。但在今天，我們是否容許這種剝削呢？顯然是容許的，今天在一定的限度內，我們還歡迎資產階級增加生產，多開工廠，擴大他們的活動範圍。中國工業尚不發達，如能多開工廠，顯然是對國家有利。開一個工廠容納一千工人，開兩個工廠容納兩千工人，資產階級這樣擴大活動範圍，無產階級不會反對，而且歡迎。目前許多失業工人正等待着工作，多開工廠就可解決失業工人的生活問題，在業工人可以減少失業工人競爭的威脅，工作更有保障。今天我們還不怕資本主義過多，而怕資本主義過少。多開工廠對資產階級有利，對無產階級也有利。馬克思曾承認資本主義在開始發展的時候，曾大大的提高了生產力，曾經對入類有重大的貢獻。我們觀察問題要從歷史上來觀察，封建社會的生產力比奴隸社會進步

工商業政策

——一月十二日在清華大學的講演詞

薛暮橋講

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就是在共同綱領上所提到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在農業生產中，首先是要解決土地問題，土地問題解決了才可能將個體農業生產逐漸發展到集體農業生產，農業生產提高後，工業就有了更好的發展條件。在工商業的基本政策中就是上面所提到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如能夠很好的貫徹這幾項政策，餘下來的就僅僅是技術上的問題，現將這四項基本政策簡單的說明一下。

（一）公私兼顧——主要就是社會主義經濟成分與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關係問題

新民主主義經濟中有五種不同的經濟成份，即國營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營資本主義經濟。其中國營經濟基本上已屬於社會主義性質，私營工商業則仍屬於資本主義性質；這兩種經濟成份雖然同時存在，本質上是根本不同的。國營經濟之所以屬於社會主義性質，因爲現在的國家已不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產階級所統治的國家；同時也不是資產階級所統治的國家，而已經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國民黨時代雖然也有所謂「國營經濟」；但這種「國營經濟」是爲四大家族所掌握，且爲四大家族服務，爲官僚資本服務的，他們利用「國營經濟」營私舞弊，以「國家」的名義來掠奪全國人民的血汗，使之成爲四大家族和其它國民黨反動派的私有財產。今天我們的國家是屬於廣大人民的；因此我們的國營經濟就一定要爲廣大人民服務，首先要爲勞動人民服務，這樣的國營經濟與國民黨的所謂「國營經濟」根本是性質相反的兩回事。

私營資本主義經濟屬於資本主義性質；其特點是要追求利潤。資本家是爲了賺錢要分紅才來發展生產和商品流通，但儘管資本家的目的是爲了自己，而在今天只要能夠增加生產，能夠進行商品流通，即對人民有益，對國家有益，應該受到保護和獎勵。國營經濟和私營經濟的本質絕不相同，不能混淆，如在物價高漲時就可以看出來。這時候私營工商業爲着自己的利益，都要囤積物資。一部份投機商人更想混水摸魚，套欵搶貨，物價漲得愈高就愈高興，這與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當然是矛盾的。國營商店在這時候則要選擇適當時機，拋售大批物資把物價平抑下來，在物價上漲時拋售物資，自然要虧本；但爲了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應該在這個時候犧牲其局部的利益，這就是公私經濟基本上的區別。再拿銀行來看，在物價上漲時，一些私營銀行往往大量吸收游資，提高利息，貸給投機商人，這樣高利的貸欵，正當工商業者是不能利用的；只有投機商人才敢利用。因此他們的活動是便利了投機商人，助長着物價的波動，相反的，國家銀行則在這時收集游資，把它凍結起來，他們有時凍結全部貨幣發行額的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以上。這樣做，對銀行來講是一種損失；但對國家對人民却有很大的利益。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銀行和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銀行基本上就這樣不同。

所以有些工商業家要求與國營經濟享受同等待遇，這種要求是不公平的，因爲兩者任務不同。國營經濟既然担負着私營經濟所不能担任的艱鉅任務，自應具有必要的工作條件。例如在上次京津糧價上漲時，曾向關外調撥大批粮食，足夠京津數月之用，這些粮食交給誰呢？當然交給國營機構，如果交給私商，就可能被他們囤積起來，人民不受其利反受其害。所以「公私兼顧」並不是說公私完全一律看待，因爲性質不同，任務不同，而應有所區別，在「公私兼顧」中要「先公後私」。

如果只是發展國營經濟，而不容許私營經濟發展，這也不對。因爲今天的國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並不大，整個國民經濟中幾乎有百分之九十是農業與手工業生產，近代化的工業生產僅佔百分之十左右，其中約有一半是國營，一半是私營；重工業中國營多，輕工業中私營多。商業中私營經濟遠多於國營經濟，因此發展生產還要多多依靠私人資本，單靠國營經濟是不能滿足廣大人民要求的。私營經濟掌握了大部份資金（包括各種物資），且有豐富的管理經驗，如果不能好好利用這些資金和經驗，不鼓勵私營經濟使其積極生產，那末，整個生產就要萎縮，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就很困難。所以我們對私營經濟（包括手工業和農業生產），也應該好好扶植發展，這就是公私兼顧。然而在私營經濟裡面也應該有所區別，因爲它們的基本目的是在追求利潤，所以它們可能從事生產活動，也可能從事投機活動。我們對有利於國計民生者應給以幫助、獎勵，對不利於國計民生者則給以限制改造。

工業資本，一般來說是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故原則上應鼓勵其恢復與發展。但它們的恢復與發展主要應依靠其自身的力量，不能依賴政府的幫助。因爲今天國家的經濟力量還很薄弱，不能夠無限制的幫助一切私營企業。例如現在許多工廠缺乏資金，缺乏原料，不能繼續生產，人民政府決無力量把它們的困難全部解決。上面說過，現在大部份的資金操在私人手裡，政府要貸欵給私營企業，只有增發鈔票，鈔票太多物價就會高漲，這對人民不利，對未得到貸欵的私營企業也不利，所以我們不能這樣做。應該分析這些工廠的困難來分別處理。第一種困難是自己造成的，解放前他們將資

的戰爭，交通的破壞，使得整個城鄉交換關係破壞了，去年的城鄉交換就很困難。所以政府號召要迅速溝通城鄉交換關係，這一項工作，主要靠三方面：㈠國營經濟機構。公營商店要充分掌握物資，尤其要掌握粮食紗布等重要物資，才能主動調劑供求，平穩物價。爲了調劑城鄉物資供求，曾經開過許多會議來統盤籌劃。有了健全的城鄉物資調劑計劃，並能具體執行，人民生活和工業農業的發展才有保障。㈡合作社。光靠公營商店是不夠的，還應該發展合作社，通過合作社來溝通城鄉物資交換，在農村裡更需要如此。公營商店最多只能每縣設一個，它與廣大人民之間要有合作社來連繫，農業產品通過合作社到達城市，工業產品通過合作社到達鄉村。㈢私營商業。公營商店及合作社仍不夠實際需要，因此私營商業也要發展，保護正當的自由貿易，取消各種不合理的限制，使得農業品和工業品能更快的交流，城鄉關係能更加密切起來。

（四）內外交流——中國與外國的經濟關係問題

在帝國主義百餘年侵略下，中國的國民經濟帶着濃厚的殖民地氣息，處處依賴着帝國主義，可說是從頭到腳全身有毛病。中國的民族工業本來很不發達，在民族工業中又大部份是輕工業，重工業很少。紡織業是比較發達的，但棉花大部來自美國，布疋靠往外銷，因此上海被封鎖，帝國主義者就認爲從此開不了工，他們想不到我們能夠用中國棉花作原料，布疋銷給中國的農民。重工業中以煤鐵爲主，生產出來的都是原料，過去是將煤和鐵砂運到日本去化鐵鍊鋼，在中國自己化鐵就已不多，鍊鋼更少，鍊了鋼還是不能製造機器，連軋重鋼軌的設備也沒有，生產出來的很少一點鋼鐵也沒有用。總括起來是農業多，工業少，工業中輕工業多重工業少，重工業中是煤鐵等原料工業多機器工業少。設備上技術上過去東北與日本連繫，上海與美國連繫，要使上海與東北連繫就不容易，因此上海到東北的參觀團回來說，到東北去了一趟等於到外國去了一趟， 去美國也許還不會這樣陌生 。上述種種都說明我們的工業建設還存在着許多急待解決的問題。基本的問題是怎樣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如果做不到，很多困難就無法解決。所以英美帝國主義者曾這樣估計，認爲離開了他們就不能發展甚至不能存在，封鎖六個月，上海就要垮台，工廠就要關門。但是，他們的估計錯了，我們逐步的做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我們不需要依賴帝國主義，離開了帝國主義我們更能自由發展。

雖然這樣，我們仍願意在平等的基礎上與外國建立經濟來往，與蘇聯及其他新民主主義國家來往對我們更有好處。中蘇外交關係建立後，蘇聯對我們的經濟幫助將一天比一天大。我們不能依賴帝國主義，但是可以獲得蘇聯的幫助來發展我們的工業，沒有蘇聯的幫助，我們的工業建設是很困難的。去年我們有一項很大的成就，這就是在戰爭中修復了大部份的鐵路，速度之快不但在中國值得驕傲，就在歐美也是令人驚奇的。沒有蘇聯的幫助，這樣的成就是很難想像的。來到中國的蘇聯專家，各種專門人材都有，他們都很熱情地來幫助我們；這些都是難得的人材，從世界上其他地方是無法請到的。美國人請來了也沒有用，他們那種大少爺式的建設在中國行不通，看了中國的工業設備這樣不好，那樣不行，樣樣要到美國去買，所以越建設越窮，中國一部份的工程師也受了他們的影響，不依靠美國就不能「建設」。只有蘇聯和我們一樣，都是從艱苦的環境下奮鬥出來，無論怎樣困難都要建設。一些蘇聯專家到了東北看見許多破銅爛鐵，就說能建設多少多少工廠，到了上海看見許多破銅爛鐵，又說能建設多少多少工廠。其次，美國的資本主義的建設，與蘇聯的計劃經濟的建設又大不相同，當粮食不足時，蘇聯專家向我們建議，掌握起來就有辦法。我們不但要學習蘇聯的技術，而且還要學習蘇聯的計劃經濟，學習他們建設的方針和精神。現在正在商訂商約及貸款，今後中蘇經濟來往會更密切。

我們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現在也有來往，而且是可以來往的。英美雖然指使國民黨對我封鎖，但同時也封鎖了他們自己，給自己增加了困難。他們以爲封鎖會使我們屈服，去向帝國主義求救，完全打錯了算盤。封鎖雖然帶來了許多困難，但封鎖了半年多，上海不但沒有垮台，物資反而逐漸豐富起來了。抗戰中國民黨封鎖延安，當時的確發生了許多困難，那時候毛主席說，目前只有三條路，第一餓死，第二散夥，第三努力生產克服困難， 結果我們努力生產，做到了豐衣足食。後來國民黨的官吏到延安時， 我們對他們說，感謝你們的封鎖，否則我們還不會這樣堅決的努力生產，自力更生，也就不會有豐衣足食。上海的情形也是這樣，如果沒有封鎖，許多工商業家總想暫時拖一下，繼續依靠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及國民黨反動派的封鎖，增加了我們自力更生的決心，半年來的經驗，證明我們是可以自力更生，而不依賴帝國主義的。其次，我們相信帝國主義者決不願意幫助我們，只有蘇聯才會幫助我們，所以我們說必須一面倒。許多工商業家不贊成一面倒，以爲兩面倒也可以；封鎖來了，連他們也贊成一面倒了。以前延安的封鎖才眞叫封鎖，四面都是敵人，結果封鎖出個「豐衣足食」。現在的封鎖，最多也不過封鎖了一半，至少與蘇聯及其他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來往仍然可以進行，當然難不倒我們。英美的資產階級一方面與我們做生意，一方面又反對中國解放，他們本身就有矛盾。尤其英國，損失了中國這樣大的市場就是一個很嚴重的損失，所以他們想來想去還是要與我們建立外交關係。我們對於帝國主義者的態度是，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可以建立貿易關係，要繼續其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就不行。貿易關係並不一定要依靠外交關係。與中國沒有外交關係的國家，也在與中國做生意，現在英國與我國建立外交關係，中英貿易當然更容易發展，但中國人民決不要對英國政府存什麼奢望，任何帝國主義政府是決不會有什麼好心意來幫助我們的。

上面所說是四個主要的原則，貫徹了這四個原則，加上技術上的改進，我們的工業建設前途就很有希望。

（黎南記錄）

華東區本刊讀者．代銷處注意

爲了適應本刊讀者和各代銷處的需要，本刊自一卷九期起，已委託華東（山東郵區除外）各郵局代辦批銷、訂閱及零售業務。希望愛護本刊的讀者和同業，逕向當地郵局購訂和洽銷。如有任何困難，並請隨時通知本刊上海辦事處解決。

，到後來封建制度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就有資本主義來代替它，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又遠遠超過封建社會。中國近百年來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的控制下，資本主義的發展很慢，但仍超過過去幾千年的發展。現在就全世界範圍來看，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到了末日；而在中國，資本主義比起封建主義，仍然是較進步的生產方式。我們對資產階級的看法，首先承認他們必然剝削無產階級，因而就與無產階級對立。但資本主義的生產比分散的農業生產及手工業生產都要進步，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客觀上對人民有益，因此不應反對。

中國的民族工業經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多年的統治和摧殘，今天都存在着許多困難。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要共同努力，來克服目前的困難，使工業生產迅速恢復和發展。資本家要把海外的資金和物資拿回來，把囤積的東西拿出來，全心全意發展生產。無產階級也要努力生產，咬緊牙關，渡過目前困難，先把生產恢復起來，生產增加了才能逐漸增加工資，改善生活。如果不管生產，僅僅注意增加工資改善生活，雖然對無產階級目前的局部的利益有些好處；但實際上，如果生產減少，工廠倒閉，則不但對資產階級不利，對無產階級也是不利。到那時候，國家決沒有力量來全部救濟失業工人。所以我們要教育工人努力增加生產，生產搞好以後，才能談到增加工資改善生活。

工業中有國營的，有私營的，兩種性質不同，工人與工廠的關係也不同。國營工廠屬於國家，國家屬於人民，工人是人民的一部份，而且又是領導階級。所以國營工廠屬於人民，首先屬於工人。國營工廠中的工人一方面受工廠僱傭，另一方面又是工廠的主人，工廠經理只是代表國家管理工廠，他們也靠薪水維持生活，與工人處在同樣的地位。因此在國營工廠中沒有勞資問題，只有公私關係，工廠本身是公，屬於全體人民；工人是私，是全體人民中的一份子。在整個經濟政策中實行公私兼顧，先公後私；在國營工廠裡面也要實行公私兼顧，先公後私。解放以後，工人工資幷未普遍提高；且有部份工人稍爲降低一些；但他們的政治地位是大大提高了，因此生產情緒也大大提高了，階級覺悟也大大提高了。舉一個最近的例子，由於工人階級歷年來不斷的鬥爭，曾經得到一些切身的利益，例如年終雙薪，年終獎金等，有些工廠，年終獎金要發到相當於三個月到五個月的工資。目前國家正處在困難的時候，發出這麼多年終獎金，就會更增加國家財政的困難，所以政府與工人商量一下，爲了照顧國家財政困難，要求工人少發一點，原發半個月以內的照發，原發半個月以上的超過部份改發一半，最多不超過兩個月。這個消息公布以後，全國各地工人立即響應，我們一天總要收到好幾十份電報，有些請求完全不發，把他們應得的獎金捐獻給國家，用於經濟建設，情緒熱烈極了。

在私營工廠中，情形就不能完全相同。私營工廠中間仍然保持着勞資關係，工人尙未成爲工廠的主人。他們仍然爲資本家工作，受資本家剝削；但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國家的主人，因此對生產的發展也要負一部份責任。他們必須好好生產，並且督促資本家也拿出資金，好好生產。由於以上原因，國營和私營工廠的工人雖然都是國家的領導階級，而在事實上，工人對工廠的態度確有不同。有些資本家羨慕國營工廠工人的生產熱情，要求我們幫助他們好好教育私營工廠的工人。我們的確應該教育工人提高生產情緒，但在另一方面，兩種性質不同的工廠，有些不同的地方是無法強令相同的。就拿年終雙薪來說，雙薪減少了或取消了，在國營工廠歸國家所得，因此工人對此是沒有意見的。在私營工廠實行，則歸資本家所得，如果資本家已經有錢可賺，爲什麼不讓工人也好好過一過年呢？當然，如果工廠虧了本，是可以和工人商量少發一點獎金的，我們工人也應該照顧這種情形，免得工廠倒閉。廠方對工人的態度，國營和私營之間也有不同。國營工廠裡工人參加工廠管理，共同擬定生產計劃，大家一起想辦法解決問題，解決困難，總之工人已當了家。而在一些私營工廠裡，還有經理不願和工人講話的情形。你不把他們當自己人看待，爲什麼他們一定要把你當自己人看待呢？所以資本家本身要負一部份責任。當然我們應該教育工人，提高所有工人的生產情緒；但我們只能教育工人爲人民的公利而犧牲本身利益，不能教育工人爲資本家的私利而犧牲本身利益。

（三）城鄉互助——工業與農業配合的問題

資本主義生產是城市支配鄉村，城市剝削鄉村。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是大資本支配小資本，大資本剝削小資本。城市工商業家資本大能夠掌握市場，操縱物價；鄉村農民分散，貧困，因此農產價格常被城市工商業家操縱，他們通過不等價的交換剝削農民，在資本主義下，城鄉之間就存在這種支配和剝削的關係，一般都是工業發展比較快，農業發展比較慢。資本家不但要剝削工人，還要剝削農民。因爲農業相對的落後，糧食和原料供給不能滿足工業發展的需要，於是就要向外掠奪，尋求原料和糧食的供應地，另一方面也由於農業相對的落後，農民購買力低，工業產品銷不出去，又要到國外去找市場。於是，從城市支配和剝削鄉村，發展到工業國支配和剝削農業國，也就是帝國主義國家支配和剝削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

在新民主主義下情形完全不同，一方面要發展工業，一方面要發展農業。在過去我們還沒有佔有城市時，首要的工作是發展農業；到解放許多大城市後，就要注重發展工業，但發展工業並不等於放鬆發展農業，農業仍然要繼續發展。發展工業要有充分的原料和糧食供應，這就非依賴農業不可。現在糧食不但沒有剩餘，而且還感到不足，糧食會議時計算一下，今年的食糧，要東拚西湊才勉勉強強的過得去。棉花不足更是大家都知道的，棉花會議時計劃擴大多少棉田，增產多少棉花，棉田增加，糧田就要減少，糧食就會更感不足。糧食要增產，棉花也要增產， 那就只有提高農業生產，提高每一畝地的生產量，由此可見農業發展後工業發展才有保障。再從另一方面來看，發展工業要有機器，目前有些機器要靠國外輸入，我們不是用工業品換回來，而是用農產品去換回機器。爲向國外購買機器，凡能出口的農產品我們都要獎勵出口，不發展農業生產，出口的農產品那裡來？再從另一方面來看，工業發展以後產品要有地方銷售。我們輕工業中，紡織業的全部產量比起全國人口的需要量，至少還差一半。但上海紡織廠，解放前要向南洋一帶推銷紗布；同時鄉村裡有許多農民沒有衣服穿，因爲他們沒有錢買紗布，所以紡織廠就沒有銷路。農具生產也一樣，現在許多農民缺乏農具，但鐵工廠生產了許多農具堆積起來賣不出去。根據這個理由，也應該發展農業生產，提高農民的購買力，工業才能發展。土地改革直接是爲發展農業，間接也是爲發展工業。如果工業發展農業不能跟着發展，問題仍然不能解決。如何發展農業生產，還是另一問題，今天不能詳談。

除發展工業農業生產外，還要溝通城鄉交換關係。過去這件工作由封建商人及投機商人來担當，他們都在交換中剝削農民及小生產者，現在當然要改變。但由於多年

評，說開始授課時有偏僻觀點，像解放前教業務課的態度一樣。這樣誠懇的批評激起了同學學習的熱情。錢學熙教授將政治課所講授的立場觀點，應用在他的文藝批評的理論上，使同學了解政治課與業務課的聯系。至於中文系東語系教授們經常參加同學小組，工學院教授在大班討論上，用親身的經驗說明政治覺悟對於工業建設的關係，在政治課學習上，在師生了解上，都起了相當的作用，「教學相長，師生互助」，創造了完全新的學習方式，新的學習效果。

講授功課的教員，組織了一個政治課教學委員會，集中研究同學的思想情況，統一領導全校政治課的進行，這個機構在半年政治課學習的指導上，雖然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但是每週一次的討論會，由於艾思奇教授的幫助，對於一些思想問題的分析與解決，是有很大的成績的。

理論緊緊地結合實際

北大的政治課，隨着課程的進展，一次又一次跟實際運動結合起來。一方面，政治課的學習，幫助了實際工作的推動，另一方面，實際工作又幫助了政治課學習的積極性。

同學們最先對政治課的態度，雖然經過動員工作，但一般說來仍舊相當冷淡，最多承認是一門必修課而已，可以與其他業務課同等並列。有一個同學選了二十七個學分，系主任要他精簡，他問：「退政治課行不行？」要開小組會時，同學就說：「明天要交題」，「反正我爲人民服務就完了，何必這麼形式地學政治課」。更有同學提出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小資產階級是四個朋友中的一個，爲什麼要改造朋友的思想呢？」「我還不知道馬列主義好不好呢，你怎麼就要我用馬列主義的立場，批評思想分析問題？」

除了理論上解決這些問題之外，就必須聯系實際工作，問題才得到眞正的解決，北大的人民助學金評議，是第一件起了普遍作用的工作。由於這一件工作，同學才了解爲人民服務的具體內容，體驗到改造思想的必要，因此，同學們的相互了解加深了，小組會開始活躍有生氣，大家都認眞進行學習，承認政治課的重要性了。

課程的目的是建立馬列主義的幾個基本觀點，同學們的思想情況恰恰大都與這幾個基本觀點相對立。說勞動創造世界時，就一定强調知識份子的領導地位；分析意識形態的階級性時，就肯定超階級的眞美善的存在；學習統一戰線時，就懷疑這是共產黨請客；研究國際主義時，就懷疑中蘇是否眞正友誼；說明黨團的性質時，就提出學術自由的濫調！要黨團退出學校。這些問題雖有普遍深淺的不同，但都存在於同學中，表明了我們的政治課是値得學習必須學習的。

北大進行解決這些問題時，不但是理論上解答這些問題，而且是從思想上解決這些問題，在討論時鼓勵對立的意見，反覆辯論，然後提出系統的結論，在實際工作中，處處與學習聯系起來，深入體驗馬列主義的精神。參加了半日勞動，同學們了解勞動的意義，集體競選辦膳團，集體早操，加深了同學們生活上的相互關切，了解羣衆觀點。檢查新生婦女工作，激起了爲人民服務的信念。師生代表會議後，許多同學眞正懂得了民主集中制，認識了黨團的性質與工作，醫院實習大夫四十人，有黨員十一人，以前有什麼工作時，羣衆總是說：「反正他們十一票」。經過師生代表會議後，大家在小組會上檢討，黨員批評了自己認爲羣衆落後的思想是錯誤的，羣衆也自認過去不認識民主集中制對黨的性質有誤解，對黨員有偏見，醫工學院同學經過師生代表會議以後，具體認識了眞民主與假民主的內容。工學院同學集中討論了中蘇關係問題，具體了解國際主義的思想。醫院中藥房工作的人員，在小組中討論中蘇關係之後，有幾位都參加了中蘇友好協會，以前卻想「除非蘇聯把東北運走的機器搬回來，我決不參加中蘇友好協會。」法律系有同學說：「我以前以爲法律最公平，我才學法律，現在才知道法律不過是階級鬥爭的工具。」一年級有同學說：「我想母愛一定沒有階級性了，但是我過去參加學生運動，母親就不允許我，母愛怎麼會沒有階級性呢？」

最後一個發生普遍作用的工作是思想總結，在思想總結工作中，自我批評與批評一般說來進行得相當具體，深刻；普遍激起了同學的興趣，大大提高了同學的思想。醫院裡的大夫們在飯廳中，在路上，每人都打一個招呼：「你對我有什麼批評？」，醫預系的小組會，一個上午批評了兩位同學，發言都熱烈認眞。西語系有一位同學受到小組的批評，拍着桌子離開了會場：「我不念北大了，也不要你們批評我！」第二天又找到小組長談話，告訴小組長：「我一晚沒睡覺，想一想，你們的批評還是正確的！」物理系動植物系的大班討論，同學平日都不感很大的興趣，但在思想總結典型報告時，卻收到極好的效果，引起同學更深一步自我檢討的要求，哲學系四年級小組作典型報告時說：「我們這一小組的人，以前是三教九流，無不齊備，有吟詩的名士才子，有死啃書的學究，有提倡學術自由的『文化黨』，也有在沙龍中清談的革命家，大家互不關心，經過半年來的學習，同學們的關係親切，文化黨的坦白了他的思想，空談家開始作具體實際的工作，學究開始關心時局，才子也隨和『世俗』的學習，並且有幾個人聲請入團了！」

政治課的成績，最具體明白的表現，就是對黨團性質的了解。「爲人民服務，要不要參加組織呢？」醫預系正面提出這個問題在大班反覆討論，討論結束後，有許多同學積極找黨團員談話，要求入團。工學院有同學說：「砍了我的頭，我也不說共產黨民主」！現在這位同學卻找黨團員談話了。政治系有人提出過黨團退出學校的意見，現在也沒有這種論調發表了。醫院的大夫護士們在典型報告時，有幾位提出了要參加組織的志願，博得了全場許久的掌聲，並且有一位助理員自動報告他交出五支手槍時的思想變化的過程。哲學系一個秘密「文化黨」的同學公開坦白自己的歷史，加入了團，醫學院的同學參加檢疫工作，看到鄉下土改的情形，結合了政治課學習的理論，了解土改的意義，更主動地找黨團員談話。當然，這些工作黨團員起了骨幹推動的作用，雖然開始時，部份黨團員犯過改造別人思想的錯誤看法，但在工作進行中，這些缺點不斷糾正，緊密了黨羣的關係，也促進了羣衆對黨團性質的了解。

結束語

半年以來，北大的政治課是有成績的，能夠有這樣的成績，主要的原因是大局的變化。處處都有政治學習的材料，人人都有奮發前進的志願，眞有點「滿街都是聖人」的氣象。北大是五四運動的搖籃，在思想上起過先導的作用；換言之，就是曾經提出過西洋新的思想理論以改造封建思想，北大又是學術研究的園地，有成千成萬的高文典册，有一套一套的思想系統，常常自命有學術自由的尊嚴，不受時俗的影響。但是時代進步是太快了，北大傳播出去的思想，到中國人民之中加以洗鍊之後，現在回頭又來改造北大了。學術研究的沙籠，也流入了中國泥土的氣息，再不能孤立了。政治課所帶來的思想理論，所應用的教學方法，雖然在北大剛剛只是建立了陣地，但是前途充滿了希望，當學術變成了人民的工具，亞幾米德們爲人民工作時，這個世界終久要被抬起來的。

北大的政治課

鄧華

第一次大課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日，北大民主廣場飛揚着風沙。灰樓前面空地上滿坐着北大全校的師生，有從遠遠的西城步行前來的醫工學院的同學，有這下午停止辦公的職員，有從遠處宿舍跑來的老教授，大家靜靜地傾聽着從擴音器傳來的聲音，這就是北京大學政治課——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上第一次大課。

首先由政治課教學委員會主任委員許德珩教授說明高教會增加這門課程的意義。繼由校務委員會主席湯用彤教授說明政治課在北大課程中的地位，教務長曾昭掄教授則特別針對學自然科學的同學說：「有些同學以為學好了自然科學，就是為人民服務，不知道學好了自然科學，只等於一把刀磨快了，很鋒利，但是這把刀究竟拿在誰手裡，為誰利用，仍舊是成問題的，政治課正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因此希望學自然科學的人，好好地學習政治課。」

艾思奇教授說話了，大家一陣掌聲，他在高教會負責推動平津各大學的政治課學習工作，但是他也在北大任教，所以又指導北大政治課的學習。首先他說明這個課程的目的，是建立馬列主義的幾個基本觀點，改造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因此要學會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不斷地糾正錯誤思想。他說：「改造思想是一個長期的工作，但是我們今天就要開始，眞正澈底改造，並不容易。普列哈諾夫被人稱為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學習了三十年的馬克思主義，最後到了革命緊要關頭，卻犯了極大的錯誤。如果有人以為馬列主義容易學，請看看普列哈諾夫的榜樣！」他又敘述這個課程要使大家能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運用辯證法的方法，解決實際問題。因此在教學方法上，是以自覺為基礎，教員從旁輔助，進行集體學習。「大家不要像學習其他課程一樣，依賴教授，我們負責教書的人，也要學習，如果以為一定要有好教授才能學習，那麼我們的課程就無法進行了。因為完全精通馬列主義的人，在中國只有黨中央一些負責同志如毛主席等。但是毛主席事情忙，不能來教我們，我們也要學習。因此我們要大家努力，師生互助，教學相長，也一定有進步的。」

最後有二位同學說話，一位同學暑假從東北參觀回來，報告他在東北所親身經歷的一些情況：「東北工廠工人生產的積極性提高了，為什麼？因為他們學習了政治，知道自己變成了國家的主人。東北醫院的工作效率特別高，為什麼？因為他們學習了政治，能好好地為人民服務。東北學校同學的學習情緒特別好，為什麼？因為他們學習了政治，看清了自己的方向與前途。為了改造我們的思想，為了搞好我們的業務，我們現在要好好學習政治課。」

另一位報告的同學是從黨訓班回來的。他介紹了黨訓班的學習方法；說明理論聯系實際及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針，在黨訓班是如何具體實施的，同時也介紹了大班小組及互助小組等學習組織具體運用的情況。

這第一次大課也是一次動員大會，有了動員大會，同學們了解政治課的重要性，同時除了說明如何進行學習以外，對於懷疑政治課的思想加以分析與批評，對於政治課的進行，起了相當的作用。因為理工學院一部份同學單純的技術觀點，文法學院一部份同學教條主義的思想，少數黨團員以為政治課是改造羣衆思想的偏向，都有了初步的糾正。

教學相長，師生互助

動員之後，進一步的工作是組織起來。北大同學約二千四百人，全體必修，包括研究生在內。沙灘區文理法三院的同學約一千六百人，分成十二大班，工學院約三百六十人，分成二大班，醫學院約二百七十人，也是兩大班，醫院百餘人一班。每班再分成若干小組，每組十人到二十人，每小組再分為若干互助小組，大班小組的劃分，照顧業務的系級及生活上的接近，互助小組在生活上互助照顧，互相批評，在學習上互助督促，集體自學三小時，小組討論三小時，討論的問題由互助小組提出，這些問題是同學學習艾思奇社會發展史講授提綱，斯大林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二個課本所發生的。大班三小時，分成啓發報告與大班討論二項，啓發報告指引同學念書注意的重點，大班討論收集各小組所普遍存在的問題，提出一個加以集中的辯論。

這一切組織形式，都是為了一個目的；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北大半年來的經驗，證明了這個組織形式基本上是成功的。其中尤其是小組，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這樣組織之後，不但是解決了政治課的學習，使同學體會一種新的討論式的集體性的學習方法，免除了舊式灌輸式的講解方法的弊病，不易流入教條主義，而且對於系級工作的推行，師生結合的幫助，羣衆運動的開展，都有了許多成効。同時更重要的，是產生了一個新的生活方式，這種集體的有組織的生活，不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麼

北大政治課的特點之一，是許多教授先生參加了政治課的講授及小組討論。「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那是中國許多士大夫們一種驕傲的謙虛；骨子裡麼，總為「唯我獨尊」，要繼承「道統」。現在眞不同了，文化不能再供奉在大成殿裡，不能再在學府中獨立了，必須到人民中去，必須為人民所喜聞樂見，才有前途。因此大部份教授先生都談立場，說觀點，講方法，以求眞能批判地接受中外文化的遺產。參加政治課的教授先生，正是在這方面起了帶頭作用。一方面幫助許多對政治比較冷淡的同學，誘導他們進步，一方面也更深一層體會了馬列主義的理論，鄭昕教授在班上從文化的立場談國際主義，眞正啓發了同學的思想。同時也因為講授政治課，「使我念了許多奇奇怪怪的書籍，得益不少」，羅常培教授在班上作自我批評，「先生們都那麼坦白認眞地批評自己，我們為什麼不好好學習政治課呢」，馮至教授聽完同學大班討論之後，「他們討論眞深刻，有些問題我都沒有想到」，胡世華教授說大班討論眞解決問題，楊晉毅教授極力想法普遍參加同學們的小組討論，並且曾在班上公開自我批

但是「沒樂」「胡盧」之類却直到第十世紀，第十一世紀才見於中國的記載：這一類的文化層次是很顯然的（關於這些例子的詳細解說，參看「語言與文化」第四章）。同在一種語言裡，像西藏語的借字「滑石」和「玉石」，前一個「石」字有ㄎ尾，後一個沒有；「鋏子」和「鴨子」、「鋏」字有ㄅ尾，「鴨」字沒有：這也很清楚地表現他們從漢語借入藏語的年代前後不同。語言文字在社會發展史上的重要性，列昂節夫也曾經說過：「我們關於原始社會的知識之寶貴材料是語言：有許多文字是由遠古傳來的」。不過咱們得要注意，語言的變遷比文化的變遷慢得多；文字的變遷比語言更慢。有些文化因素早已變了，可是它的蛻形却仍舊在語言文字裡保存着。咱們考訂文化年代的時候，不單要把他們的層次順序分別清楚，還得認識語言文字的年代一般地要比文化的年代晚一點兒。我在「語言與文化」的第二章裡曾經引用了一些說文裡的例字去推究社會形態，這些文字雖然都是漢代才結集起來的，可是他們並不都是漢代遺的，所代表的意識也不全是漢代的社會形態。咱們固然不能因爲說文裡有「斬」字，就斷定這種慘刑在漢代還普遍流行；同時也不能根據甲骨文裡的「臣」「奚」等字就斷定奴隸社會到殷代才開始。應用語言文字來考證歷史，最要緊的還得聯繫當時社會的其他情況。例如，照董作賓的意見：殷代的禮制有新舊兩派，舊派篤守成規，以武丁爲代表；新派提倡革新以祖甲爲代表。就貞卜制度來說，「卜行止，記每日王所經過的行程，只見於新派；而卜告，卜臺，卜旬，卜求年，受年，卜日月食，卜夢，生育，疾病，有子，死亡，求雨，求啓各事，則只見於舊派，新派是很少見的。……這都可以看出他們兩派對於人事和自然界的現象，觀念並不相同。反之，因爲舊派卜貞事項的繁夥給我們留下更多的史實。因爲武丁、文武丁好卜王后的生育，王子的疾病等等，使我們多知道些他們婦子之名。可是我們即使知道了武丁是多婦多子的，却不能說這是武丁一人如此，或者說到了他才實行多妻制。這很明白的，新派不見得不是同樣的多婦多子，只不過是『不占而已矣。』知道了兩派卜事的不同，對於舊派的卜事，我們就應認爲這是殷代的一般現象，偶然遺留下來了，並不是一時一王的特殊現象。」這種觀點是用語言文字考證歷史的人們所應該掌握的。

如果能夠建立這些個觀點，那麼，中國語言學不單是民族的，而且不拘守着狹隘的民族主義；不單是科學的，而且逐漸跟馬列主義的科學聯繫。它所根據的是和理論結合的客觀事實當然不會「空」；語義演變順着一定的規律發展，具有科學原則和活的生命，也不至於「雜；」語詞內容處處受社會環境和經濟生活的影響，隨時隨地都跟文化的各方面發生有機的連繫，更不能說到「孤」：從這上面出發的語言學研究才可以稱得起大衆化，而不至流於庸俗化。爲給從事語言工作的人們指點一些明確的方向，我願意再提出以下的四個建議：

第一、爲記錄全國各地方言和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語言，咱們首先得製定一套拼音文字。自從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成立以後，我們已經收到幾百種新文字方案了。一時的風尙，大有民國二年讀音統一會開會時「個個想做倉頡，人人自算佉盧」的趨勢。我個人覺得，不管哪種方案，祇要禁得起人民大衆考驗，能夠達到解除文盲的目標的，就算是頂好的。就已往推行的成績，形式的簡易和學術上的聯繫，我是贊成「方案國際化」的。有人假借民族化的招牌，要把「新」文字變成已經死亡的西夏文或安南的字喃一類的東西，那簡直是違背發展的規律。至於現在試行的拉丁化新文字應否補訂，倒得看國內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的實際音韻系統來決定。就北方話的拉丁化方案來說，首先應該考慮的是應否標註聲調的問題；其次就是它所用的符號跟其他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的「音位」有沒有衝突的問題。我個人意見頗傾向於勞乃宣簡字全譜以多包少的原則，而符號參用拉丁字母和國際音標的集合體，聲調的標註也不該避免。推行時應按照當地的實際語音需要，抽出一部分來學習，不必普遍記憶本地方言用不着的音標，爲解除文盲起見，從勞動大衆着想，也應仿照蘇聯的辦法先從不同的方言或族語入手。列寧對於民族主張爲了聯合而分開，斯大林更推廣到語言一方面。北方話代表廣大的方言區在它所屬的區域內，當然拿它作推行的根據；但是爲了解除和北方話懸殊的文盲，還是先從他的本地方言着手比較容易得多。關於這一層，在中國文字改革協會的方案研究委員會裡還要從長討論，這裏只是我個人一點不成熟的意見。

第二、對於語義的研究，咱們不應該再墨守傳統的訓詁學方法：應該知道詞義不能離開上下文而孤立的，詞書和字典裡的解釋是不可靠的；應該用古生物學的方法分析各時代詞義演變的「累積的基層」；應該用歷史唯物論的方法推究詞義死亡、轉變、新生的社會背景和經濟條件。取材的範圍不可再存「雅」「俗」的偏見，自經籍子史、詞曹、專集、語錄、筆記、小說、戲曲、傳奇、以至於民間謠諺、大衆文藝都應該廣泛他搜集。研究的方法一方面要由上而下地從經籍遞推到大衆口語，另一方面還得根據大衆的詞彙逆溯到他們最初的來源：照這樣，就可以把「古今雅俗」的材料一切都聯繫起來了。這種工作一個人做固然非常繁重，要是有計劃、有步驟地集體進行，我敢保證它可以勝利完成的。

第三、對於現代方言的研究已往二十多年來太偏重語音一方面了。現在要想製定拼音文字的新方案，固然還得先把各地方音系統弄清楚，可是咱們要想和第二個建議配合，特別得着重詞彙的蒐集和研究。這種工作的進行，首先要注意每個常用詞彙在各地人民嘴裏的活方言有什麼異同。比方說，「飲」「食」兩個詞在北京話裡已經死亡了，可是在廣東話裡還活着；古漢語「尋」、「怎」、「甚」、「恁」的ㄇ尾和「眨」的ㄅ尾，現代說北京話的人沒有承認他們存在的，可是口語裡的「ㄒㄩㄝ麼」，「怎麼」、「甚麼」、（什麼）、「那麼」和「眨巴」還照樣流行着；關於「屋」的大小，爲什麼南方和北方不同？關於嗅覺的語詞爲什麼有的地方叫「聽」，有的地方叫「聞」？同是一種黑顏色，在各地方言裏却有「黑」、「烏」、「玄」的叫法；同是一個「青」字，在各地方言裏却有的代表藍色有的代表黑色。諸如此類，不勝逐一列舉。咱們要想中國語言的統一，必須先從分析這些矛盾開始。其次，咱們得深入各行業各階層的裏面分頭調查他們的慣用語，並編成分類詞彙。凡是曾經學過外國語文的人們大概總該知道他們各行業和各階層間都有各自有一套豐富的詞彙。比方說，農民有農民的慣用語，工人有工人的慣用語；打獵的有打獵的詞頭兒，開鑛的有開鑛的術語；汽車司機的行話和海上水手不同；青年學生間打諢竟使一班老頭子瞠目。可是這些全是活鮮鮮的詞彙，並不是備而不用的死語。中國的各行業和各階層裡何嘗沒有這一類的詞彙呢？只是任他們自生自滅，語言學家不加搜集，文學家不能應用；一方面委棄寶藏，一方面感覺貧乏，這夠多麼不經濟？毛澤東先生說：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以前對於自己所描寫的對象，「言語不懂。你們是知識分子的言語，他們是人民大衆的言語。我曾經說過，許多同志愛說『大衆化』，但是什麼叫大衆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自己的思想情緒應與工農兵大衆的思想情緒打成一片。而要想打成一片，應從學習羣衆的言語開始，如果連羣衆的言語都不懂，還講什麼文藝創造呢？

中國語言學的新方向

羅常培

在新民主主義的文教政策下來重估一切學科的價值，標準尺度就是看他們是否合乎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三個原則。自從去年春天以來，我對於自己曾經努力過二十多年的中國語言學就時常追尋它是否合乎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一般要求。還個問題一直不斷地在我的腦子裡縈繞着。照我所考慮的，「共同語言是民族底一個特徵」，中國語言學既然拿中華民族的古今語言作研究對象，它當然不會違反民族的原則。再說，假如咱們承認中國過去有科學的話，那麼，清代學者關於語言文字學的研究，比起十七、十八世紀的印歐語言學來實在沒有愧色。近三十年來，一班從事語言工作的人們接受了科學的語言學方法，用來調查研究中國固有的方言和一些同源異派的少數民族語言，他們的收穫已經比清代學者又邁進了一步。徐特立先生說：「過去中國的地質研究所和生物研究所，所謂查採集的東西都是中國所固有的。因此它的瞭解特別深刻，特別有成績，爲歐美學者所不及，還是值得頌揚的」。（本刊一卷八期，頁10）。我深以徐老的話爲然。但是在近三十年來的中國學術史上，能夠應用西洋的科學方法來調查研究中華民族固有的材料的，除了地質學和生物以外，還有語言學可以跟他們鼎峙。至於所謂大衆化，不僅是量的擴大，內容和形式也必須適合大衆的要求和接受的程度。以前關於語言學的研究很少能照顧這一點的；清代的語言文字固然成了經學的附庸；近年來關於語言、音韻、文字的研究也不過成了少數關在象牙塔裡的人們的玩藝兒。不過，大衆化和庸俗化不同，咱們要提倡語言學大衆化，還得貫澈徐老所說的：「大衆化的特點是：去空、去雜、和去孤」。（同上，頁11）。

經過一年間的思惟，再加上最近的啓發，我對於中國語言學提出了以下的三個新觀點：

第一、我們得承認語言是社會組織的產物，是跟着社會發展的進程而演變的，所以應該看做社會意識形態的一種。例如、英語 fee 字的歷史反映着畜牧社會把牲口當做財產；北美阿他巴斯干族現在用做「火柴」的詞本義是「火鑽」，還足以考見他們有過「鑽燧取火」的生活；滇邊高黎貢山的俅子把結婚叫做「買女人」，儘管現在的社會風俗已經變遷，終究掩飾不了買賣婚姻的遺跡。說文裡從貝的字都和錢幣有關係，足徵在「秦廢貝行錢」以前，曾經有過「貨貝而寶龜」的貨幣制度。由此可見，一時代的客觀社會生活，決定了那時代的語言內容；也可以說，語言的內容在在足以反映出某一時代社會生活的各面影。社會的現象，由經濟生活到全部社會意識，都沉澱在語言裡面。蘇聯的語言學家馬爾（Nicholi Yakovleoitch Marr 1864—1934）一派的耶夫梯（Yafety）語言學特別重視語義的研究，就因爲語義的轉變是由社會環境和經濟條件而起的，是動的而不是靜止的。所以語義發展史實在跟社會生活演變史分不開。

第二、語言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多方面聯繫的。任何社會現象都不能和別的現象絕緣，而獨立存在或發展。各現象間必得彼此關聯，交互影響，才能朝着一定的途徑向前推進。語言既然是社會組織的產物，當然也不能超越這個規律。所以語言學的研究萬不能抱殘守缺地局限在語言本身資料以內，必須要擴大研究範圍，讓語言現象跟其他社會現象和意識聯繫起來，才能格外發揮語言的功能，闡揚語言學的原理。我最近出版了「語言與文化」一本小書（北京大學大衆科學叢書文學院第一種，北大出版部發行）內容包括六項：（一）「從語詞的語源和演變看過去文化的遺跡」，（二）「從造詞心理看民族文化程度，」（三）「從借字看文化的接觸，」（四）「從地名看民族遷徙的蹤跡，」（五）從姓氏和別號看民族的來源和宗教信仰，」（六）「從親屬稱謂看婚姻制度。」它所根據的材料不單不限於傳統的文言，而且不限於大漢族主義的「國語」。所舉的例子儘量想賅括古今中外的各方面，尤其側重國內少數民族和國外文化比較落後的民族的口語。從語言和某一民族或某些民族間的聯繫，往往碍咱們對於較早的人口分佈和遷徙得到有價值的啓示；並且從語言所反映出來的文化因素顯然對於文化本身的透視有很大的幫助。其中討論借字一章材料比較多，篇幅也比較長。從公元第一世紀到二十世紀，漢語和其他語言間的彼此關聯，交互影響，在這一章裡可以找到不少的例子。馬爾曾經說：「沒有交配過的語言完全不存在。」在漢語一方面，咱們從這一章已經得到了初步證明；要想做進一步的研究，還得擴大漢語借詞和貸詞的探索，並且按年代排比起來，用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去推尋他們跟各方面文化的聯繫。這種研究是跟中西交通史分不開的。在其他各章裡咱們也找出了語言學跟地理學、姓氏學、人類學都有實質的密切關係。咱們如果能夠應用語言和各方面的聯繫去研究歷史或社會現象，在分析具體事物的條件、時間、和地點的時候，更可以增加一些把握。

第三，語言的材料可以幫助考訂文化因素的年代。語言，像文化一樣，是由不同年代的各種因素組合成的。其中有些因素可以推溯到荒渺難稽的遠古，另外一些因素不過是由昨天的發展或需要才產生的。假如咱們現在能夠把文化變遷和語言變遷的關係安排好了，咱們對於文化因素的相對年代就可以估量出來。至於所估量的含混或明確，得要按照特別的情況來決定。照這個法子，語言爲解明文化的次第，可以供給咱們一種「累積的基層」；它對於文化歷史的關係，粗略地說，就像地質學對於古生物學似的。耶夫梯語言學也極重視語言學上的古生物學分析方法，它把語言發展的各階段和社會經濟構成的各階段聯繫起來。這種新的研究方向已經不像印歐語言學那樣專就靜止的語言現象去比較他們的構成形式了。從漢語裡的借字來看，像「師比」、「師子」、「璧流離」、「葡萄」、「苜蓿」之類，反映着漢代或漢以前的文化交流；

倘有清初石溪、石濤，自抒性靈，略有古人作畫遺意而已；至精深博大，高古雄强，都不逮宋人遠甚，石濤因遊蹤較廣，頗能會心造物變化，不爲成法格局所拘，但寫人物、樹木，俱功力未逮，近人雖好言石濤，究不能舉出石濤神品爲何幅也。

技法之檢討

金碧山水

在畫幅上所存中國最古之山水，應推有名之展子虔幅（張伯駒藏）此幅無欵，但可斷爲王維前物，因尚未及於成熟之山水也；宋以後人，多喜仿大小李將軍之金碧山水；實中古人守印度畫的作風小變；但青綠山水，亦具至理，我在1920在柏林見德國畫家他稻Hans Thoma幾幅風景，逼近中國青綠山水，但接近自然，風格逼眞；後於1940夏，居喜馬拉雅山，偶至客鄉 Kashen附近七千尺左右高處，望十餘里外對面滿種茶樹之山上，全是中國畫青綠山水，（四青與四綠）（若古人用頭青與頭綠，則推演出而將就用之，實胡鬧也）（實因古人無花青藤黃）此必在高處，且山上全披葱鬱之植物，於繁茂之際，觀者必須置身同等高處。平視（高視便無此色）不太遠亦不太近，日光斜照，方得此淡石青石綠之美麗色彩；用赤金鈎出，更有意義；因如太陽正射，則山勢失其起伏；如反射，則成一片灰色；若用濃墨鈎出山勢，則嫌太重；倘用淡墨，則又顯得軟弱；只有用赤金鈎出，恰到好處，又顯得光采，我想大小李將軍，當年皆活動於陝西長安一帶，可能在秦嶺，或在山西五台山習見此種景色，故善畫之如是（金碧山水）。在中國西南部，若四川、雲南、貴州、應常常看到如此眞景，江蘇的董其昌硬派太原王維爲南宗，因其大概少寫江蘇所無之層巒叠嶂也。（王維畫現在世上已不存在，我們推崇他，因根據蘇東坡詩『……吾于維也歛袵無間言。』因爲唐宋繪畫水準極高，能令東坡傾倒如此，必是一曠世天才，惜乎由他創立之中國性格（民族形式）水墨山水，因爲文人所祖，首先抹煞了具有優良傳統的工匠所作大幅人物題材的華貴作品；（主要如壁畫）而發展成爲脫離現實徒具形式的文人畫；終至沒落而成八股山水。便反而斷送了中國全部繪畫，眞是出人意料。

淺絳

只用花青赭二色（一冷一熱）渲染；不用其他別種色；謂之淺絳。此作晨霧，頗有效果；因爲用同等深淺（極淡）能區別光量，確爲聰明辦法。但於花卉，便不適宜。尤其幅幅都是淺絳，便顯得單調。石溪、石濤、最犯此病；此所謂『知其而不知其然所以然。』

又淺絳渲染，必須施之有章法之山水；不宜用於數樹一石之片幅；因片幅太具體，僅冷熱兩色，不能了事，反不若淡墨一色概括了。

我舉一事，證明今日中國畫山水者之通病。

我在1938十月漂流廣東西江到江門，其附近四會，爲中國著名大村，（五萬人口）實可稱一城；其地有一陳君，曾執教于廣州市立某學校，聞吾至，來舟相訪，請過其叔家餐敍；飯後出其爲其叔寫西江尋夢圖，因其叔有一愛子十七歲而殤，心甚痛之，故命陳君作圖紀念；閱竟，吾贊其畫法之佳，陳君更請深言；吾因詢陳君，此圖可易題爲長江尋夢否？可易爲黃河尋夢否？甚至爲黑龍江尋夢，亦無不可；因不能確指境地也。陳君愕然；因問：如先生言，當如何而可？吾謂既然是畫廣西江，倘不能用屋宇表示廣東房舍結構與別處不同，必當用植物表示，如長江以北少竹，黃河以北更罕見，竹之產兩廣者，多叢生之慈竹，不同於江浙兩湖皖贛竹能成林；福建廣東，多見垂根巨榕，湖南江西四川亦有之，但不垂根而大葉；芭蕉在廣東者，結實纍纍，至江浙四川倘能開花，便不結實；廣東近熱帶，多叢樹參天，他處無之；若在圖中多寫三五株高叢樹，畫幾叢結實芭蕉，則畫自然不能移動境地了！陳君恍然。又如匡廬雁宕，無層巒而有叠嶂，因無高峯；黃山蓮花峯，雖全是巨石所積，但可用荷葉皴，而不得用大斧小斧劈法；江浙少數百年之大樹，如北京習見奇態異態之古柏，因有大寒大熱大風，若氣候溫和之地，如成都丞相祠堂前所產大柏，一長直上五丈高，毫無姿態，因不須與天時奮鬥也；若雲南點蒼山下三大唐柏，因爲點蒼山的西風厲害，故又具姿態；記得我做一首打油詩詠之，『虬枝欲挽朝暾住。激戰西風日夜間。直到斧斤不敢赭。天留古柏伴蒼山。』因近一千年的西風，吹得柏枝完全東向，好像要伸出臂膊拿日出也。又蒼山山勢，全是王蒙皴法，他處似未見過，王蒙初未到過雲南點蒼山，而能暗合如此，此又似鼓勵人閉門畫山水了；但王蒙畫，無遠近法，到底看出他未常接近造化，不稱當行；比如郭熙善畫水層岩，馬遠善畫石灰岩，董源善寫土山，倪雲林不寫大樹，皆是忠實表徵；後人懶惰，不解師法造化，便自然主義都談不上，所以愈不成其爲畫家了！

近尚有與八股山水並行的畫，香蕉蘋果一類低能的東西。我又想起一事，一九二七抗日戰爭起，我隨中央大學遷重慶；四川省政府，聘我招考中等學校圖畫教員，請我監試並出題；我即出一題，『要畫中有兩個人在工作，耕田也好，挑水也好，但要看出是四川人；要一株大榕樹但樹上不要畫葉子。』諸生想了半個鐘頭，畫不出來；於是怨聲載道，說：這像啥子題目，四川人還不是與別省人一樣的，樹不畫葉子，怎看得出什麼樹？我即起解釋道：『一個中等學校教員，當然不必要能寫傑作！但是我要測驗你們，能不能觀察自然，着要用形相來區別人，自然甚難，比如說安南人當然大別於蒙古人，廣東人，不同於河北人，倘用打扮服裝做區別便容易極了，頭上裹了一大白布頭巾，上身穿件長衫，而光着腳，這不是一看就是四川人了麼！至於榕樹大異柳樹，柳樹大異於松樹，倘畫柳樹不畫葉，可能被認爲別的樹；但榕樹盤根錯節，又巨大非常，如寫出被人誤認，那就奇怪了。』衆方蕉服，但終於草草了事。向來埋頭於八股山水或用功畫香蕉蘋果的人，自然無辦法作出此題；事後亦未產生任何影響。我所持的道理，可說不錯，祇因不配合政治；因之不發生作用；比如今日，說明藝術應服務於人民大衆，倘連這些都不會，那就用不着你道一類的畫家！情形就遠不相同了！

八股山水畫尤扼殺了我國工藝美術；如我國瓷器，漆器，刺繡，都因製作者懶惰，用山水代替圖案，致沒落到比原始陶瓷都不如；比如一個瓷器，一件漆器，一幅刺繡，加上山水，還能與人什麼美感覺？光的白的倒顯得干淨多了！因爲牠決不可能像眞山水，亦決不可能有山水畫畫面上的優點；甚至連八股山水都不如！（比祂省事）（費事而不得效果，就顯得俗氣）所以山水畫雖曾成過好東西，但沒落了的八股山水，卻成爲一件壞東西了！（聽說爲了遮掩瓷器上毛病的緣故，但無別法可想麼？）

再舉一個例：如階級鬥爭英勇抗戰一類題材，當然不能責之文人畫家；但中國古今文人最歡羨之事，最理想之景，莫過于桃花源；但此中人物鷄犬，如董其昌王石谷輩，能夢想得到麼？還說文人能勝任麼？，並桃花源尚不能想像，還有什麼前途呢！

總之藝術需要現實主義的今日，閒情逸致的山水畫，儘管牠在歷史上有極高度的成就，但牠不可能對人民起教育作用，並也無其他積極作用；其中傑作，自然能供我們閒假時欣賞；但我們現在，即使是娛樂品，頂好亦能含有積極意義的東西。我們之中倘有天才，希望他能寫出各種英雄（如戰鬥英雄生產英雄等）的史實，各種模範的人物凸出着我們幸運遭過這個偉大時代。像烈炳，蘇里可夫，米該帝，（意大利十九世紀大畫家『Iario』漁家女之作者）等人，類似之作品；倘從文化着眼，中國五代北宋山水，已成漂澎高峯，我們便有能力向上堆讚，亦加高了有限；現實主義，方在開始，我們倘集中力量，一下子可能成一倘譜。同條使用天才，牠能爲人欣賞，又能鼓舞人，不更好過石溪石濤的山水麼！

「我覺得關於這一點語言學家的任務比文藝工作者格外重要。如果大家聯合起來照我所提議的辦法做一番工夫，那麼，語言學家研究的結果，可以供文藝工作者的取材；文藝工作者應用詞彙的擴充，也可以鼓勵語言學家更作進一步的探索。這樣相因相成，彼此都會因為聯繫而得到發展了。

關於語法的研究，以前的成績也不夠好的。馬氏文通的方法固然遭受到「拉丁文法漢證」的譏評，可是一班研究國語文法的，除去一兩部較好的著作，也還不免「拉丁文法今證」的缺陷。至於各地方言的語法研究，那簡直還沒起頭兒呢。咱們現在應該嚴格使用描寫語言學的方法來分析現代中國語的結構，必須一空依傍，完全拿人民大衆的口語作根據，然後才能得到活語言的正確語法。等到現代語法有了頭緒，才能本着歷史觀點，用同樣的描寫方法，去分析以前各時代的古文法。這兩種工作不能混起來同時並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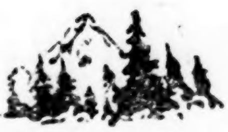
第四、咱們應該認識研究國內少數民族語言的重要性。關於國內少數民族的語言研究，無論在學術上或在政治上都是很重要的。我最近在進步日報上發表了一篇論文，特別側重西南少數民族語言的研究（參看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六日進步日報第一版）。其實在東南一方面像浙東的畲語，海南島的黎語，台灣的高山語；東北和西北兩方面像屬於烏拉爾阿爾泰語系的通古斯語、滿洲語、蒙古語、畏吾爾語、赫哲語、錫伯語、索倫語等也都是同樣重要的。比方說，滿族是否算少數民族問題，各方頗有不同的意見。可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還在切實調查現存的滿族有沒有特殊的語言、風俗和地域。近兩月來我正在記錄一種滿語支屬的錫伯語，才知道現在伊黎河南岸還有十幾萬人能說這種語言，還保持着滿洲人固有的風俗習慣，並且都從事於生產。我對於這個問題在沒調查研究以前從來沒說過話，現在由於具體事實的反映，我倒要喚起推行民族政策和主持民族事務委員會的人特別注意了。

最後我希望全國的語言工作者結合起來，批判地接受我的四個建議，有步驟、有計劃地為建設中國新語言學而努力！

一九五〇，一，二八。

漫談山水畫

徐悲鴻



我們在今日正與帝國主義作艱苦鬥爭之際，繪畫與一切藝術，均須正對現實，裝飾工具，反而來談論山水畫，可謂不切實際；而且我又在百忙，動機是友人蔡先生，偶然與我說起有人向他提出山水畫問題，需要作一答覆，我因此事與我國文化遺產攸關，研究頗久，手頭材料，亦還不少；便自告奮勇，檢討一番，代其答覆。

山水之為畫，當然不可能有積極性，他是資產階級的心力收獲之一種，所以牠也成為遺產。我國山水畫上之造詣，有人認為是人類創作中之一奇 H. G. Wells；我們就山水論山水，確實有牠的獨到處，是可以值得驕傲的。

山水於畫中為最後起之成物；因須綜合人物，鳥獸、建築、營造、樹木、山水、一切構成在一幅中，非樣樣東西達到完成，不能有山水畫；而畫家又必須樣樣精通，纔能創製山水畫。所以眞正有中國性格之山水畫，成於八世紀之水墨山水創作者王維。比較完成西洋風景畫之荷蘭雷恩代 Ruisdael 霍倍曼 Hobeme 法之羅蘭 Claude Lorrent 意大利之干奈來篤 Canaletto（十七世紀）幾乎早及千年。十五世紀末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 Bellini 裴里尼弟及落南達費音棱 Leonardo da Vinci 畫中，好以風景山水作遠景，但未發展成立山水畫，而中國大小米，好為韻味深遠之雨景，始用點，尤早過法國印象派 Inpressionisme 千年。（彼用色調此用墨采，求取韻律，原理則同）而山水畫中巨人，如荊浩、董源、范寬、李成、郭熙、郭忠恕、米元章、李唐、馬遠、夏珪，皆有傑作可稽，造詣眞確。（宗炳大小李將軍王維、王宰、張璪、關同、巨然輩、其畫全失，或無傑作，存而不論。）如范寬之溪山行旅（故宮博物院）宋人溪山暮雲（傳李成筆故宮博物院藏）郭忠恕岳陽樓（方雨樓藏）夏珪之西湖柳艇，（故宮）北溪圖，（明周東村畫藏日本）風雨歸舟，（金冬心）眞可說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萬古常新的東西！因為范寬居太華，習見雄峨之山，董源居江南，則不為叠嶂，寫出眞情眞景，所以至今日，仍予吾人親切之感，便是倪雲林，黃公望，吳仲圭輩文人畫，（人以為對於外族統治消極的抵抗）亦不脫離寫實；惟王蒙好為長幅層巒，移遠景直立，作近在咫尺之象，（青卞隱居圖等）顯得矮揉造作，但其樹法，實古今第一，無人能及，如倪黃所作，皆二三五年長成嫩枝，不得謂之樹木，不及王蒙樹法遠甚，但元孫君澤、明之周文清、沈石田、仇十洲、袁江輩，皆能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其作品多遠離當時統治階級俗氣，得飄逸之趣；此文人竭盡心力之成功，不同於董其昌輩，達官顯宦，想不勞而獲的投機份子的末流文人畫。所謂人物鳥獸營造花木山水樣樣精通，方畫山水者，此輩人物鳥獸花木營造件件不會，方畫山水！到了四王，專意販賣古人面目，毫無獨創精神，（古人所謂仿某家，撫某人者，因畫中作風偶然與古某人相近，恐後人譏其抄襲，索性自己寫明仿撫某人，有謙虛之意，到了後來，非仿撫古人，不得云作品，眞是奇談。）到了李笠翁，便糾合畫家，編了一部三個月速成的芥子園畫譜，讓當時那些資產階級的念書人學幾筆畫，附庸風雅，於是扼殺了中國全部繪畫，不僅山水一門，直三百年；因為有了芥子園畫譜，畫樹不去察眞樹，畫山不師法眞山，惟去照畫譜模仿，還是什麼龍爪點，那是什麼披蔴皴，馴至連一石一木，都不能畫，低能至於如此！可深慨嘆。而歐洲自十九世紀英國康司太白 Constable 吞納 Turner 兩大風景畫家出，將中國山水畫家所誇羅的（神韻境界）完全做到；一直發展到印象主義的穩耐，將天涯水角，悉成畫材，平地草堆，包含光氣，着手成春，皆能動人；即便不能創派的畫家，如德國之 Ahenbach 安亭拔赫，法之陀皮尼 Daubigni，俄之來維當 Levitan，瑞典之酒魯 Taulov 也都能依據自然，寫出隹妙作品，超出古人；不像我國，每況愈下。

從教育前途看師大改造

董渭川

（一）前言

我是師大的一份子，離開她二十多年，再回頭來，覺得她雖然經過許多折磨，並無多大改變，只是更老了些。在最近一個多月中間，參加改造師大的研討工作，使我對於她的問題，了解到多方面的材料與多種人的看法。並且全校師生工警反覆討論的意見，是由我來執筆作總結（初稿）的，尤其使我獲得了全面的，深入的機會。

總結已呈送到中央教育部；究竟怎樣決定，此刻尙不得而知。因此，「新建設」的編者要我對此問題寫點什麼，在我是很感爲難的；爲難在於師大的總結業經送出，而到這一期「新建設」出版時，可能已看到政府的決定，恰恰在這個時期，發表意見，不免有「無的放矢」之嫌，並且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才合適。不得已，只好就我個人在此研討過程中，所學習的與所希望的，零碎寫點出來，使讀者略知師大之所以必須改造以及改造必須用力的幾個重點而已。

以上是題前的聲明。

（二）改造的根據

爲什麼師大非改造不可？一句話：因爲新的中國賦予了師大新的任務，而現在的師大缺乏完成新任務的充足條件。從這句簡單的答案，可以看到，問題是從兩方面發生的：（一）中國是新的了；（二）師大還是舊的。並且還可以進一步體認到兩種事實；（一）中國的新，必然不允許保留師大的舊；（二）要破除師大的舊，又非以中國的新爲其根據不可。綜合起來看，就是小環境沒能跟隨大環境的革命而變新，而不能配合大環境的要求，兩者發生矛盾，所以大環境一定要使小環境也走上新路，逐漸地統一起來。

以此之故，要談小環境的改造，只有從大環境的新找根據。新中國之所以新，用不着本文來說明。但是有關於改造師大這個小環境的若干大的事實及其未來的發展，却有在這裏切實探究之必要，因爲這一切正是逼使師大走上改造之路的背景。

當然，新中國所有的一切，都直接間接千絲萬縷地關聯着師大。而最直接最密切的，第一，應該是由人民政協產生的建設新中國之「共同綱領」中的「文化教育政策」，第二，應該是最近中央教育部召集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總結」。前者是今後若干年內新中國文化教育建設的總方針；它是從老解放區二十二年來與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土改運動等等密切結合的許多文教工作中探索出的、積累成的、正確的、寶貴的經驗的結晶；其每一字句都是長期地用鮮血洗鍊成的。後者則是在前者所指示的總方針下，結合了新中國解放戰爭、土改運動和生產建設發展到現階段的情勢、需要與條件，反映了各地區教育工作的情況和目前存在着的問題，交換了關於老區與新區的教育工作中若干重要的經驗，而產生的在最近一兩年內必須大量開展與必須積極準備的各種教育工作。前者好比如一張支票，後者則是票款的第一期兌現。總之，由這兩個歷史性的文件，已可窺見今後十年八年之內，新中國教育的方向及其事業。師大之所以必須激底改造，正是這兩個文件所促成。

把兩個文件的內容綜合在一起看，不論其爲抽象的方針，抑爲具體的事項，皆與全國的每一學校有關，並且其中有幾點特殊和師大有關。所謂特殊，是最直接、最顯明的意思。因此，光列舉特殊有關的並不夠，還須從一般的說起。下邊僅就其犖犖大端言之。

（一）就本質看：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教育和舊民主主義的文化教育，尤其是和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的文化教育比較，基本上的區別，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爲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文化教育。」這是一個最高的準則，也正是衡量新中國每一學校的尺度。不論什麼學校，其一切設施只要不合乎民族的形式、科學的內容、大衆的方向，必然就成爲問題。

（二）就任務看：「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爲人民服務的思想爲主要任務。」這種種鮮明的、具體的並且是必須經過强力鬥爭而後能逐步實現的任務，在帝國主義者和蔣匪幫控制了幾十年的各級學校裡，能夠順利地担負起來並逐項完成嗎？不需要經過長期的改造嗎？

（三）就對象看：新中國的政權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爲求此政權的鞏固，所以將成爲「新中國的完全新式的高等教育的起點」的「人民大學」，其對象「不僅有青年知識份子，還要吸收工農青年和幹部」。但是工農青年不可能一步就走進大學，於是乎有了「另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就是普遍舉辦工農速成中學。」「我們要求全國的部隊、機關、團體和學校都儘可能地爲青年工農，爲多年參加革命鬥爭的青年和成年工農幹部，辦這樣的速成中學。這批工農幹部乃是我們祖國最寶貴的財產，我們必須負責將他們培養成爲知識份子，培養他們負担建設任務。爲着同樣的理由，我們應該大量辦理工人業餘補習教育。」由此可見，今後我國高等與中等教育，既必須服務於新的政治，便不能不首先以青年和成年工農幹部爲對象了，並且其制度和方式也不能不隨着大起改變了。

同時，爲了「工農大衆易於掌握文化科學，作爲鬥爭與建設的武器，作爲鞏固與發展人民民主專政的武器」，勢須「作必要的準備，以便在全國範圍內進行識字教育、掃除文盲的工作」；也就是「在全國各個地區，應該着手準備識字教育的教材和組織羣衆中的師資，爭取從一九五一年開始，進行全國規模的識字運動。」此一偉大而艱鉅的運動，拿蘇聯的經驗看，一方面與全國每一知識份子有關，另方面更是供給領導幹部與研究教材方法的師範學校責無旁貸的當務之急。

師大改進的工作重點——課程

黎錦熙

在差不多三十年前，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醞釀升格改爲師範大學時，一九二二年的全國學制會議才討論這個提案，有人提出問題說：「所改之師範大學，係專辦教育科，以備大學畢業生升入乎？或於教育科外，兼設師範生畢業後應教授之學科乎？」當時高師教授們主張兼設各種系科的就提出理由說：「就教材言；學校因目的之不同而異其效果，學科亦因目的之不同而異其標準。師範大學，一面研究學科，一面須顧及此種材料對於中等學校學生有何等價值？在普通教育上必要之程度若何？故其學科標準，較他科大學專在該大學本身目的上着想者，其取材範圍，自多差異。例如同一化學學科也，而農醫工理各科大學所取之材料均不相同；師大之化學學科又與農醫工理各科所取之材料互異。若畢業後志在農科之學生，强令其學工科之化學，盡入而知其非；則已學農科之化學者，畢業後令其教授師大畢業生所應教授之化學，豈得謂當？就教法言：師大與他科學生既以性質不同而異其教材矣，即教學法亦未可同日而語。例如物理之定律，數學之公式，在他科大學或專以爲深究之資，或藉以爲運用之便。若在師大，則除以上作用外，兼須研究其教學方法，以爲施教之地。」

現在看來，師大制度雖然在那年建立起來了，但三十年前有人提出來的那個問題，一直存在，沒有得到解決；而作爲答覆那個問題的建立師大的理由，也還只是理由，沒有澈底實現。

過了十年，到一九三二年，教育界對於師大這種制度又發生疑問了，說：「我們實在看不出普通大學的物理、化學、或英文、算術和師範大學的物理、化學、英文、算術，有甚麼性質上根本不同的地方。」當時師大三十八教授集體研討，總結起來，嚴重而概括地說出師大課程與普通大學課程不同之點如左：

(1)普通大學課程注重文化的提高，師大課程注重文化的持續與推廣。前者要培養「專門搜討」的技能，後者要養成對於現代文化各主要因素的「多方興趣」。普通大學畢業生是文化價值的發見者，其興趣與技能侷限於知識中的一極小領域；師大畢業生是文化價值的傳授者，其興趣是多方的。要有多方的興趣，才能做良好的中學教師。

(2)普通大學課程注重學術的理論，師大課程注重學術的應用，尤其是在中學教學上的應用。普通大學雖然也有時注重實用，但係屬於社會方面的，不是屬於教學方面的。譬如大學的工科所研究的問題，是如何利用工業上的發見以改良中國的產業；師大工藝科所研究的問題，是如何利用工業上的發見以改良中小學的工藝科或手工科之教材。

(3)普通大學設系及科目要「包羅萬象」，師大要「取精守約」。前者更廣汎，後者更集中。師大課程以中學課程標準爲根據，所以科目更集中，更系統化，更有重心。

(4)普通大學課程以普通工具學科或文化學科爲其共同基礎；師大課程以教育學科爲其共同基礎。前者公共必修科有國文外文哲學等，均係工具學科或文化學科；後者公共必修科則除此以外還有教育學科。現北京師大公共必修之教育科有教育概論、教育心理、教育史、普通教學法、教育行政、健康教育等。

(5)普通大學各學科的內容，代表「文化的材料」(Kultursgüter)。；師大各學科的內容，代表「教化的材料」(Bildungsgüter)。大學中所設置的學科，要傳授文化的材料，或發見新文化的材料；師大所設置的學科，要將這些文化的材料變爲有教育價值的材料，即是教化的材料。關於這點，德國教育家克欣斯泰尼(Kergohensteiner)論列最詳。(參看 Theorie der Bildung)這就是師大的「課程專業化」(Professionalisation of the Subject matter)。

當時師大三十八教授還有一個通電說：「就所設系科之多寡言之，一般大學不妨務博，而師大必須務專；就每一系科乃至每一科目之內容言之，則一般大學必須務專，而師大又當務博。」後來又解釋說：「所謂專，是專以中等學校所必需者爲設系科之目標，不求大學規模之齊備。所謂博我們簡要的詮釋是：既設此系，則必使其課程系統化，常識化；精攻者不令偏枯，深入者務能顯出。這就是說：對於基本的功課，要『系統化』；對於專門的功課，要『精攻』，要『深入』：但這都還是就師範大學與普通大學一致之點而言，還有大不一致之點，卻要請大家注意的，就是：(一)『系統化』了，還要加上一個『常識化』，因爲師大學生的任務，是不可不及早認識所學的材料之教育價值的。(二)『精攻』了，還要加上一個『不令偏枯』，(例如文史等系，雖研討不避高深，然不似一般大學每以一家言、一專籍、一問題而特設科目；所以每系之中，必修科目多於選修。在一般大學的中國文學系學生，或專究文藝或專究語言文字學，乃至專究國故思想皆可，而師大的國文系學生，必須三者皆有相當的造詣，且必須應用其語文技術於改訂中小學生作文與說話而熟練其教學法；所以每系之中，各門平衡發展，且必須一一能教育化。)因爲師大學生的任務，是不可不及早準備作完整健全的中學某學科之教師的。(三)『深入』了，還要加上一個『務求顯出』，因爲師大學生的使命，是不可不及早培養一種宣傳文化學術之能力的。」

現在看來，差不多二十年前師大教授們所宣示的理由——師大必須兼設各種系科以及獨立設置的理由，都是對的，但一直只是理由，並沒有完全實現。

又過了十多年，到一九四九年，號稱全國師範教育討論會的，又提出改進現行師範學院制度案，因爲那時候已經把師大制度改爲師院，分區設置，試行了七八年，成績更使人不滿，所以又議改進。但這十多年間的兩次改動，關的都是校院名義與組織形式問題，對於系科課程，仍舊沒有從教材教法上提出實際改進的方案來；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師大教授們所堅持的理由，一直還是理由，更沒有打算促其實現。(即如抗日戰期中師大西遷後改成的西北師範學院，到一九四五年師院改進議起，就專設了一個研討委員會，研討結果，偏向恢復大學制，曾設計把全國分爲九個師大區，擬定校址，配合各區的人口數和中等學校學生數。也認定系科課程的改進是研討這個問題的核心，但一直到現在，師大已恢復了，而結論還沒有出來。)

(下接第29頁)

專任某一科的教師，那末，師大就不宜單獨就這一科成立一系，勢必至於和其他相近的一系或兩系合併設置，才於各方面都適宜。課程亦然，因教師的興趣或者抄襲外國而開設許多門類的辦法，既使學生担負過重，又與中等教育無直接間接的任何關係，其弊害不可勝數。要矯正此一錯誤，只有本上述「理論與實際一致」的要求，澈底清算，而後認眞精簡。至於教材，很多是從資本主義國家販運來的，到今天，也必須根據前述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尺度，作嚴正的批判了。

同時再考慮到農工大衆以及在職幹部和業餘補習的種種實際需要，老區中小學教育「鞏固和提高的關鍵是師資和教材問題的適當解決」的諸般要求，則師大的系科、課程、教材各方面，更有逐步地日新月異之必要。

內容，實在是師大改造的核心問題。今日倘能由方向的明確而內容獲得初步的調整與進步，不也就等於在那個大包袱上割開若干裂口了嗎？

（三）方法問題：走上講台去照講義解釋些教條，或者介紹些洋理論與洋實驗，再或者高談闊論一番，學生們一面聽一面抄錄些筆記，到一定時期，出幾個死背死記的題目，考試及格，給予學分完事。這本是一般大學固有的教學方法，並非師範大學所專長。可是師大的畢業生又拿了這一公式去教中學生，「輪迴教育」的把戲，便從這裡上演。今後教育所培養的「人才」，既然必須「應革命工作和國家建設工作的廣泛需要」，則師大的師生在教學上還應當再因襲傳統的方法嗎？

除掉各科教師應和學生共同商定「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之外，還應該儘量運用學習小組，讓學生養成自動研討的習慣；教師只居於領導和輔助的地位。但是這還不夠，眞要聯繫實際，則必須把參觀和實習等事作爲教學的組成部份，有計劃地進行，並且規定一定的比例。這樣做，則教師所負的責任，不只限於課堂以內，而且把指導自修、討論、參觀、實習等工作通統担負起來。這不單純是教學方法的一大變革，抑且是師生關係的積極改善。所以這是繼方向與內容而來的改造師大的又一重點。

（四）師生思想改造問題：這是師大一切問題能否改造以及改造到什麼程度的關鍵，因爲上述的方向、內容與方法都是建立在師生的思想基礎上的。思想不變，則一切不要求其變，甚至於反對其變；唯有思想變了，才切實考慮如何變，才有勇氣扔掉每個人背上的包袱，才有變的需要與力量。青年學生的包袱小，容易跑得快，自然就樂於接受改變，並且還能推動改變。當教師的可就比較費力些了。先就教學觀點說吧：「爲人民服務」的漂亮句子，誰都會順口溜出，但是僱傭觀點却不易捨棄。照規定，每人担任八至十二小時的課；倘使超過八小時，心理上就叫屈，又如何談到經常指導參觀、實習、自修、討論，對學生全面負責？另一教學觀點是超政治，也可說是超階級。如果要求每一科目的內容，澈頭澈尾貫串了階級觀點，使其服務於無產階級領導的政治，則多少課本與講義須從頭另寫，這又是談何容易的事？談精簡課程吧：若干科目取消，則可能影響到個人的興趣與利益，尤其是違反從資本主義社會培植來的觀點，這對於個人的精神和物質是多麼大的損傷。談領導師範生走入鄉村，參加土改工作，去建立階級觀點與羣衆觀點吧，則又可能阻礙叢生，疑慮多端，尤其感覺學生犧牲課堂聽講的不應該。事實不必多所推論，由這種種，已可看到如何提高教師的政治水平，是克服上述一切難題的基本功夫了。這些情況固然也非師大一校所特有，可是研究如何改造師大，就不當因其具有一般性而忽視、而放鬆。況且政府已規定「對新區學校安定以後的主要工作，是有計劃有步驟地在教師和青年學生中進行政治與思想教育，其主要目的乃是逐步地建立革命的人生觀」，師大在改造過程中，不更應該強調此一改造工作的重要性嗎？

以上只就方向、內容、方法與師生的思想四方面的問題，略作闡釋，以見當前師大應特別用力改造的重點所在。

（四）改造的力量

本文就新中國教育的趨勢說明了師大必須改造的幾個重點，於以見小環境與大環境之不可分；師大如果不能把握時機，認眞地作自我批評，積極地作自我鬥爭，則有爲大環境的遺棄的危險。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中已經爲「師資的問題」提出「改進北京師範大學」的要求來了。

更進一步說：一所大學的自我批評與自我鬥爭，是集體的而不是單獨某一兩個人的行爲。因此，我們必須承認，現有師大一千幾百個師生工警的集體的自我批評與自我鬥爭，一定要建築在團結上。團結就是力量；只有團結，才能使師大日臻進步，進步到成爲不折不扣的「人民的師大」。所以要改造必須從自覺的有批評有鬥爭的團結出發。如今師大的「工會」成立了；有工會、學生會、黨、團各方面一致携起手來，協助行政當局，便不難保證師大改造的成功。

最後還要聲明一點：本文題目上用了「改造」，而不用「改進」，因爲我感覺大環境的確在要求師大作「全盤的改造」，不過在進行上作「逐步的改造」罷了。

一九五〇，一，一〇草成。

師大改制的思想教育意義

焦菊隱

北京師範大學的改革，不但是本學期全校學習討論的中心問題，也是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一九五〇年重點工作之一。這說明，師大改制是領導機構和羣衆共同一致的要求，也更說明這一致的要求是有它重大的意義的。

首先，邁行改革新中國的大學教育制度，教學方法，和教材內容，目前有迫切的必要。中國大學的制度，最初是抄襲日本，接着滲進去一部份英國和法國的成份，最後，又全盤搬進來美國的一套辦法，其中又參雜着些法西斯德國的精神。舊的大學制度，完全建基於帝國主義的需要，無論國民黨反動派寫出過多少美妙動聽的大學教育目標和任務，他們心裡所要培植的學生，

（四）就師資問題看：老區和新區雖同樣需要師資，而問題的內涵不同。新區因爲解放不久，有些地方尙未進行土改，現有的各級學校幾乎全部是舊型正規化的。在這種學校中工作的大多數教師，不僅其教材敎法是舊的，更且其數學觀點也是舊的；再進一步說，其政治立場是舊的。既然「在新區應堅決執行維持原有學校，逐步作可能與必要的改善的方針」，則如何使這些舊教育者「獲得新觀點、新方法，爲中國人民服務」，就成了改進新區教育的基本工作，因而肯定「爭取團結和改造知識份子是新區敎育工作的關鍵」。老區呢，「首先是中小學教育，在土地改革後有了大的發展」，但是「由於人力財力的限制，現在應以鞏固與提高爲主」，只有「在條件許可時，可順應羣衆需要作某些發展。」至於「鞏固和提高的關鍵」，則又歸落到「是師資和教材問題的適當解決。」

由上所述，老區的師資問題固有待於師範教育的改進，而新區的師資問題，更使師範教育感到雙重的負担，就是新區各級師範學校的一般教師在政治認識上與思想上尙有待於改造，更不要說到培養下一代的師資了。

（五）就整個教育問題看：「理論與實際一致」被强調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敎育方法，這正是針對過去理論脫離實際的傳統方法的革命。「人民政府應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教育內容和教學法。」從這句話，又可以理解到舊教育留到今天的制度、內容與方法，必須全盤改造，不過受種種條件的限制，不可能立即做到，而應該有計劃有步驟地「積累比較成熟的經驗」，逐漸推廣，以達於革命的理想。然則誰來探求這些經驗呢？各級師範學校，不應該在政府的領導下，對這些必要的改革，走前一步嗎？

以上爲了說明改造師大的背景，從兩種劃時代的文件中，綜合出了幾個有關的重點，就是自新民主主義文化教育之本質、任務、對象，三者的革命要求以至於師資、方法、制度內容、等等的通盤改造。這一切，既顯示着新中國文化教育在現階段必須克服的各種難題，又決定了新中國文化教育由近及遠逐步實現的政策與工作。不論新區、老區，任何學校的改造與提高，都必須以上述的一切爲根據；師大的改造當然不許其例外。

（三）改造的重點

說到這裡，應該拿現在的師大和上述的種種作一對照了。

師大是一個具有了四十七年歷史的學校。由「四十七年」，可以回溯到她是在滿清帝國時代產生的；是在中國淪爲半殖民地之後，爲效法外洋而舉辦的；是經過北洋軍閥統治的；是一面遭受日本帝國主義者蹂躏又一面流離播遷過的，是在抗戰勝利後就敵僞主宰過的師大基礎上恢復的；更是爲國民黨反動派長期控制過的。這一聯串不幸的命運，固不僅設在北京的師範大學所特有，但是一個高級的師範教育學府，背負着這麼一個大包袱，其中裝載着這麼許多悲慘的史册，到今天，雖已投入新中國的懷抱，可是要她立即丟下包袱，爲新中國的人民服務，也就是爲培養新民主主義教育所需的人民的師資而工作，不感覺困難嗎？

當然不容否認，在四十七年中，她造就了上萬的中等學校的敎師；這些人，大部份能堅守崗位，孜孜矻矻地盡忠教育。並且她也曾參加過五四、一二九、……以至於反飢餓，反迫害、反美扶日、……種種的革命運動。還特別遭受過「四九」的禍害。再就是她也曾有若干兒女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投身到人民的解放戰爭。但是就整個的學校來說，在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裡，長期被各種魔掌扼抑着，要她跳出那些魔掌，要她培養的師資不爲反動統治階級服務，是可能的嗎？

也還不容忽視，自北京解放後，她就在人民政府領導下，自覺地要求追趕時代，研討改進，取消反動的機構，廢除反動的課程，增添新的政治思想科目，改變不合時代需要的學系，延聘進步的教授，精簡各系的課程，改進敎學的方法，……這一系列的工作，的確使她在過去的大半年中提高了一大步。不過時代在飛躍前進，她背的包袱太沉重了，畢竟不容易立即跟上。

最近一個多月，由於中央教育部的號召，在師大的全體師生工警中又掀起了研討改進的熱潮。這一熱潮，是有領導有組織的，由校務委員會，教職聯、學生會、工警會各方面的代表共同組成了一個「師大改進研究會」；運用經常作政治學習的基層小組和中層機構，再配合上各個學系；由上而下，一類又一類地發出供討論參考的「問題提綱」；再由下而上，一步又一步地作出對於每一問題的總結；而後作出最後的全盤的總結。問題與總結，如果一一介紹，不免話長，本文只好從略。要談的是本着前文所述新中國文化教育的趨勢，來分析師大當前必須致力改造的幾個重點：

（一）方向問題：師範大學之設立，是爲了供給師資的。過去四十七年中雖然她產生了數量不算少的師資，散佈到全國各地，但是到今天，她所培養的師資必須具備些什麼條件？是爲誰培養的？出去幹些什麼？如何幹？在質量和數量上達到什麼標準，才算完成了師大對於新中國的任務？要解答這些問題，首先就要根據前述的「文化教育政策」來檢查師大背負的那個大包袱。大包袱中的那些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的史册，雖已減少了若干，而包袱依舊不小，並且就發展的過程說，恐怕不可能一下子扔掉，只有逐步地減低其重量。因此，改造師大，就是要有計劃有步驟地由減輕而扔掉這個大包袱。道理很簡單，包袱不扔掉，不可能培養出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師資來。申言之，包袱中那些反人民的史册，對於先生的教和學生的學，隨時隨地會發揮其潛在的支配力，而使先生學生走上錯誤的方向。反轉來說，只要師大產生的師資，能夠掌握馬列主義理論、毛澤東思想以及進步的教育科學與技術，再加上其他有關的專門知識，並且具有爲人民教育服務的事業精神，就不愧爲新民主主義下的師範大學了，也就證明她把包袱扔掉了。不過，這不是容易的事，一面要經過長期的自我鬥爭的過程，又一面要靠人民政府的正確領導和因大環境繼續進步而無形中不斷給予壓力。

至於說因爲比照普通大學，也致力於高深學術的研究，因而妨礙到培養師資的任務，這問題倒是其次的。只要努力於供給「人民的」師資，則環繞着這一正確方向的其他種種，自會統一起來的。大問題還在於壓在背上不易扔掉的那個大包袱。

（二）內容問題：緊跟着方向的就是內容，因爲內容不適合，則不可能達到一定的方向。分析開來說，這裡邊包含着設些什麼系、科？開些什麼課程？選些什麼教材？這都是用以培養師資的內容問題。既然師大畢業生之主要出路爲中等教育，則本着做什麼就學什麼的原則，她的設系別、定科目、選材料，都應該針對着中等敎育的需要。其存在，運用與發展的價值，都必須拿新中國的中等教育作鑑定的準繩。例如：甲系與乙系應分抑應合的問題，不應該取決於傳統的成見或本位的主觀，而應該依據於中等教育的需要。如果在小縣城一般的中學裡，因爲班次少，鐘點少，不夠請一個

三、關於教材內容和教法

在這一方面，教員們的思想的進步最大。教材教法，不是一個技術問題，實在是一個思想問題。少數教員，以前堅持着純業務觀點，以爲把書教好便是一個好教員。但是，怎樣才算是把書教好了呢？他們却沒有去思考。我們不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的思想，不根據新民主主義新中國的需要，而去教一套舊的、陳腐的、反動的（無論自覺與否）東西，而且站在和人民相反的立場上去解釋一切事物，縱然內容豐富，「學識」淵博，教法高妙，這能說是教好了嗎？這不應該說是教得太壞嗎？更有極少一部份教員，思想上殘餘着僱傭觀念，不負責，敷衍了事。而經過大家的批判，持着這些觀念的教員，也都覺悟過來。

教員們對於政治學習的要求，與日俱增。最近有些人提出對於政治大課的意見，這具體證明了他們的要求是在提高了。有些教授，公開地檢討了自己以前思想的錯誤，否定了自己所出版過的著述的觀點，這也具體證明，師大的教員，在教材教法上，大大提高了一步認識。

最近，在改制討論之後，有大多數系的教員們，已經成立了數學互助小組，又成立了各科目與學生聯合組成的內容教法檢討會，聽取學生們的意見，改進他們的材料與方法。這都是這次改進討論本身所給予的教育影響。

這一次師大改制的討論，所給予全校師生員工的思想教育，還不止於制度和課程的範圍。在各方面，大家的思想水平的提高，都有具體的表現。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制度，開始在建立了。有些小組，已經在適當地運用着這個武器。不但是學生，教員和職員們也都在羣衆面前客觀地檢討自己的缺點，批判自己認識上的錯誤。教授也樂於和學生結合在一起，一同聽大課，一同開檢討會，而且一同在檢討自己。

羣衆的觀點，也在日益加强，依靠羣衆，向羣衆學習，現在正在進一步地發揮着精神。集體勞動服務，羣衆文娛工作，以羣衆力量防止反動派跳樑的全校保防委員會，全都是在師大改制討論展開以後健全或者組織起來的。師大教授職員工聲全體合組的教育工作者工會的成立，也正是在這個時候。

這一切，說明了師大全校人士在思想上大大提高了一步，打垮了少數人的超階級觀點，大家在親身體驗中認識了自己應當是屬於哪個階級的，也應該是爲哪一個階級去鬥爭的。羣衆推動的力量，也把少數人離羣索居獨善其身的想法扳轉過來。同時，學術至上，知識高於一切的想法，也改變成爲知識是勞動經驗積累的認識，世界是勞動所創造的認識，腦力勞動必須和體力勞動結合的認識。此外，通過這次改制討論，大家把以往政治學習上對於國家的認識，也淸淸楚楚地更明確地推進了一步。

不是說師大改制的討論，有那麼大的力量，以致一下子把大家的思想就給完全搞通了。不是的。可是，把大家的思想大大提高了一步，是事實，是極明顯而不可抹煞的事實。這都是一一表現在具體的事件上的。

這又說明什麼呢？是說明一個學校的改革討論，不但是教育制度與教育方法改進的準備工作，討論的本身也就是教育工作者們的一種思想教育。這不但對於一個師大是有好處的。這個經驗，還可以提供到全國師範學院去，並且也可以供全國各大學的汲取。

因此，我們認爲，師大改制，是有它的思想教育的意義的！

通訊

天津私營企業勞資協商會議的示範

張高峯

（一）檢查過去缺點

爲了要把生產搞好，不能不檢查有無搞不好的原因。在過去各私營工廠的勞動紀律一般是通過職員採取監視，壓迫或飢餓的威脅等方法來維持。有的資本家更善於利用心腹職員造成工人間的矛盾分裂，以爲如此可以管住工人。結果恰巧相反，紀律蕩然，生產低落，對於勞資雙方都無好處。解放後，工人在工會的教育領導下，階級覺悟普遍提高，自動的建立了新的勞動態度，幫助生產恢復與發展，這類事實到處可見。但有些私營工廠生產依然未提高，個別的發生原料材料嚴重的浪費現象。這主要原因在那裡？過去舊的工廠生產管理辦法已經不適合，而新的辦法尙未完善訂立。所有已往的人事，工資，奬懲等制度距離按勞付酬、量才用人的科學標準很遠，使生產的利益不能與工人本身的利益相結合。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求提高生產，降低成本是會遇到困難或障礙的。另一個原因，過去少數管理工人的職員解放後對自己沒有好好作檢討，思想上存有顧慮，不敢再管理工人，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敷衍態度，一切採取放任自流。這樣不正常的現象繼續存在，對於發展生產毫無疑問的是一個重大的障礙，必須合力除消。

（二）克服生產障礙

怎樣去克服生產上的障礙？首先要把有關生產的各種問題攤開，勞資雙方坦白討論，澈底解決，因此建立一種與工人商討的機構和制度是非常迫切需要的，那就是要實行民主管理。關於這一點，天津市黃敬市長在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指出經驗說：「在工人階級組織起來以後，推動生產發展的主要力量是工人的自覺，那是提高生產効率最基本的東西。而工廠管理民主化是最能增進工人主人翁的感覺與集中羣衆智慧，啓發工人生產的積極性與自動性。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生產効能比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產効能高得多，其基本原因就在這裡。私營企業中資方在生產的措施事先與工人協商，取得工人的諒解是必要的。也只有得到工人積極的支持，私營企業才能辦好。目前新的管理制度還沒有完整的創造出來。」因此，我們發展生產的主要前提是建立新的

卻是殖民地的買辦，官僚資本主義的走卒，和殘餘封建主義的支持者。因此，反動派就非給全國大學訂出一個「整齊劃一」的制度不可，非在學校裡施行恐怖的特務政策不可，非把學生麻痺得沒有絲毫思想不可。

遠在一九四四年，我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表過一篇對於國民黨反動派大學教育政策的抗議，同日新華日報也刊出一篇社論來響應這個抗議。在那篇文章裡，我指出反動派實行法西斯黑色鎮壓的狠毒，和殘害中國青年的陰謀。屬於殘害陰謀而表現在大學制度上的，我指出幾個重要的事實：（一）全國大學，都在刻板主義的制度下進行着。一個大學至少三個學院，每個學院也由僞教育部規定出一定的系科。於是，上海的大學和蘭州、西安、昆明……的大學，無論在組織形式上或數字內容上，都沒有兩樣。實際上，全國各地區的需要並不一樣，生產情況和文化水平也不一樣，它所要求的教育內容和組織形式，自然也不會一樣。可是反動派爲什麼強迫叫他們一致了呢？這一致的制度又是根據什麼才決定出來的呢？答案很簡單，他們反動派的目的，並不要培養建立中華人民國度的下一代，他們不是替人民的中國辦教育，他們是百分之百地爲帝國主義，特別是爲美帝努力訓練奴才。因此，他們的一套制度，就不能不是根據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的政策而決定下來的——並且這個制度一定要保證執行，不論中國人民是否堅決反對。（二）爲了麻痺中國新的下一代，使他們不去面對現實而鬥爭，國民黨反動派的教育政策，是以全力提倡「學術研究」的。而他們所謂的「學術」又是怎樣的呢？這不但是以強權提倡唯心哲學，而且故意把學術抬舉成懸空的東西，和實際距離越來越遠。因此，才造成學什麼不能幹什麼而反以此自鳴高貴的現象。這就是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緊密結合下必然產生的一種陰謀。（三）用較長而固定的年限，用機械而不合理的考試方法，用龐雜衆多的課程和時間，把學生們緊緊束縛在牢籠裡，這也是反動派防止青年自由發展的一種毒辣手段。（四）以特務統治學校，不但是訓導制度是國特組織的一環，而且有些大學校長，也是特務的爪牙。（五）因此，反動的行政左右着教學，而不是行政爲了正確的教學。除此之外，還有若干更小的事實，也都證明反動派不是在辦教育，而是在屠殺中國人民。雖然我當時因此就不能不離開重慶，可是，我認爲那個公開的反抗是及時的，而且當時在待解放區裡的進步的大學教育界，也曾起過巨大的響應。

這個改革新中國大學制度的希望，一直騰沸在我的心裡，一直到今天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根據如此賢明的政策，以如此堅毅的態度，來進行改革師大，我才感到呼出一口愉快的長氣。

改革師大，有兩個意義：一個是，它的進行，本身是一個指南，標誌出全國大學應該走上的一個正確方向。我們人民的新中國的教育，一切是爲了新民主主義的建設，一切是爲了社會主義的準備，一切是爲了走上國際主義的大道。所以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去辦教育，我們應當據根全國的實際需要，各地區的情況和條件，去分別建立能負起這些任務的制度和教法與教材，我們更必需使全國各大學各自負起一個重點的任務，必需揚棄舊時代那種『樣樣皆通樣樣稀鬆』的教育。師範大學的改制，是全國大學改制的一個經驗，因爲它的方針和任務比較容易確定，所以，在汲取經驗上，拿它作首先的改革對象，是容易得到結果的，在進行全面改革的順序上，也是對的。

師大改制的另一個意義，是它對於校內智識份子思想改造的教育價值，這次改制的討論，是全面性的。在校委會的領導下，成立了一個改進研究會，研究討論深入到各基層小組。經過三個階段的檢討和研究（第一個階段：「明確目標，檢討過去」，第二階段：「現有班級的改革」，第三階段：「新師大的設計」），研究的總結，已經由北京光明日報在一月十九日發表，這裡不再重述。在這次提出改革問題，進行檢討研究之後，全校教授講助職員學生工警的思想水平，都大大的提高了一步。我們現在重點地舉出幾個具體的情狀，來介紹一下。

一、關於師大的目標和任務

以前，在教員方面，有不少人士依然保持着學術至上的思想，認爲師大的目標和任務，不能是完全造就師資，他們主張師資訓練和高深學術研究應該是並行的。這一方面說明他們忽視了全國中學教育的重要性，一方面說明了爲人民服務的認識不夠，所以才重視個人的學術成就而忘記這個學術學來是幹什麼的，另一方面，更說明了若干人士的思想，基本上還沒有擺脫唯心的桎梏，所以才依舊憧憬於那一套半殖民的官僚資產階級和封建制度的「學術」。經過這次討論的展開，在坦白而深入的檢討辯證下，幾乎全體都徹底了解到，每個大學都應當有它的專門任務，師範大學的專門任務，就是造就中等師資；而所謂學術，必須是教育的學術，所謂研究，必須是在普及教育的基礎上提高教育方法的研究。新中國今天的教育工作，首先是普及，因此，全國初中教育的重要是迫切的。我們對於這個迫切的需要，絕對不能忽視。

在學生方面，思想也大大提高了一步。從前爲公費而考師大的，爲先進一個學校再慢慢設法轉學的，爲混上幾年再看的，……今天也都明白了他們有當「人民教師」的神聖責任，同時，也認識到這也是一種光榮的權利。要幹什麼才應該學什麼，同時學了什麼就終身幹什麼，這建設新中國的基本精神之一，在討論改制之後，也貫串在每個學生的認識上。這種認識，具體表現在事實上的，有兩點：一是學生普遍地要求課程科目的改革，教材和教法的改革，與教學實習的加強；一是不少學生自動請求降低他們的人民助學金，甚至有人放棄。

二、關於師大行政制度和院系組織

被國民黨反動派麻痺了幾十年的獨立的行政高於教學的錯誤思想，在這次改革討論之後，經過唯物辯證法的正確指引，算是徹底打垮了。沒有人再不懂得教育行政是服從教學政策的了，所以，全校一致要求實行校長教務長制。同時，形式主義的「院」的中層機構，也全體主張取消了。系與系間的聯繫，也主張加強。尤其重要的是，大家認清了師大所有系的設置，都是爲了中等學校的，所以師大的設系，不能閉門造車，更不能和別的大學一樣。中學需要什麼教員，師大就應當也才應當設什麼系。因此，原有的某些系，也認爲有合併或調整的必要。學生修業的年限，也認識到應該根據各系科不同性質的不同需要，不作死板劃一的規定。

在總的校務行政方面，師大自從北京解放以來，曾經盡力在民主的精神上推行工作。可惜，在這方面，發生一個偏向，那就是，領導的不夠。民主而沒有集中，所以全校流於散漫，大家作主人的精神未能健全，所以還讓僱傭觀點仍然存在某些人的思想上，以致發生不能「層層負責，集中領導」的現象。可是，經過這次反覆討論檢討學習，大家也進一步發現了自己的缺點。雖然檢查工作的制度並沒有多少人提出討論，然而有了集中領導之後，彙報和檢查的制度，自然會跟着建立起來的。彙報和檢查，在師大還是一個待建立的制度，也是一個很重要很迫切需要的制度。

台灣農業資源與其發展

王政

一、台灣農業資源和自然條件

台灣是一個島嶼，由於它的亞熱帶氣候，與兼有溫帶和熱帶性質，故決定了可以生產的農作物特別衆多，台灣總面積約三五九七·二四三·〇六公頃，全境多山，高峻的中央山脈縱貫南北，東部多絕壁懸崖，只有四部一帶因緩傾斜地，纔形成狹長之平原，這一帶平原便是台灣的主要農作物出產地，估計約佔有全島面積的百分之二十一，計七六一、八〇九·八一公頃，而現在開墾的面積上，亦達百分之八十以上。台灣一般的農作物·雖然在具有亞熱帶氣候之溫度，日光，雨量之影響下，可是台灣之土質，並不優厚，尤其在歷年農作物大量的吸取滋養，和高氣溫及豪雨冲洗的關係，對於氮燐鉀三種主要的原素，是普遍地感到缺少，所以有人看見今天台灣豐富之農產物，以爲台灣耕地用之不盡，產之不絕，那完全是一個錯誤的看法，據台灣農業實驗所統計，台灣米的產量和施肥比較，歷年來是：

年度	施肥數量(公斤)	總收穫量(公石)	每公頃收穫量(公石)
一九三七	一二四六四一三三二三	一六六五五七三〇·一三	二五·三二
三八	一〇〇五五七八八三六	一七七〇八八〇二·二八	二八·三二
三九	八六〇一七八七六八	一六五〇八九一五·三〇	二六·三七
四〇	六四四三六四三六一	一四二五三五八〇·四三	二二·三二
四一	五七五六七九一〇八	一五一四〇二〇四·八五	二三·四〇
四二	五四九一九五六一六	一四七八八六一·〇六	二三·九九
四三	四八四五〇〇九六八	一一一六七一五六·四四	一八·三一
四四	二七四四四五七三六七	一〇六〇四七五六·四二	一七·六五
四五	三八九七七九一七	五八四九七二七·四五	一一·四五

由此，可以看出施用肥料和收穫量的關係，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礦物質和植物質肥料消費量愈多則農作物收穫量愈高，在一九四五年日帝將投降時，土地施肥不足，於是產量大減，這無形中告訴了台灣的農業資源，在自然環境上，已有了一個先天的限制，如果是以後不能克服這種困難，那麼，所謂美麗的樂園是不容樂觀的。除了土質的天然限制以外，其次是在雨量和風災的影響。關於台灣的雨量，是充足的，而有時甚至過多，全年平均在一六五二·四公厘以上，雨量的分佈大致是極北部沿海最多，西南部沿海次之，台南附近雨量最少，可是由於季節風和颱風的關係，雨勢多急，直冲而下，而雨季延續，影響作物及土地，如排輸偶不小心，極易釀成水災，而直接危害農作物生長。

而颱風影響破壞尤大，在七八九十月間，颱風驟至，常繼以大雨、第二期稻作物受到損害最鉅，像一九四五年的一次颱風，具最大雨量竟達四二六·九公厘，在台灣中部一帶受損稻穗，幾達一半以上，這就是一種不可挽回的損害。

台灣的農作物，既然在自然環境上受到上面所說的幾種原因所限制，但是並不是說台灣整個農作物就沒有了它的前途，相反，它還是在台灣整個的出產中，佔有相當地位，尤其某些有關品質的改良，技術的進步，都獲得一部份具體的成功，那是對於台灣農業或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上，是會有很大幫助的。

現在將台灣農業資源中，最主要的幾種出產，分別論述其生產情形和其今後之發展如後：

二、台灣的米量

台灣的米，在其整個農業資源中、生產量佔第一位，在一九〇〇年時，其耕種面積已達三二五、六五三·五五公頃，收穫量爲三、八七八、四五八·八一公石，每公頃的產量約爲一一·九一公石，嗣後因水利修建，栽培面積擴張，品種改良，肥料增加，米量於是亦逐漸增加，至一九三八年時，產量已增加爲一七、七〇八八〇二·二八公石，但是到中國抗戰發生後，因戰爭影響，日帝增產計劃停止，產量頓時大減，迨光復前，已減至年產五八四、九七二·四五公石，國民黨統治台灣後，雖積極企圖恢復產量，但結果由於肥料及其他原因，僅能維持一九三六年以前產量，在最近，反動派困留台灣，羣匪蝟集，人口突增，一般軍糧均依靠台米維持，可惜，台灣並非那麼易於產米，即以本年產量論，以每人每日消費食米〇·五公斤計，僅能維持六百萬人，可是實際上今天台灣的總人口已達八百萬以上，若以維持最低水準六百萬人的食粮，來勉強維持八百萬人的話，那麼唯一的辦法，是減低台灣同胞的生活水準，我們知道台灣食粮政策在過去和現在都是採用徵收制，在反動派的淫威下，農民祇能將留存食粮掃數獻出，反動派以低價收買，結果造成政府賺錢的現象，而所給農民留下來的食粮是數量少得可憐。幾乎不能勉強渡過一年的需要。本來，台灣的米量，是足夠全省人民的需要，而且還可以剩餘一部份相當的數量。在一九三〇年間，據日帝估計每人可能的消費量可以達到三公石之多，而且以後逐年增加，他們準備在一九五〇年的種稻面積擴張爲八三一九五一·七九公頃，若在相當具備的條件下，台灣每公頃的產量可以達到三〇公石，那麼，即每年產量可達二四·九五八·五五三·七公石，不過，要把台灣食米產量發展成這麼一個理想的數字，也不是立刻所能辦到的，它必須在人爲上要經過一番努力，尤其要克服肥料的困難和自然的災禍，有計劃性的防止這些困難，同時利用近代科學農具設備，解決土地問題，着重集體性和計劃性，那麼，才能達到理想，當然，這一個估計，在日帝時代是無法完成的，因爲它將台灣祇爲一個唯一的產糖區，在國民黨統治時代，更無法完成的，因爲他是一個反人民的政府，根本不會替人民想辦法，而且徹底消滅就在眼前，所以，能完成這一個計劃和理想的，也祇有解放後的人民政府，故解放後台灣的米

完整的工廠管理制度，勞資雙方應該主動的訂立包括工人待遇與生產要求的勞動合同，互相開誠協商。商定以後，切實遵守，保證生產計劃與勞動契約的實行。

（三）民主管理的示範

天津私營東亞企業公司（產抵羊牌毛線著名，並製蔴袋）自解放以後，因爲各種原因始終未建立良好的勞動紀律，資方對工廠管理缺少改進，致使全廠生產量未得發展反而降低。如蔴袋（華北各地急需的一種包裝品）產量，去年十二月比去年四月降低了百分之十三點三，較前年六月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九。在去年十一月間，勞資雙方開始感到生產降低影響工廠經營的嚴重性，於是互相主動討論有關生產的各項問題，正式建立了勞資協商會議的新制度。勞方由工會常務委員五人作代表，資方由總經理，副理，廠長，工程師等五人參加。每週二，四，六舉行十人協商會議三次。基於共同的認識，爭取恢復發展生產。雙方開誠相見，坦白協商。過去工會所提出的一百多項建議，一個月之內，由勞資協商會議負責解決了六十多件，使工人的生產情緒大爲提高。資方曾根據羣衆要求，協商會議決定，毫無顧慮的開除了四位影響定時生產的接頭工人。工會爲了更普遍的提高工人覺悟，特意組織了大的政治學習班，四百多位工人參加學習。現在廠內勞動紀律已經走向正軌，保證了生產的提高。織蔴部過去每台機子每天平均生產一百廿到一百三十碼，現在平均增到一百六十到一百七十碼，最高紀錄二百二十五碼。由於各生產單位產量提高，總的產量也跟着提高。一月份平均每日產七千條蔴袋，比去年十二月增百分之四十强，即由每日產五千條增到七千條。一月二十八日到二月一日增加男女工人一百餘名，該公司計劃自三月份起每日生產蔴袋一萬條以上。二月一日，該公司勞資協商會議舉行第二十一次會議，討論年終雙薪問題，雙方意見相差不遠。總經理宋斐卿說：「過去工會和行政兩大力量互相懷疑，結果力量彼此抵消。在人民政協開會後，我們看到國家大事在開誠佈公協商之後，都解決了。我們這樣小廠子還有甚麼解決不了的事呢？因此成立了這個協商會。」宋總經理經營工廠的情緒很高，他還說：「現在才證明要發展生產，必須與工會携起手來。」

（四）又一個例子

私營東亞企業公司勞資協商會議，解決了許多有關生產的問題。對於天津私營企業實行管理民主化起了示範作用。私營恒源紗廠（產八仙牌紗著名）於去年十二月間也醞釀組織勞資協商會議。在當時該廠調整工資已近結束，工會爲更好的組織職工提高生產，提議成立生產會議。同時資方提出成立工廠管理委員會，認爲工管會較生產會議更爲完善，但對工會參加工廠管理一事，却主張由資方董事會聘請或指定工會兩人參加。經工會慎重考慮後，認爲這樣被動的接受將失去工管的基本精神，第一次商談無結果中止。今年一月中旬，工會再度向資方提出組勞資協商會議，雙方於一月二十四日正式進行磋商，意見一致，擬訂會議章程草案後，在全體職工中進行了一週的宣傳教育，二月一日正式成立協商會議。會議的組織，由勞資雙方分別派選五人參加，每星期開會一次，主席由勞資雙方分別輪流充任。協商的內容規定：（一）關於生產方面，如原料，產量，質量，節約浪費，物料及人力之配備，機械効率及如何提高工作効率，改善技術方法等。（二）關於人事制度方面，如行政管理，勞動紀律及其他各種制度。（三）關於職工福利方面，如勞保、工資、獎金等。二月四日，勞資協商會議舉行第一次會議，也是該廠有史以來第一次勞資雙方開誠相見，討論有關生產問題。會議開始後，首先討論工會提出的五個提案，其中一個主要的提案是由於紗廠生產組織不好，最近搖紗存紗過多，前紡供不上後紡，粗紡供不上細紡，且有一段粗，一段細的現象，損害了恒源「八仙牌」的品質。會商的結果，決定由行政方面把一月份粗紗細紗生產數字正確的統計出來，再提供給工會，以便從具體事實中找出毛病改進。主席董權甫（恆源紗廠副經理）在散會前說：「勞資協商會將幫助我們恆源新生，爲了把生產搞好，有意見就拿到桌子上來，不要有顧慮。別犯急性病，一切問題只有應辦與不應辦，沒有困難。搞好協商會是大家的光榮，這將給私營工廠管理民主化摸出一條道路來。」

（五）幾點主要經驗

私營東亞與恒源兩廠通過勞資協商會議這機構，研究工廠管理制度的改進，商討生產上的重要措施。會議成立時間雖短，勞資關係首先開始有顯著的改善，生產水平有保證可以逐漸提高。這個經驗值得介紹，應該引起其他各地的重視。（一）勞資協商談判過程中，雙方必須消除過去所有一切懷疑與戒心，本着發展生產，雙勞資兩利的原則，開誠相見，解決問題。只有這樣，雙方的意見才能趨於一致，達到協議。恒源紗廠協商會議的成立是一個例子，起初彼此有懷疑誤會，磋商曾一度中止，嗣後雙方開誠表明態度，才迅速取得協議。（二）事先在職工中深入宣傳醞釀，使大家關心和遵重這一組織，協商會議才不致於流入形式。爲了貫澈發展生產，勞資兩利政策，勞方主動與資方協商生產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就應該及時的提出有關生產的各項問題，並認眞的執行協商會議的決定，這是發展生產的保證。（三）所有提出的各項問題要掌握發展生產勞資兩利的原則，根據輕重緩急分別提出，同時也要考慮到是否可能解決或短期不能解決的情況，避免一次提得太高，如不能及時解決，將影響雙方情緒，有時可能增加資方的顧慮。（四）每次開會以前，工會協商代表必須到車間去搜集意見，對於協商會議決定了的事項，勞資雙方要隨時檢查執行的程度如何？不然事情就會拖下去。

工廠管理民主化的問題與勞資協商會議的成就，在天津已經引起永利化學公司，久大鹽業公司，仁立毛呢公司，達生紗廠幾大私營企業的重視，它們都在準備就勞資關係良好的基礎上，把管理民主化提高一步或醞釀組織勞資協商會議。根據經驗與事實，在私營企業中如果有了資方的積極經營，有了工人的生產自覺，再加上民主化的管理，三者適當的結合起來，我們相信一定可以把生產大大提高一步，獲得使人滿意的成績。

（二月七日）

徵求老解放區的通訊

新建設出版了五個月來，在我們收到的投稿中，覺到老區的通訊很少。我們渴盼老區從事經濟和文化工作的朋友，給我們寫通訊，向新區介紹老區建設經驗。關於全面的報導，希望能給領導上先看一下，以免發生錯誤。在建設中的小故事，各種形式的文藝創作，我們也非常歡迎。

—編輯部—

有五十餘家台胞經營之鳳梨場宣告倒閉，在同一時期，對資本雄厚之日商鳳梨業，予以特殊化之保護，在共同販賣機關內，更設法保護日資本家之不當利益，由此，台灣鳳梨在無形中日漸開始日帝獨佔階段。在一九三四年春，日帝為進一步獨佔起見，再強迫台胞所主持之鳳梨製造工廠，合併於新的獨佔機構——台灣鳳梨合作株式會社內，省人雖經反抗，然而除大甲鳳梨罐頭商會始終未曾加入外，其餘全省七十八家工廠，都數被迫歸併於日帝獨佔性株式會社，同年又強迫十三家農場合併成立台灣鳳梨拓植會，以便統制鳳梨之生產，於是，日帝陰謀獨佔台灣鳳梨之目的，完全達到，台灣鳳梨和政治一樣，完全淪陷於日帝之手。不過，我們應該知道今天台灣鳳梨有此成績，乃完全係台胞悉心栽種和努力之結果，並非由日帝經營之得法，講到台灣鳳梨一頁沿革史，也可以說是一頁台灣同胞反抗日帝經濟侵略的一頁血淚史。

台灣鳳梨在日帝獨佔之先，由於並非有計劃生產，致年產僅在來種三二六一一七一四罐，改良種四四九九二八二罐，栽種面積約五千餘甲，至日帝獨佔後，栽種面積便增加至七千餘甲，產量亦增加三分之一，並再度改進業務，裝配新式機器，以期提高效率，統一製品標準，加強施肥工作，改良品種，極力利用副產物，減低生產成本，企圖爭取世界市場，所以到一九三八年，產量又增，外銷量幾達六百萬打，佔全部生產量之百分之七二，而本省消費者僅佔百分之二八，日帝榨取殖民地生產之手段，可見一斑。至此，產量已達最高點，以後戰爭激烈，製罐之鐵皮因用於軍事而發生問題，同時肥料及栽種面積亦逐漸減少，留下土地改種稻麥和雜糧，於是出產量驟減，最低竟減至六萬打，嗣後，國民黨反動派統治台灣，雖竭力想提高產量，然而總無法超過一九三八年產量之十分之一。

綜合上面的情形，對台灣鳳梨今後的前途，使得到這幾個結論：第一、必須使其加工及原料成本減低，否則如果在成本上不能減低，雖然產量增加、徒有浪費財力，對其出路問題還是無法解決，在這種情形下勉強發展，還不如將栽種土地，改種其他雜糧，或能更有益於本省之需要。第二、由於成本問題，連帶到的是如何增加其副產品的收入、鳳梨的副產品很多，如鳳梨醋，鳳梨蕊肝，鳳梨酒，白蘭地，果汁，阿明露發，鳳梨蕊挕等，其中以鳳梨酒在當地銷路較大，其他出產既少，銷路也小，在成本的減低上起不了什麼作用。第三、台灣解放後，鳳梨業必係包括在國營範圍之內，因此，在以後對於加工之原料和器材也須求供於自己，不會像過去那樣浪費外匯了，可是，我國對於鐵皮之出產，差得可憐，同時產鐵不多，須要用在更重要的重工業發展上，更無餘力來經營鳳梨業，因此，對今後台灣鳳梨業之發展，確是值得重新估計的事。

五、一般次要性農產品

除了上面所提出三種比較重要農業產品外，其次就是雜糧，本來台灣的米產很足夠當地人民需要，可是，台灣的農業資源、在過去完全掌握在日帝手中，出口運往日本的產量幾佔總產量二分之一以上，所以，本省反而發生糧食恐慌，於是不得不以雜糧代替維持生活，在台灣的雜糧中，只小麥，落花生，甘藷，玉蜀黍為主，不過產量不大，僅佔農產品總量十分之一、其中以甘藷種植較多，栽種面積約計十三萬八千甲，年產亦達三十萬億斤，除一部份當作食糧外，其餘多為養猪飼料，及酒精釀酵原料。

再有花生米，年產亦達五十五萬石，除食用外，係供作榨油原料，至於小麥和玉蜀黍，產量更少，一般並不為人所注意，其在今後之發展價值亦小。

產量和雜糧差不多的，是台灣的水果，包括香蕉、柑橘、檬果、椰子等，收獲量合計約值四億斤左右，銷外地的很多，不過，這些水果品種並不好，有許多是差於大陸各省的產品，因此，祇能稱為是農業資源的副產品。

其次，尚有一些消費用的農業品，如茶葉、煙草、咖啡一類，在台灣亦算一項輸出品，尤其茶葉，品種甚多，且質地優良，為南洋一帶所歡迎，前途發展，如果在品種上再予改良，那麼非但希望很大，而且是值得提倡的事。

當然，這裡面所列舉的農業資源，不能包括農業資源的全部，僅列舉一些對台灣經濟能發展作用的幾種，其他遺漏得很多，像苧麻、蔬菜等，不過，由前面列舉的幾種出產情形中，祇少能得到下面幾個結論：

第一、台灣農業資源的發展，與今後市場的決定甚大，在以前，台灣農業資源為日帝所獨佔，因此，它的發展完全配合了日帝本身的需要，是一個殖民地經濟形態的發展，它的目的一切是為了榨取，那時的市場亦就是對供給日帝的需要而言，可是，這種情形在它投降後，就發生了一個對台灣極不利的弊端，就是有某一部份的出產，適合於日帝需要的出產，臨時失去了銷路的對象，在國外找不到國際市場，在國內的市場早就被英美帝國主義所控制，在省內又消化不了。而國民黨反動政府又不給予合理的調整，於是便造成了台灣農業經濟悲劇命運的開始。

可是，這種情形在解放後，就不同了，以後，全國生活水準提高，也許某一部份農產品能在大陸各省得到銷路，然而，有一些東西還是需要按台灣本省生產情況，加以調整，澈底脫離日帝殖民地政策影響下造成的系統，而走向新民主義的經濟建設方向，這樣，台灣的農業發展便包括在全國性的生產建設的計劃經濟裡，照顧到本省，亦照顧到全國，直接溶合在整個新中國生產建設的高潮中。

第二、是土地問題，台灣的土地問題，對於農業生產影響很大，在日帝時代，日帝統治機構藉口舊有土地所有制的混亂，採用登記辦法，可是有些老百姓不清楚手續，便忘了登記，於是凡未曾登記者，昔屬於官產，換言之，亦即是無條件的沒收，登記者，則在一年內強迫徵收產物，以低價換取產物，運往日本，或者以高價再轉轉賣給台灣人民，所以，雖然台灣土地出產豐富，可是農民是得不到好處的。即在所謂「光復」後，以前的官產，官地便都列入了國民黨官僚資本財產中，凡徵收的非官地，都發還了地主，因此新興的大地主勢力在光復後，特別膨大，像反動政府的「民意」機關參議會中，參議員有十分之七八都是大地主階級出身，全省有百分之五十左右食糧，還握在他們手中，國民黨反動派雖然盡量收購這些食糧，但是他們還能操縱一部份粮價。那些地主，雖然對剝削農民的立場上是一致，但是，他們之間，還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當然，這是台灣農業發展上一個障礙，不過，在解放後，全省實行土地改革，這種障礙當能澈底取消的。

故而，**今天台灣的土地問題，**並不是土地不夠種耕，而是如何開墾的問題，前面已經提過、台灣耕地的面積，已佔可耕種總面積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如果再想開墾，在產量上不可能會增加多少，以前有人主張實行耕山，那祇能造成破壞森林，流沙崩石，或洪水成災，損害良田，而發生嚴重可怕災禍的結果，絕不會有助於農業之發展。

由此，可以說，對於今後農業之改進和發展、首先必須在出產的作物上，予以調整，不完全適宜的農產，可以移往大陸適宜地區發展，本身應該注意特產上的發展，其次應在農具上和技術上不斷改進，本省出產肥料，改良加工業之工廠設備，配合全國生產計劃，那麼才是眞正有利於台灣人民的農業資源開發，而成為一個正確的發展方向，所謂土地不夠，資本缺乏的論調，都是反動派欺騙台灣同胞的一種幌子而已！

產發展，在農業資源中佔有重要的地位，那是一定的道理。

三、台灣的甘蔗和製糖業

第二種生產在台灣農業資源中，佔有相當地位的是甘蔗，甘蔗是次於米的農產品，由於它是製糖的主要原料，在很早以前即爲台灣主要產品之一，台灣糖產，在五十年以前原是利用土製方法提煉，產量甚少，年產僅八九千萬斤，迨日帝佔領後，樹立殖民地糖業政策，於是產量逐年提高，至我國抗戰前年，產量已達三千三百萬担，耕種面積亦擴張至四十七萬七千多公頃，纔成爲日帝殖民地中唯一產糖區，據估計日帝在以往統治幾十年中，每年從台灣榨取的糖量，佔每年總產量百分之九十，例如在一九三八——三九年的產糖量一百四十一萬公噸中，直接運往日帝本國者即有一百二十七萬噸之多，故而台糖之發展，完全保配合日帝本身之需要，彌補其本國製糖業之不足，其歷年來，在糖產上所獲得大量榨取，亦可以說是日帝對殖民地經濟剝削中之最成功者。而在實際上看台灣本身具備的條件，却並非全省都是理想的糖業發展區，因爲在東南亞一帶 其土質及氣候均不及爪哇、技術亦不及菲律賓，而產甘蔗的區域亦僅中南部一狹長地區，這一帶因爲秋後少雨，旱季時間較長，多係沙質土地，種植其他植物均非適宜，且時有大風，使一般細葉植物無法種植，而比較甘蔗不畏水旱，當地居民在這土質較差土地上，使多種植了甘蔗，於是製糖業纔應時而生，可是，這一帶地區並不大，最多佔全部可能耕種面積之五分之一左右，所以在產量上和成本上決無法和爪哇一爭長短，而今天所以尚能勉強維持者，就是日帝在人爲上的努力，擴張面積，將其他土質較好耕田移爲種植甘蔗之用，使其產量普遍增加，減低收購價格，緊壓農民生活，以減低其生產成本，利用副產品，以其在國際市場上壓低價格出售所得利潤之不足，才勉強維持着一個水平發展。

除此，我們不能否認日帝在甘蔗的品種上，和製糖的技術的本身上，有若干的成績。不過，我們也知道這些品種和技術上的提高，是爲了它加強榨取的需要，日帝對於甘蔗品質的改進，主要的可以分爲五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在日帝佔領台灣時，那時，台灣所種植的甘蔗種類有竹蔗，納蔗，紅蔗，南貢蔗，青皮蔗，竹仔蚋大種，都是三百年左右傳下來的品種，迨日帝佔領後第二年，日帝即自夏威夷輸入玫瑰竹種之種苗着手關於品種之改良，並獎勵這一種之繁殖，以謀普及，這是第二個時期。以後至一九一二——一三年間，因鑒於該甘蔗品種缺乏耐風性，且對病虫的抵抗力又差，於是日帝乃根據糖業試驗場品種試驗之成績，採用比較富於耐風性，日收獲量及含糖成分都較高的爪哇實生種，設立蔗苗養成所，培育該優良品種，配給各甘蔗栽種區，迄一九一六年，該項品種益趨普遍，而佈及全省蔗園，這是第三個時期，可是到了一九二〇年，日帝又從爪哇取同大莖種蔗苗，試種結果，在灌溉便利地區，收獲量特豐，於是該項品種又代實生種而普及全省，這是第四個時期，嗣後，日帝主持之台灣糖業試驗所育成一種（F108）的品種，更適宜於台灣種植，不久便又替代了前者而擴展至全省。

這是有關台灣甘蔗品種改良大略情形，其次在製糖技術的改進、關於製糖技術之改進、最主要的便是舊式糖廠之逐漸淘汰，新式糖廠之次第建立，和製糖方法之改進，當然，這種新的製糖方法，是在日帝獨佔後，纔採用於各糖廠，不過，這種日帝所謂新的製糖技術，在今天也已經落伍，解放後對於台糖品質的改良也是很重要的工作。

除了品種及技術應該改進外，不能忽視的是土地的施肥問題，普遍在台灣甘蔗田最需要的肥料是硫酸錏，過燐酸鈣，石灰氮，硫酸鉀，硫燐錏等，但是，這幾樣肥料在台灣是普遍的缺少，非但甘蔗田需要，即是其他農作物亦同樣的感到缺少，在現在由於我國科學製造礦物肥料工廠不發達，一時無法解決這個困難，一切祇能仰給於自給肥料，改用枯葉，堆肥，人糞，綠肥等，當然，這對甘蔗生產的發展，是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台灣在正產品的發展以外，其次就是注意副產品的發展，前面說過台灣的副產品，在整個台灣的收益上，佔有相當的地位，可以發展的有酵母、寒璐璐；合成橡膠、酒精、紙板、紙漿、入造絲、鉀肥、飼料、潤滑油、清淨劑、琥珀酸、電玉等，產量都不差，可惜在這些副產品中，現在被發展的祇有紙漿、酒精，及酵母工業，其他尚未普遍利用，這也是發展台灣糖業上應該注意的地方。

關於台灣今後之發展，可以這麼講，台灣不久即將解放，那是將定的事實，因此，看台灣糖業今後之發展，必須以解放後情形來分析，首先，台灣既是中國的一部份，它的發展，就不能像過去一樣，還停留在日帝所規劃着殖民地經濟的痕跡裡，必須要配合和溶合在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陣線裡，過去，台灣的出路是日帝的榨取，也是說日帝爲了想榨取才發展了台灣糖業，但是，光復後日帝的榨取消滅了，於是一時便造成了台灣缺之市場的現象，這許多過剩的台糖，本省吃不了，祖國在過去，糖市場幾乎全被外糖所控制，同時各地土產的糖相當多，適宜於發展糖業的地區也相當多，因此，祖國大陸的收購量是很小的，可是，這種現象在解放後，使不完全相同了，解放後的祖國，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也有多餘經濟力量去購買糖，尤其在華北，東北一帶、將來對於糖的需要量很大，所以，今後台糖的市場與解放前是不同了，但、留下的問題是台灣在整個中國產糖區的比重中，是不是值得單獨發展，中國華南一帶，在氣候和土質上對於製糖的條件並不比台灣差，製糖業的發展雖然沒有像在台灣一樣大規模的發展，可是在有些部份的設備上却優於台灣，故而，爲發展中國整個糖業起見，爲適宜於台灣其他農作發展起見，在台灣北部一帶糖業，實有遷移的必要，將一部份製糖廠移往海南島或雷州半島，留下種植甘蔗耕地，改種稻米，甘藷，豆類等，那麼，非但對本省農業的發展，有莫大的幫助，即對我國解放後全國性的經濟建設計劃上，也是一個應該處置的步驟。

四、台灣的鳳梨

台灣農產除米和糖以外，鳳梨亦是重要出產之一，台灣的鳳梨在日帝佔領之先，原先不被當地農民所注意。當時僅偶然零星種植，並無大規模生產，迨淪陷後，始被日帝注意，積極提倡，於是農民多開墾荒地種植鳳梨，風行之初，日帝爲普遍獨佔殖民地資源起見，亦曾假意利用其補助、獎勵辦法，企圖提高農民種植鳳梨興趣，到一九二六年後，由於製罐業與栽種業之發達，纔促鳳梨加工業之發展，工廠日漸增多，栽種技術亦逐漸改進，同時對外來種爭先栽種，於是在台南、高雄、台中、嘉義一帶、栽種者更多，日帝見那時鳳梨發展漸有希望，更美其名曰獎勵，派專門人員，設立各種輔導機構，實行調查及推廣工作，迨一九三一年、此時發展略具規模，日帝便督使公會議決，組織台灣鳳梨共販賣株式會社，將佔總數三分之二台胞經營之鳳梨業，予以限制，所謂限制亦即是一種殖民地獨佔剝削，於是，即

三十萬瓩。

捷克斯洛伐克正完成着他底第一個五年計劃底第一年，這一年的計劃即將提前完成，雖然目前依然感到若干困難，廣闊的新的前途業已啓開，人民底生活水平將有更進一步的增進，完成取消配售的條件，正在堅穩地創建中。

這裡，人們不能不記起，反動派的報紙曾經滿載着那樣多「悽慘」的預言，說什麼捷克斯洛伐克底經濟破產是不可避免的，事實嘲笑了這班「預言家」。

人民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底新的成就，其意義何在呢？誠如E・斯萊希達（Slechta）部長在一次無線電廣播中所說的：

「我們的國家今天已成爲一個大工廠，其中的每一個工人都感覺到他是這塊土地上的主人翁，都感覺到他對於它底繁榮是負有責任……我們已經消除了失業，我們正以前所未有的大爲快速的步調增進着我們的國民健康，由於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以及和人民民主國家特別是蘇聯之間的經濟合作。我們才有可能得到這些成就，我們的通貨是穩定的。我們底市場充滿了貨物，工資底實際價值也在增加。」

這就是事實，這就是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無情的起訴，資本主義這個制度業已陷入經濟的，政治的嚴亂的危機之中，這一制度將成百萬勞動人民注定在殘酷的貧困和苦難當中。

波蘭人民經濟底新成就

波蘭共和國底人民得到了又一次大的經濟勝利，從一九四七年到四九年的國家經濟復興三年計劃，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號就完成了，這是說，只花二年零十個月的工夫。

國家經濟計劃委員會（State Jeonomr Praning Commzs m）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公布的正式統計表說明了，在這一時期內，波蘭工業產品其價值已達三百五十七億茲羅提（Zlcty 波蘭貨幣名——譯者），較之計劃所要求者多兩億戰前茲羅提，即是說，三年計劃完成了百分之一〇〇・六，並提早了兩個月。計劃之完成，在煉鐵與鍊鋼工業方面是百分之一百零六，發電工程方面爲百分之一百一十三，大機器生產方面爲百分之一百一十三・紡織方面爲百分之一百零九，皮革與紙張工業爲百分之百，煉糖方面爲百分之一百二十八，木工方面爲百分之一百一十四，在烟草工業則爲百分之一百一十六。

在農業方面，也獲致了無疑的成就。入倉小麥爲計劃中預期的百分之一百零六，稞麥者爲百分之一百一十八，馬鈴薯者爲百分之一百，馬與牛之增殖目標亦已超過，農產品底總值指明：較之一九四六年者要多百分之六十八，供應農業的拖拉機，其產量也多過計劃底百分之六。

波蘭人民提前完成了三年計劃，這表明他們在工業化的道路上作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躍進，大型和中型工業底產品其價值在今年（一九四九）將達一百四十億戰前茲羅提，這幾乎是一九四六年者的二又四分之一倍，也幾乎比戰前年代者底多過百分之七十五，每人每年工業生產品則爲戰前年代的二倍半，人民的階級成份也有了顯然的變更，城市薪資工人的數目已由一九三八年底百分之一八・二增加到目前底百分之三五・九，而農業僱用人數則從百分之六四・五降至百分之五一・六。

三年計劃之完成，大大提高了生活水平。工人和機關僱員實際工資已增加了一倍多，波蘭底人民較戰前生活得更好了。今天每人小麥和肉類的消費量比戰前者要多百分之十九，雞蛋者多百分之五十，糖類者多百分之六十四，毛織品者多百分之五十五。

如同業已堅穩地踏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其他人民民主國家一樣，波蘭共和國底經濟進步給馬歇爾諸國底境地提供了一個尖銳非常的對比。英、法、意、比（利時）底統治者們拿什麼來與此相較呢？衰退着的生產，有增無已的失業，永遠上漲的物價，不斷下跌的工資，減少着的消費品，絕大部分勞動人民日盛一日的貧窮與飢餓，爲壟斷資本服務的報紙對於波蘭以及民主陣營其他國家底經濟成就保持着一種啞口無言的陰謀，這是沒有什麼可怪的，因爲站在這些成就旁邊瑟縮着的資本主義底危機和末日是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愈來愈凸出了。

保加利亞改造自然的計劃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保加利亞施行的國民經濟發展五年計劃，爲戰勝保國多年來的災害——旱災——提供了根本解決的辦法，受旱災影響最烈的地區將大量發展水利以利用多瑙河施行灌溉；防風林也將培植起來，瘧疾侵害的低地則將施行排除積水，爲了幫助完成這一五年計劃，即將建立一個分佈廣闊的，有着必要的機器和技術設備的造林中心網。

保加利亞政府成立了一個關於農業的委員會，其中包括所有科學研究所，農業學校，農業試驗站，第一流的國營農場，國立索菲亞大學，國立勃洛夫第夫大學，科學院，保加利亞科學工作者協會，以及農林部底代表們。

這個委員會在一次會議上聽取了農業部副部長第特戈・傑羅哥列夫（Trtko Chernokolev）關於保加利亞農業耕作面臨的急切任務的報告，這就是繼續設立合作耕種制的農場，擴大耕作規模，按照社會主義方法改造鄉村，廣泛運用機器，和採用先進的現代的農業科學——米邱林、李森科的科學，以幫助保證穩定的巨量的產額。

傑羅哥列夫說：「我們必須依照米邱林的方法改革我們一切的科學工作和研究工作，把科學工作和實際的農業耕作問題緊密的聯繫起來。將農業勞動合作社轉變爲科學研究中心，幫助它們在耕種上提高一步，這是必要的」。

保加利亞農業底快速轉進業已開始，表現在這方面的便是目前在多瑙河平原進行着的一個規模巨大的重要的水利工程，這一地區受旱災影響最烈。

蘇聯應保加利亞政府之請，在這一計劃上給了保加利亞人民技術上的幫助。

這一新的水利工程是準備在多瑙河流域的尼哥波爾（Nikopol），斯維希多夫（Svishtov）盧塞（Ruse）和屠特拉岡（Tutracan）這幾個城市之間進行，這一工程一旦完成即可灌溉多布魯耶（Dobr ji）地區以及多瑙河平原底三萬海克脫的旱地，蘇聯將供給機器和設備以及其他器材以建立水閘，水力發電站和電線。

整個的國家正準備全力投入這一偉大的新的建設工作，志願參加工作業已成爲羣衆性的運動，蘇聯給予的幫助，增強了保加利亞人民的信心，他們在以社會主義方法改造國家的鬥爭中是必然獲得勝利的。

捷波經濟合作

從前標記着捷波關係的是懷疑和敵視，這兩個鄰邦在文化語言甚至歷史命運方面都有着相似之點。

「反動統治時代的波蘭政府——華沙（Trybuna Ludu）追憶道——無論在那方面都追求着一種鼓勵侵略和法西斯主義的政策；那時候，在我們和捷克斯洛伐克

繁榮着的人民民主國家

斐凌輯譯

羅馬尼亞經濟發展五年計劃

羅馬尼亞人民眼前開展着怎樣廣闊無邊的際野，這在一九五一年——五五年的包含廣泛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中，又一次得到了說明。

這一計劃包含了大規模的工業發展，主要的是重工業，這將促使經濟生活普遍的的快速增進。

到一九五五年，銑鐵產量每年將達一百萬噸，鋼鐵產量則將達一百二十五萬噸，這便是一九二五——三五年資本主義羅馬尼亞時代銑鐵每年產量的二十倍和鋼鐵產量的十二倍半。

在同一時期內，煤的年產將增加四倍，焦煤者則將增加八倍至十倍。煉油工業在戰時遭受了最大的損壞，這是戰前羅馬尼亞發展得最好的工業。計劃中規定在這五年的第三個年頭，油產量要達到戰前的水平，在以後的幾年內，則要大大的超過它。

鐵與鋼生產之擴展，將使國家有能力發展工程工業，到這五年底終了，這方面（指工程工業——譯者）的產量將增加一倍，農業機器之生產將受到特殊的注意，拖拉機底製造將增加三倍，因此，到五年計劃終了時，羅馬尼亞每年將可生產六千架拖拉機，其他的複雜的農業機器（包括康拜因機）之製造在計劃中也考慮到了。所有這些，將替農業提供大量的機器動力。

羅馬尼亞能夠大量生產便宜的電力，但截至目前為止，她在這方面的廣大的自然資源實際上還沒有利用到，在六十個年頭裡當時作為統治者的資產階級和地主集團所建立的電力站總電力僅只六十萬瓩，而在目前這一計劃下，五年之內就要供應兩百萬瓩的新電力。這在走向完全電氣化這一道路上將是一大步，羅馬尼亞共產黨早在一九四五年就提出了全國電氣化的目標。

電力之擴增，重工業和機器製造生產之發展，以及農業之機器化俱來的，將是羅馬尼亞經濟生活底全面增進。在這五年內，國民收入將增加一倍，生活水平則將高過一九四九年者的百分之八十。

羅馬尼亞人民熱烈而自豪地歡迎了這個計劃，成千成萬的勞動男女研究着這一富有歷史意義的文件。這是瞻望着將來的鬥爭，通過它，他們能夠看到他們底國家明天，明年將會是怎樣的，在幾年的時間內，他們能夠清楚地看到建設社會主義的光輝燦爛的前途。

匈牙利的五年計劃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國民會議批准了一項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這一廣大的計劃，包括以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四年這五個年頭，它底目的是要增加國家的生產力，從而更進一步提高人民底生活水平。這一計劃之完成將使國民經濟完全改觀：匈牙利將由一個農工業國（Agrarian—industrial country）變為一個工農業國（Industrial-agrarian country）。

在這五年之內，將建立二百六十三所新的工業企業，包括三十六所鍊鐵廠，鋼鐵廠和機器製造廠，二十一所煤礦，以及三十八所化學廠，工業產量較之一九四九年將要增加百分之八十六，而一九四九年者即已超過戰前的百分之四十（這與三年計劃底成功是分不開的）。因此，到一九五四年匈牙利底工業產量較之戰前將增加二倍，電力亦將增加一倍。

五年計劃底另一目標，則為使農業按照社會主義底路線機器化並重建起來，以消除農業上底落後，到一九五四年，匈牙利將有二萬二千八百架拖拉機，它們將耕種全國百分之六十的耕地，目前農業產量幾已達到戰前水平；到五年底終了，農業產量將要增加百分之四十二。

匈牙利勞動人民底生活水平則將超過戰前的百分之八十五，五年計劃草案剛在報端公布，就獲得了人民普遍底擁護。

Sgabad Nep 寫道：

「使得我們工作成功的一切條件都有了，因為我們有一個偉大的朋友——蘇聯，我們的支持者和解放者，她底榜樣給我們指出了正確的道路，她底經濟幫助了我們，她底堅強的臂膊保衛了我們；同時，也因為整個的強大的和平陣營和我們一起為我們底五年計劃，為增強着的人民民主政權，為匈牙利之奠定社會主義基礎而歡欣」。

捷克斯拉夫底經濟發展

就在英國財政大臣克利浦斯從廣播中宣布英磅貶值以及與之俱來的麵包漲價之前的二十四小時，捷克斯洛代克總理查波多基（Artarin Zopotocky）向全國報告了：從十月一日（一九四九年）起，麵包及其他麥麵製品之配售一律取消，而麵包的價格則仍不變。

布拉格 Rude Praro 評論這兩種發展時，寫道：

「如同英國樣，我們底共和國也是一個工業國家，可是這兩個國家必然提供出的迴然不同的結果，卻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情。我們業已剝奪了資本家底努力的來源，並藉着社會主義蘇聯底支持進行了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相反的，英國的工黨政府已經把她裝飾到馬歇爾計劃裡去了，因而就分享了美帝國主義者底命運，並委身於華爾街的主子們，向他們搖尾之憐」。

兩種政策，兩條道路，今天社會發展底兩個方向！

捷克斯洛代克底人民聽到了取消配售的通知，這不僅祇是受到一個家庭歡迎的消息，而且也是他們國家底增進着的經濟力量底新鮮而令人有極其深刻印象的一個指標，因為使得豐盛的收成成為可能從而使加速了麵包配售制之取消的，主要的是工業生產中有組織的超過計劃（在一九四九年的前九個月中便已完成該年計劃底百分之一〇一．八），以及供應農業的成千具的新拖拉機、播種機、收割機和其他的機器。

捷克斯洛代克在粮秣供應方面的巨大進步給家畜之增殖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在這一方面，一九四九年是一個轉捩點。在六個月之內，牡豬的數目增加了百分之十四，人民得到了較好的豬肉，牛乳以及牛油的供應。例如：七月（一九四九）的牛油產量就比六月者增加了二十二萬四千瓩 乳酪產量較之一九四八年七月者增加了

產階級從資本的特性中解放了迄今仍為資本增殖的生產手段，賦予他們的社會性以維護其自身的完全的自由。於是，一個做為預定計劃的社會的生產，現在成為可能的了。」（恩格斯，反杜林論，莫斯科版，一九四九年，四二三頁）

列寧基於他自己對科學的社會主義的要求，把包括在共產黨（布）的方針內的：「國家的整個經濟行為的最高度的統一是按着單一的國家計劃。」作為蘇維埃政府的一項基本工作。

蘇維埃制度的創立和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制度的建立，不僅使國民經濟計劃成為可能且成為必需的。資本主義的私有生產手段分散了國民經濟機構的經濟上相互關聯的部門，產生了競爭的和無可調和的矛盾與危機，而社會主義以生產手段的為公共所有則結合了國家的整個國民經濟，加强了各部門之間的關聯，因而造成必須依照單一的計劃推動國家的經濟。

正如列寧所指出的，社會主義是以大規模的社會生產為預定的目的，因而沒有計劃的國家機構則是不可思議的，計劃的國家機構要求千萬人民在生產和分配上應當嚴格的遵守單一的標準。

在所有的條件（不論是內在的或外在的）下，蘇聯發現自身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必須通過在整體國民經濟中的生產與分配的規則。如果沒有這個規則，蘇聯將不能從恫嚇的經濟災難中救出來。

但是，這樣的工作惟能由新的、蘇維埃政府成功地完成，因為這樣的政府纔能堅定的實行國家恢復的計劃和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國家的轉變。

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工人階級在廢除資本家和地主的統治，取得經濟上的主要地位之後，以建設社會主義為目標，從事於計劃組織的為整個人民利益的社會生產與分配。

計劃經濟不是即刻地出現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它是在抵抗蘇維埃國家的和社會制度的內外敵人和在其進程上克服鉅大困難的殘酷鬥爭中產生和發展的。在計劃經濟基礎上國家經濟生活的重建引起國民經濟機構新形式的探究，而新形式的嘗試則由於革命的變遷、千百萬人民的創造行動和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者的經驗。更由於國民經濟的組織和處理問題，社會主義計劃的布爾什維克原則的確立，引起了深厚的科學工作。列寧和斯大林照明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路，指導蘇維埃人民的重大的革命行動，創造了蘇維埃經濟的計劃和處理的原則。

從社會主義革命的最初時日起，列寧和斯大林即以最大的注意研究科學地解決社會主義的計劃問題。列寧是第一個偉大的國家計劃的鼓舞者和組織者，那個計劃就是哥爾羅（蘇聯電氣化的國家委員會）計劃。在以後，國家計劃獲得進一步建設的發展和將計劃安排於最科學的基礎上的是由於偉大的完成斯大林五年計劃的時期。蘇維埃五年計劃構成了社會主義擴展再生產的一個主要計劃，而這計劃中所有的原則和許多條欵都出於偉大的革命導師，斯大林同志之手。

在解決社會主義計劃的問題中，有一大部份是由列寧、斯大林的同志和學生：莫洛托夫、奧爾羅尼克則（Orionikidge）、德則爾捨斯克（Dsershiroky），庫依貝捨夫等入。在他們的工作中，我們發現了一般化的具體經驗，計劃和處理社會主義經濟的最重要問題的結論。

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每一步驟裡，國家計劃完全地包含着國民經濟，且增進其由於在完成建設工作和以最快速度發展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所產生的新方式。在國民經濟中計劃的任務和意義的增加在於下列諸條件，即社會主義關係的成長和團結，蘇維埃國家力量的增長，國民經濟的物質和技術的基礎的發展及社會主義建設者後備軍的成長。

社會主義的計劃發展在抵抗階級敵人，小資產階級的紛擾和資本主義的復活與影響的緊張而劇烈的鬥爭中。

社會主義生產手段的公共所有之為蘇維埃經濟制度的不可動搖的基礎，資本主義因素的消滅和工農新階級友誼關係的建立（如蘇聯憲法所規定的），今在無限制的增加蘇聯國民經濟計劃的任務。國家計劃成為蘇維埃經濟的鉅大的組織力量，它包括國民經濟的所有部門，社會主義再生產的所有各方面。

在當前，社會主義計劃，社會主義祖國經濟發展的强大的力量，已經深深地成為千百萬蘇維埃人民的生命和習慣。

剝削階級的統治和資本主義生產手段的私有致令計劃國民經濟成為不可能，而所有勞動計劃的努力和資產階級的政經學者的詭計全在失敗中無可避免的決定的結束了。

浙江支前運動

紹聲

統計的報告

為解放舟山而努力，四個多月以來在浙江共動員了臨時民工一四五七三八入，長期民工二五八一八，船伕八二八人，修船工一〇七人，這是浙東支前司令部副司令董鳴春同志在支前全體幹部大會上所作的工作統計報告，這說明了浙江人民是有能力有決心來把這艱巨而光榮的支前任務勝利完成的。

英勇的事例

在這時期，湧現了大批的支前模範功臣，如長期民工姜阿談，他本來是一個樸實篤誠的漁民，蔣匪帶封鎖了浙江海面，逼迫着他挨餓，恨透了舟山殘匪，所以至九月初人民政府第一次號召支前時，他就勇敢的報名參加了，三個月的工作，他教會了成千人民戰士的搖櫓撐船，在解放金塘島時他搖着第一船登陸金塘島，光榮地搶到了一等功臣的稱號，在慶功大會上，姜阿談扣上了美麗的鮮花，他興奮地說：「我活了這麼一輩子，到今天才覺得真真的有了光榮，我一定爭取在解放舟山時也撐第一船。」

軍需訓練團

在運輸上，艱苦的工作大都是由浙東軍需訓練團來担任的，自十月初軍需訓練團調來前線工作後，在十五日中就把食米二百三十二萬八千六百五十二斤，白麵六萬七千七百六十斤，柴草七百七十二萬斤，藥品十九萬斤，棉衣二萬二千七百四十套，這些鉅量的物資，輸送到前方，保證了前方人民戰士的飽食暖衣，這是浙東前線後勤部隊一支最巨大艱苦的力量，經常的困難是需要他們來克服的，如某日三十幾艘滿載着食米的運輸船，由他們撐着抵達舟山羣島中××島，這時西北風颳得緊，適逢退潮，島上又沒有碼頭設備，海水衝激着船沿，一時無法靠岸，團內的九連副政委劉文聚同志，就首先脫下軍服，跳下海灘去，在深沒腰際的冰冷海水中，把船拉上岸去，就這樣軍需訓練團的同志們，保證了支前運輸的迅速完成。

築好鄞穿路

在交通上、寧波軍區和浙江二區地委合力動員人民，化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突擊地修築好了鄞穿路，從寧波聯着穿山半島貫通到穿山鎮，這是一條直搗舟山

之間是一道敵視底國界。戰前波蘭外長培克（Beck）和希特勒合作以圖破獲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這一事實，更進一層助長了這種敵視。」

波蘭人民嚴斥了這一違反波蘭本身利益的冒險家底政策，可是當時波蘭底統治者們選擇了「不理」的辦法。

今天，這一切都隨着法西斯主義的夢魘絕跡了，波捷國界不再將這兩個友愛的民族分離，而是將他們緊張在一起了，兩國間的國界，由於幾世紀以來割裂着斯拉夫土地的德國尖楔之被拔除，而大大加長了。

從一九四七年七月訂定的內容廣泛的波捷五年經濟協定中，我們即可找到兩國之間目前的經濟聯繫，這一協定是在波捷友好合作和互助條約簽字後不久即訂定了的，其後這一協定又因各種草約之訂定而擴大了，這些草約是按照兩國需求和能力之增加而訂定的。

實際執行這一協定的是波捷經濟合作委員會。

從下列數字中，我們便可知道波捷貿易達到了怎樣的程度：一九四六年，在簽定這一協定之前，那是戰後困難表現得最尖銳的時候，雙方一期貿易實出額僅約三百萬元，到一九四七年波蘭以捷克斯洛伐克輸入品底價值已爲六百五十萬元，而輸往捷克者，則達一千三百五十萬元，到一九四八年，捷克斯洛伐克輸往波蘭貨物總值五千五百萬元，從波蘭輸入者值四千四百萬元，這便是戰前一九三八年數字底五倍。

今年（一九四九）兩國間的貿易繼續增進了。

波蘭的農民報（Djiennik Ludowy）在根據經濟協定總結兩年來合作的成績時稱：波蘭以煤斤，鋅，若干種農產品，魚和白雲石供給捷克斯洛伐克；後者則以焦煤，鞋襪，汽車，機器工具，和車胎賣給波蘭。

兩國間的經濟聯繫并不止於貿易，協定中同時也提出了旁的形式的合作，如共同利用國界地區——波蘭境內的斯拉斯哥——大布羅斯基流域（Slasko—Dabrawski）和捷境的莫拉夫斯卡—阿斯特拉瓦（Moravska—Ostrava）地區——的工業和發電設備以及自然資源；又如共同建設并管理工程事業，特別是電力站，更有進者，波蘭已將她底波羅的海沿岸港口底若干地區借給捷克，斯茲克捷辛（Szczecin）港底捷克區已開始建設，該港在一九五〇年春季即將開放，這將使捷克得到出海通路，大大便利了她和世界上其他地區的商業聯繫，同時，正在計劃從阿得河開一道運河以串通多瑙河水系和波羅的海，這一工程的建設工作，這一水道將替諸人民民主國家國外貿易之大量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波捷經濟合作，通過經濟互相委員會，并依靠着兩國和蘇聯之間的經濟聯繫，而獲致了成果。

人民民主國家和蘇聯以及她們自身之間的合作——這是以有關各方眞正平等的原則爲基礎而建立的合作——給帝國主義者阻撓波捷間經濟發展這一企圖注定了完全失敗的命運，這兩個國家均已開始社會主義建設，因此，這種合作在增進歐洲底和平這方面，起着極爲重要的作用。

（譯自蘇聯「新時代」一九四九年第四十期、四十四期、四十六期、四十八期和五十一期）

蘇聯國民經濟計劃的任務與工作

A·庫爾斯基著
蒲希平譯

本文譯自A·庫爾斯基所著「蘇聯國民經濟」一書。該書包括四章，㈠蘇聯國民經濟計劃的任務與工作。㈡蘇聯國民經濟計劃的發展。㈢製訂國民經濟計劃的原則。㈣完成國民經濟計劃的鬥爭。

社會主義計劃的先決條件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創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展開了社會主義的時代。從經濟的災難和惆悵着十月革命的外國的束縛中救出了我們的國家。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工人階級第一次在歷史上創造了一個新形態的眞正的民主國家，開始了計劃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蘇聯的國民經濟計劃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重大收獲；它是列寧，斯大林黨爲共產主義的勝利鬥爭的偉大武器，馬列主義觀念的具體物。

計劃國民經濟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的確定的優勝點之一，是超越資本主義的最重要的指標之一。

社會主義國民經濟計劃的事實阻止了危機、失業和經濟紊亂的可能。由於國民經濟的計劃，蘇維埃國家在戰前的幾年中，生產力的增進達到了空前的速度，而且繼續地擴大着社會主義的再生產。由於實踐着列寧、斯大林的偉大事業的計劃，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蘇維埃的人民於極爲短暫的時間改變我們的國家成爲一個偉大的工業國，和在世界上爲規模最大、最高度機械化農場的集體農場的土地。在偉大愛國戰爭中，國民經濟的計劃性是在最短的時間創造一個穩當的功效和開展戰時經濟的最重要的一個手段，從而對敵贏得經濟的勝利。在戰爭勝利結束後的今天，社會主義的計劃是促進國民經濟在恢復與發展途中所遇到的問題能夠有效地解決，戰後時期的困難能夠克服。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政治的和經濟的條件的創設，是由於工人階級的取得政治的權力，由於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的廢除和生產手段爲社會所有制度的建立。

在共產黨宣言裡，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宣稱：「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把一切資本從資產階級那兒奪來，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裡，就是說，集中在組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儘可能最迅速地增加生產力底總量。」（馬克思文選，卷一莫斯科，一九四六，頁一二九）。

資產階級社會的矛盾爲什麼由於無產階級的革命而能得到解決，恩格斯曾指出：「無產階級的取得公共權力後，由於這種權力的性質改變了社會的生產手段，即從資產階級的私有而成爲公共財產。因爲這種行動，無

遭成了鉅大的赤字。當英國把必需品的進口減縮時，英國政府將經濟危機的負担移轉於工人的身上，增加直接和間接稅，且降低工資。英國曾以向美貸欵做爲挽救危機的方法，但因此，她的經濟發展必須服從於美國資本家的利益。

資產階級的法國也不能有恢復和發展她的國民經濟的計劃。流行在法國的所謂「蒙萊特計劃」，只是在不能侵害資本主義私有關係和壟斷資本家的鉅額利潤的計劃範圍之內的無數投影之一而已。這個「計劃」的作者們申述了不約束任何人的經濟發展的指標，並在同時企圖借助外債解決擴張法國工業的問題，而不惜傷害國家的獨立。

戰後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各種「計劃」的設計，均未以抑低壟斷資本家的統治和展開爲他們國家的人民利益的經濟。他們所計劃的是爲了加强壟斷資本家的力量，爲了壟斷資本家的超額利潤，並爲了侵襲廣大人民的眞正的利益。

和資本主義國家的錯誤的和詭譎的「計劃」比較，新民主主義國家的計劃基於他們的人民的利益，在他們的政治的和經濟的獨立的堅定基礎上，成功地解決了他們國家戰後恢復和發展的問題。

由於對德國法西斯戰爭勝利的結果，在東歐和中歐崛起的人民民主的新的國家和社會制度，能夠促進他們着手計劃他們的國民經濟，雖在發展的水平和其他的特質上他們的計劃經濟和蘇聯的社會主義計劃不同。但因工人階級的獲得政權、大工業和銀行的國有化、以及土地改革的實行等事實促進了新民主主義國家爲廣大人民的利益而從事計劃，迅速地恢復國民經濟，剷除經濟的和技術的落後，確保國家的獨立。

捷克完成了兩年計劃（從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這個計劃的目的在恢復國民經濟和提高生產力超過戰前的水平。在一九四九年捷克開始了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三年）。

波蘭有效地實施了三年經濟計劃（一九四七、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這個計劃的目標在提高工業和農業生產超過戰前的水平。在努力提前完成三年計劃的同時，新六年國民經濟計劃的製訂工作也接近完成了。這一計劃包括的時期是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五年，其目的在奠定波蘭建設社會主義的基礎。保加利亞的兩年計劃（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以發展重工業爲目的，達到電氣化而提高工農業生產超過戰前的水平。這些目標的主要的都達到了。在當前，正在實行着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人民會議通過的五年計劃（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

基於國家經濟和合作社經濟在國民經濟成份中的居於領導地位，及與蘇聯的密切聯繫，東歐及中歐國家的民主政府成功地運用着計劃做爲他們脫離帝國主義國家和進入社會主義而發展他們的新國家和社會制度鬥爭中的强有力的槓桿。

（未完）

（上接第14頁）

到了現在，師大全校師生員工把這個「師大改進」問題作了一番嚴正、普遍而激底的研究討論，一致擁護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改革師大的號召，確定了師大的目標和任務，擬訂了改進工作的計劃和逐步實施的方案。最近一切經過，詳在他篇，本文從略。當然，系科的課程問題也包括在其中，但還待每一系科和每一個教授把課程的改進工作具體化起來，才能實際地完成這個師大改進的任務，而眞確地達到新師大的目標。所以本篇特把三十年來師大改制而不曾切實改進課程以貫激並實現改制的精神和效果，以致屢次都終歸失敗的歷史，宣敍出來，雖然過去失敗的原因不止一端，最基本的原因還在政治，但若只就一個學校本身上說，那麼，目標和任務既定之後，改進工作的重要就在課程——編制、師資、教材和教法。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更正

本刊上期第十八頁「中英貿易及其將來」文中，第二段第九行「入口稅」應爲「子口稅」，第四段第九行「佔噸數」應爲「總噸數」，同段第十四行「長期用」應爲「長期同」，第五段第八行「總值約」應爲「總值的」，同段第十行「所屬」應爲「荷屬」，特此更正，並向作者及讀者致歉！

了，可是爲了顧及生產和反霸減租運動，所以政府還是盡可能的減少人力，像軍需訓練團在某地工作時，上級原允許他們在必要時動員當地若干人民參與工作，可是團內的同志們爲減輕人民的負担，始終未行動員。在目前發動支前運動的困難時期已經過去了，農民們在經過減租反黑田的鬥爭後，已經充分的有了高度政治覺悟、給解放舟山的支前工作上奠定了優良的基礎。

支前民工的教育

教育參加支前的民工，還是浙東幹部一個新的課題，在支前民工中，有金華區的，諸暨區的，紹興區的，天台區的和寧波本區的各地農民，所以首先需要搞好的是集體主義的團結精神，其次是啓發民工的本身階級覺悟，和對蔣匪幫反動派的憎恨，還有就是詳細地用具體的事實來說明舟山幾架殘餘匪機的可憐的力量，使大家認識到跨海過去是完全可能的，像這一次在十二月廿八日回去的蘭谿一千五百名支前民工，他們在穿山眼看着解放軍同志渡海來去，根本不算一回事，打破了他們一向認爲「海洋可懼」的觀念，在復員時他們一致表示要把這親身所受到的寶貴教育，帶回去給同鄉的親友。

糧站和呂洪旺

在運輸中，轉運糧站的建立是一個工作的重心，要搞好一個糧站，使它健全起來，不浪費，不腐蝕，是需要優秀的工作幹部，經過三個多月來的批判和改良，甚至鬥爭，到今天已經健全地普遍建立起來了，在十一月中旬召開的浙東支前幹部全體大會上，寧波專區副專員兼浙東支前司令部糧食部長闞康候同志，特別爲糧站工作人員指示六點：一、建立現糧彙報制度，二、加緊學習，三、要有工作的長期觀念，反對臨時式的工作態度，四、加強蔴包整頓工作，反對浪費，五、加強會計制度，建立專業化的分工，六、在工作中要有克服困難的精神，需時時準備困難來臨。在改進糧站工作中，發現了很多優秀的負責任的工作幹部，像呂洪旺同志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個，他是一個優秀的後勤工作幹部，自被調派到×地糧站工作後，他一直就極負責任，在十月十四日至十一月五日的二十天內他一個人在糧站面前的廣地上，掃起掉落在地上的食米三千餘斤，食穀一千六百多斤，當工作忙的時候他甚至一日一夜不休息，別的同志勸他息息力，他說：「每一顆糧，都是人民辛苦的血汗，我們不能把它隨便浪費了，咱工作辛勞一點算什麼。」因此前線第二十二軍機關報「施水報」把呂洪旺選爲糧站工作幹部的模範，並號召發起「呂洪旺運動」，向呂洪旺看齊。

舟山是殘匪在浙江的一個最後窩穴：肅清舟山殘匪，建設新浙江，是今天浙江人民努力的總方向，隨着英勇的人民解放軍向舟山羣島勝利進軍，徹底殲滅舟山匪敵的時期已經不會太遠了，只要咱們再加一把勁！

斯大林和英國作家威爾斯談話時說：「假若你們沒有從資本家那裏解放了你們自己，假若你們沒有廢除了生產手段私有的原則，你們就將不能創造一個計劃經濟。」

「什麼是計劃經濟，什麼是計劃經濟的特徵？計劃經濟的目的在根絕失業。讓我們假定保留資本主義制度可能減少失業至最低限度。但沒有一個資本家在任何理由上同意失業之完全廢除和失業後備軍的廢除，因爲失業的功效在支持勞動市場，保證廉價勞動的供給。在這裏，你已得到了資產階級社會裏『計劃經濟』的缺陷。而計劃經濟却更進一步保證增加爲人民大衆所特別需要的各種工業的生產。但是，如你所知的，在資本主義下生產的擴張採取了完全不同的動機，即以資本投入利潤最高的工業部門。你從不能强迫一個資本家爲有害於己而同意爲人民需要的滿足減低其利潤率。」（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第十版，頁六〇〇）

在每個資本主義的企業裏，工人勞動的組織備是爲了資本主義的意志，爲資本主義得最高的利潤。但就整個國民經濟而言，亦是無計劃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因而造成在各種工業和工業的各種部門間發展的不相配合和不相等。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大羣工人聚集在大企業裏。各種企業間供給原料，補助原料和設備以及製成品出售的市場關係繼續擴張着。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是資本主義結合了並社會化了勞動；但社會勞動的生產則是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於是，在資本主義下，存在了生產的社會性和財產私有制的不可調和的矛盾。資本主義的基本的矛盾表現自己在生產過剩的週期性的危機中，由於大多數人民缺乏充裕的購買力，大量的商品找不到市場，以及毀壞商品希求價格增高；但當價格激劇地降低在生產的水平之下，許多企業因而倒閉，工人失業，貧苦在工人階級中遂加深加劇。

在帝國主義時代壟斷資本家的統治產生了管制生產的可能，但同時加深加劇了固着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的混亂。

列寧說：「帝國主義使資本主義的矛盾更爲複雜而劇烈，帝國主義『纏結』着與自由競爭相反的壟斷，但它不能廢除交換，市場，競爭和危機等。」（列寧文選，卷六，莫斯科——列寧格勒，頁一一〇）

在世界第二次大戰期中，資本主義國家戰時國民經濟的重視和準備，所採取的方式是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積極干涉；但自戰時國家管制國家經濟的諸種措施並未表示資本主義已樹立了計劃經濟。資本家的關係，資本主義的基礎——生產手段的私有，剝削，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競爭——完全存在。在資本主義下經濟生活的基本原則是利潤。在戰時表現得最明顯的是壟斷利潤的高翔。在壟斷資本家和個別資本家間的無政府狀態和競爭，保持着資本主義存在期中的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可分性和本性，並在國家管制和統治的每一種形式中，包括了國家戰時壟斷資本主義。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家的干涉經濟生活和管制國民經濟，在戰時的實行是爲了壟斷資本家的利益，而損害着工人階級大衆。壟斷資本家規避了戰爭的主要負担。

自戰時進入和平時期，諸種資本主義的發展戰時經濟的管制和統治措施之完全廢除，由於符合着資本主義本性的無計劃和無政府狀態之被增大。在生產、建設和分配範圍內的國家統治（原料的配給與勞動力）廢除了。在戰時美國所實行的價格管治，在以後完全廢止了。在戰時國家所建立的工廠由於以後已不需要而落入壟斷資本家之手。

戰後資本主義國家國民經濟的再度改變由於市場收縮、生產減少、價格增高和失業增加的結果。在美國工業生產的指數是：一九四三年與一九三九比較是二一九與一之比，到一九四五年降爲一八六，一九四六年再降爲一五六。按照官方的統計，在一九四六年初，美國的失業人數達三百萬，數百萬半失業者尚未計算在內。在美國的戰後經濟恢復的各種情況中，經濟危機的條件即將瓜熟蒂落。報酬的減少，商品的堆集，證券市價的下跌——所有都清楚地表示着美國瀕臨於經濟的危機。

美國的壟斷資本家企圖用壓迫其他國家和所謂「馬歇爾計劃」統治的歐洲市場轉變其不可避免的經濟危機。美國資本家的這個新「計劃」的政治作用企圖在美國的庇護之下復活德國的帝國主義，並形成攻擊蘇聯和新民主國家的西歐集團。

英國雖有工黨政府採取某幾種工業的國有化和管制經濟生活的措施，但確已經驗到了混亂和長久的深刻的危機。在戰前，英國在世界上是以煤爲出口的第一個國家，在戰後却無力滿足國內燃料的需要，在一九四六年的冬天許多工廠由於缺乏燃煤和電力被迫停工，只在那一段時間裡失業人數即增加到三百萬。

在一九四七年英國的煤產量仍然很小，收支懸殊，

的路，巨額的支前物資就順着它通向前線。自然在修築中，蔣匪機也曾日夜騷擾，妄圖阻礙，破壞，可是在巨大的人民力量面前，這無恥又無謂的一切陰謀殘害都被粉碎了，十一月一日這長五十公里的鄞穿路全線，莊嚴地宣告正式通車、這標誌着幾架殘存匪機的力量是那麼的渺小，象徵了舟山殘匪終將覆滅的悲慘命運。在這以後，當然至死不悟的匪機還是窮兇極惡的妄圖來毀壞，可是有效果嗎？一枚炸彈至多不過一個洞，化費幾分鐘的功夫，就可以毫無困難地把洞填平的。

青年學生參加支前

作爲時代號角手的青年學生們，在這次支前運動上也起了巨大的作用，響應政府號召，參加支前工作，是今天浙江青年迫切的重心任務之一。紹興財政訓練班二中隊的全體同學在百官糧站工作時，他們的任務原爲在二十日中集糧十萬斤，柴草五萬斤，馬料二萬斤，可是結果他們却集了食米十六萬斤，柴草十二萬斤，馬料三萬斤，超出原定任務一半以上。爲了適應前線的急切需要，浙江人民政府於十二月初發出通告，號召浙大，寧工等校土木系同學動員往浙東前綫工作，醞釀以後，原定在浙大抽調二十一人的，結果有二十八位土木系同學爭着要參加，寧波高級職業工校索性動員了土木科高三年級全班的同學響應支前，在一九四九年大除夕的那天，二校同學在浙東前線某地勝利會師，並且開了一個盛大的聯歡晚會，在會上二校同學互致兄弟的敬禮，緊緊地握手，共同保證任務的完成。

動員民工的階段

在新解放地區裏要動員這樣巨量的民工，是一件相當困難棘手的事情，在起先雖然人民政府以「以工代賑」的方式（那時浙東適逢颱災）發動農民參加支前，可是由於解放不久，當地農民覺悟程度不高，又加上農村反動地主勾結匪特的造謠生事，所以農民對支前工作都抱着「敬而遠之」的態度，逃避，懼怕，甚至以爲支前就是抽壯丁，一去要不回了，但是事實勝於雄辯，匪特的無恥謠言，終於不攻自破，漸漸地農民覺悟起來，人民政府在羣衆中奠立了威信，首先農民中的積極份子，在支前運動中起帶頭作用，這樣農民對支前的顧慮慢慢的消除了，又眼見到前期參加支前的親戚鄰友勝利地光榮地回到了鄉村，從他們的口述中，知道了支前生活的眞實情況，這是最有效的宣傳，自十一月中旬起，大家已對支前工作感到了親切，明白了責任；動員是容易

除了組織之外，監獄還通過競賽，記功等方式來進行教育鼓勵，競賽中的模範可以提前釋放，釋放的時候全獄還要開大會歡送。

去年，有五個犯人在徒刑滿期後不願離獄。他們說「我們本來沒文化，現在有了文化；本來沒技術，現在有了技術；本來沒政治，現在有了政治；我們要永遠跟着政府走，只要有飯吃，不給薪資也願工作！」現在，他們都留在監獄工廠裡工作。

（三）

監獄（包括看守所）全部只有十五個工作者，其中包括了司法幹部，經濟幹部和警衞。而裡面又是這樣的寬大，難道就沒有怙惡不悛的罪犯（譬如特務犯）搗亂或圖謀不軌麼？

監獄長解答了這個問題。他說：「我們是緊緊依靠工農羣衆，啓發他們的階級覺悟，教育並鎭壓少數反動份子。」

解放以來的上海經濟動態（續）

戎文佐

在增資完成的行莊中，人民銀行華東區行即於九月下旬開始查驗工作，其中多數行莊都如法辦理了增資手續，但是亦有少數行莊依舊承襲過去反動政府時代投機取巧的壞作風，有許多行莊甚至發生了以拆入欵項作爲增資資本的嚴重行爲，經過了二個月左右的查驗，被華東區行查出有各種違法行爲的行莊竟達六十家之多，人民政府根據違法情節的輕重，陸續予以停業，暫停票據交換，和罰金等處分，根據十一月下旬報上陸續公布的消息，被處以暫停票據交換的行莊有二十二家，處罰金及警告的有二十七家，原來應受永久停業處分的春茂等七家行莊，由於顧慮職工的生活保障，在資方悔過自新並保證不再犯過錯之後，臨時改爲暫停營業之處分，這是解放後私營銀錢業增資和管理整肅的初步情形。

此外，自十月中旬開始延長至十一月下旬的一次物價漲風，許多私營銀錢業和地下錢莊，拆放字號都捲入了當時的投機狂潮，使當時的物價超過規律地瘋狂上升，自十月二十五日大升錢莊因投機失敗倒閉後，在十一月物價漲風中先後因投機拆放而無法補足交換差額因而倒閉的有恒利、惠豐、通實、共昌、等行莊，這些行莊都依法被勒令予以永久停業處分，並限期清償全部存欵，其中恒利、通惠、共昌三家負責人便因無法清償存欵而被移送法院辦理，同時人民政府又嚴格取締地下錢莊，和私營拆放，以保障私營銀錢的合法經營。

物價

解放以來，上海物價有過三次較大的上漲，在這三次物價上漲中，表現了三種截然不同的性質，因此人民政府在爭取物價相對穩定的門爭中，亦採取了三種不同的方式，在目前階段，財政收支還無法完全平衡，通貨的增發不可否認地是促使物價上漲的基本原因，因此物價的緩步上漲是可以理解的，並且是有利於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的，但是這三次的物價上漲，却超出客觀的物價上漲的規律，充滿了投機和危險的成分，窒礙了正常工商業的經營，威脅了廣大人民尤其是職工的生活，因此這樣的上漲是不被允許的，必需堅決的予以門爭。

第一次上海物價的上漲開始於解放初期的五月下旬，至六月中旬止，這一階段，人民幣在上海市場流通的基礎尚未鞏固，僞金元券的流通地位雖然已由人民幣加以代替，但因爲那時金元券的流通，已經不是市場上的主要授受標準，實際上那時候上海的物價都是以銀元計價的，一般市民在反動統治時惡性通貨膨脹下所造成的對於通貨不信任的成見，還沒有消除，因此在這一時期內銀元金鈔投機非常猖獗，因此這一階段的物價上漲是和銀元投機不可分的，總計在這一階段中，物價上漲達百分之二百七十左右，這一上漲幅度大體上接近於黑市銀元上漲的比例——從解放時之五百元左右到一千九百元的高峯——因此人民政府在這一階段物價所作的門爭，便集中於打擊和取締銀元金鈔的黑市投機交易上，這一門爭，結合了上海市人民，尤其是產業職工和學生的羣衆行動，終於獲得了勝利的成功，這一門爭的發展以證券大樓投機總樞的破獲而達到了高漲，銀元金鈔的黑市終於在基本上被消滅，奠立了人民幣在市場流通上的鞏固地位。

第二次的上海物價的上漲開始於六月下旬到七月底，由於洪水和颱災，加以敵人的封鎖，上海對外交通停頓阻塞，物價以米價帶頭上漲，一般物價跟同追隨上漲，上漲時日延續至一個月，上漲幅度平均每天達百分之二·九，人民政府對於這階段物價的處理方針，是發動東北、華北等老解放區糧煤大力支援上海，恢復交通，同時通過財經機構國營企業以收購，訂貨，押匯以及貸欵等方式，大力扶助私營工商業，使物價逐漸穩定，使工業品與農業品的反剪刀差逐漸消滅。

第三次物價的上漲開始於十月中下旬，延續到十一月下旬，首先由於人民政府正確的執行了六大任務的號召解放地區逐漸擴大，市場銷路日益發展，尤其是廣州和華南廣大地區的解放，自八月底起上海工業和棉紗布價格，便開始緩步的「調整性」的上漲，從十月下旬起

本刊一卷十一期要目

北京解放一年
論社會轉形中的官僚階層　王亞南
論批評與自我批評對當前學術界的必要　趙儷生
物價・金融・公債　楊培新
中英建立外交關係與帝國主義對華新策略　費孝通
中英建立外交關係與中英新約　陳體强
英國工黨・大選・社會主義　陶大鏞
兩個英國，兩種「友好」　蕭乾
中英貿易及其將來　趙守愚
關於蘇聯——答客問　畢樹棠譯
量與質　陶宏譯
華北的水車事業　王鴻
記河北全省經濟會議　陳經
山東怎樣戰勝了災荒　丁匯川
羅馬尼亞農民踏上社會主義道路　裴凌譯
解放以來的上海經濟動態　戎文佐

石家莊人民法院監獄參觀記

·夏　楚·

（一）

剛一走進石家莊市人民法院監獄，首先印進眼簾的就是一塊寫滿了當天時事要聞的黑板報（這天寫的是英國要求與我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消息）接着就看見在一塊叫做「自治生活」的墻報上相當藝術地寫着戒護隊（監獄警衛隊）和「自治號」、「爭進號」學員相互勉勵的拜年信。這邊的幾排屋子裡人們在忙着織襪子，織布，打鐵，鋸木……那邊一羣人正在唱歌，院子裡是一羣一羣的「爭進號」在開小組檢討會，一個人正在發言檢討「個人英雄主義」，一間看來是當作教室的屋子裡的黑板上寫着的「紫石英號」「聽其言觀其行」還沒有拭去，想來剛剛下課不久。幾進院子裡所有的門都敞開着，寬敞明亮的北屋是「自治宿舍」或「爭進宿舍」，裡面是摺叠得十分整齊的被褥，（這時宿舍裡面是空的。）東西兩側的廂房則標明是「書報室」「醫療所」或「××工廠」；再往前走，「供銷社」（裡面貨架上放着學習本，牙粉，肥皂）「浴室」……）一打聽，這裡面的人每個月洗一次澡，二十天理一次髮。

這完全沒有鐵柵和呻吟的地方確實就是監獄。這時裡面有五百多犯人（包括在押犯），而監獄工作人員（包括工廠經濟幹部和警衛隊）只有十五個。至於武器，筆者所目見的僅僅門口站崗的一支步槍而已。

（二）

新的監獄制度，其目的已經不是消極的恐怖鎮壓，而是積極的教育改造。石家莊市人民法院監獄（雖然它成立不過兩年，雖然其中的工作者都是沒有司法工作經驗的新幹部），在這一方面是有着卓越的成就的。

教育改造是主要的手段之一就是勞動改造。石家莊市人民法院監獄裡的監犯多數是慣偷，而慣偷往往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流氓無產者。在舊的社會制度下，他們是受剝削受壓迫，因而挺而走險的一羣，對於他們，參加勞動生產一則可以使他們學習技術，出獄後有謀生的技能，一則養成他們的勞動習慣和信心，並做到監獄經濟自給自足，減輕國家負担。（自一九五〇年起，監獄已能自給自足。）

現在，監獄裡附設了織布（包括織襪，織毛巾）化學、鞋、鐵、木、瓦、磚、農場等七個生產單位，裡面的技師職員等都由犯人担任。在去年的紅五月競賽裡，僅織布工廠一處就用「帶徒弟」（師徒都是犯人）的辦法培養了下列數字的技術人員：

漿線工人	四人	織毛巾工人	五人
漂染工人	十二人	織襪工人	四人
打紩掏綜工人	十二人	織布工人	九人

通過勞動來看，大多數的犯人優異地表現了久已被壓抑被摧殘的勞苦大衆的性格的積極的一面，他們不僅沒有把勞動當作是負担或懲罰而對之反感怠工，相反的，犯人們都能認識到唯有參加勞動自己才能從新做人，因此，不但學習技術十分認眞，勞動情緒也十分高漲。在去年紅五月競賽裡，每台布機的產量由每日三十五碼提高到五十五碼，在質的方面可以送到天津電染貼牌子。

和勞動緊緊結合着的，是思想教育。監獄裡經常的，有計劃的進行了左列教育：

項目	比重	說明
個別談話	20%	針對各犯的個別情形
思想政治	30%	如新民主主義勞動創造世界等，上課，報告。
時事教育	20%	去年九——十月進行了有關白皮書，中蘇友好，政協（人民民主專政），開國等的教育
墻報	5%	
文娛活動	5%	
識字教育	10%	課本是「工人讀本」及「蘇聯工農故事。」
集體講話	10%	

監獄對待犯人，是和學校對待學生一樣。犯人們都編成小組，有自己的組長。對於悔過情形好的，編入「自治號」悔過情形差的，編作「爭進號」（爭取進步的意思）。自治宿舍在樓上，自治學員參加技術勞動（可以學到技術），爭進宿舍在樓下（光線較差），爭進學員參加粗勞動。宿舍不上鎖，所有的屋子都沒有經過以「監獄」為目的的加工（如鐵窗等，）獄內沒有武裝監視，盡量不使犯人時時刻刻意識着自己是被關起來的犯人，每個人都受到合理的尊重，表現好的犯人必要時甚至還可請假回家。

除自治號和爭進號（這主要是住房待遇）之外，犯人還根據案情輕重，犯案性質，階級出身，悔過表現等條件分為監犯、骨幹、自由差三級，骨幹是悔過較快，表現積極，出身較好的監犯，往往担任小組長或獄內各種工作，自由差是較骨幹更積極的犯人，可以在工廠，門市部等担任自由的職務。根據去年五——十月的統計，它們的比率如左列：

監犯（包括在押犯）	51%
骨幹	21%
自由差	28%

另外，犯人們還有各種組織，所有的工作人員都由犯人中無政治問題的担任。他們有一個診療所，（裡面的一個西醫也是犯人），除了負責診病外，還領導一個衛生小組，每天檢查各舍的清潔衛生，並組織理髮洗澡。——說起洗澡，也有制度，凡是悔過情形好的，洗頭輪（最先下水，水最乾淨）最頑固的，最後洗。——書報室由文化程度較高的無政治問題的犯人負責，除了各種課本外，還備有人民日報和兩百多本各種程度的圖書。供銷社供給日用品，並經售掛麵包子，——這也是由犯人經營，並和保管犯人的錢物結合，犯人入獄時，將錢鈔交給負保管責任的犯人，取得收條後，可到供銷社購物，或在出獄時領回。經營虧盈，監獄完全不管。這樣，一方面可由犯人自己集資購買所需物品（有一定限制）一方面犯人的儲蓄可以「實物保本」，另一方面還可防止有些刁鑽的犯人找藉口誹謗監獄「沒收」了犯人的私蓄。另外還有一個教育組，由在革命陣營裡犯錯誤（不是叛變）的同志担任，負責帶領外出的勞動隊等。

，這一物價漲勢便逐漸減出了常軌，投機性開始逐漸擡入並陸續濃厚，這一階段的物價上漲以十一月十六日達到空前的高峯，當天物價上漲幅度達百分之三十以上，人民政府對於這一次物價上漲的處理辦法，首先是收縮通貨，拋售物資，抽緊銀根，打擊投機，到十一月下旬，恒利、惠豐、通實、共昌等投機行莊，便先後因投機失敗而倒閉，緊接着這一局勢，人民政府便開始加緊對於私營銀錢業的監督管理和取締，使投機者受到了澈底的打擊，使物價重復趨於穩定。

總結和展望

七個月來上海經濟的改造和轉變，已經為今後的上海經濟開闢了新生的大道，隨着解放戰爭的進展，上海經濟的更大好轉已經露了曙光，七個月來上海經濟在反封鎖鬥爭中已經在基本上粉碎了敵人的封鎖，但是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上海經濟在現在還是有着重重困難的，但是這樣的困難已經完全不同於解放初期的困難，在交通方面，由於大陸的全部解放，上海至北京，和上海至廣州的鐵道都已經聯運通車，海運方面，今年的軍事局勢，可以完全相信舟山羣島和台灣的在今年解放，大概是沒有問題，樂觀的看法，上海海運交通的恢復可能不必等待台灣解放以後，工業方面，經過半年來的努力，上海工業有許多已經克服了困難，有許多雖然暫時存在着困難，但是這樣的困難應該是有辦法克服的，半年來的情形，清楚地告訴了我們，重工業的發展和恢復遠比輕工業迅速，在輕工業中民生必需品工業如紡織造紙橡膠等要比消費品工業例如捲煙工業條件好得多，不可否認，上海的工業情形到現在為止還是畸形發展的，許多工業部門無論在機器、勞力、資金各方面都顯得臃腫和浪費，這是百年來帝國主義和封建反動統治的遺毒，但是這一後果必須現在的政府和人民來共同矯正，隨着交通的發展和即將到來的海運的恢復，上海工業無論在原料取給，銷售市場方面都將擴大繁榮，但是內遷工作却還是必需繼續進行，工廠的內遷不僅是對工廠本身有利的，並且是對於整個國計民生，亦是有利的，不過工廠內遷必須有步驟有計劃，「工廠內遷就上海工業的量來講，也許意味着「緊縮」和「減小」，但是這樣的「緊縮和減小」是健康的，應該承認上海輕工業佔全國百分之六十這一比例，本身就是一種病態，是帝國主義所加給我們的恥辱，現在情形完全兩樣了，我們應該有勇氣面向內地發展，最近華東區首屆工業會議在總結了半年來華東公營工業生產狀況後，已經擬訂了一九五〇年華東工業生產的方針和計劃，這樣的計劃雖然以公營企業為中心，但是對於私營企業亦是重要的，因為今後私營工商業必需團結在公營工業的周圍，也需要按照工業生產的新方針而努力。現在將該計劃所決定的一九五〇年度具體任務照錄如後：一、工業部門係以燃料、電力、鋼鐵，為恢復的重點，其餘各業則注重整理和改造。二、按地區，係以山東、淮南為主，其餘地區為輔，上海工業應面向內地加強與東北、華北、及華東其他地區生產配合與聯繫。三、地方工業應以直接輔助農業，加工製造日用品等輕工業為主。四、提倡儘量採用本國的生產品，鼓勵自己製造。五、在維持其恢復方針下，經營上均應走向自給，輕工業尤應在保本自給之餘，還要爭取資本累積。六、在民主管理基礎上改良技術，提高產量，減低成本，逐漸建立生產定額，經濟核算制度，達到生產企業化。七、培養技術員工與管理人員，動員上海技術員工，參加其他地區，特別是東北的工業重點建設。八、加強礦產與水力勘察工作，作將來大規模建設的準備。九、以公營企業為中心，組織私營，逐步走向有計劃的專業分工的生產道路。這一生產方針和任務的擬定，已經給上海工業指出了發展的方向和前途，是值得從事工業的人士鄭重參考的。金融和物價方面，今後私營銀錢業的發展道路，必需協助公營金融事業作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工作，扶助中小工廠，辦理農村貸放，七個月來凡是遵照政府指示從事正當業務的，都得到了生存和發展，凡是投機取巧，承襲過去反動時代舊作風的都受到了應有的打擊，這是最生動的教訓。物價方面，隨着人民勝利折實公債的發行，可以預測今後物價情況一定比去年好得多，在幾次物價漲風中，政府已經獲得了許多寶貴的經驗，投機商業資本在現時雖然還存在着相當龐大的潛力，因此還必需隨時加以警惕，但是沒有了帝國主義和反動政府的靠山，投機的絕路是確定了的，七個月來人民政府已經在基本上打垮了投機活動，殘存的商業投機資本的路只有一條，便是投入生產事業，改過自新，為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而服務，否則便只有被消滅，被法辦。

一九五〇年是上海經濟的轉變年，對於現階段上海經濟的展望，我們可以借用毛主席的話：「有困難的，有希望的，有辦法的」。作為本文的結束。（完）

新建設　雙周刊

第一卷・第十二期

負責人　費　青

編輯委員（以姓氏筆劃為序）

向　達　吳　晗　李廣田
袁翰青　張志讓　費　青
費孝通　聞家駟　雷潔瓊
鄭　昕　樊　弘　潘靜遠
錢偉長　錢端升　嚴景耀

董　事　王艮仲　費振東　潘祖丞

出版者　新建設雜誌社

地址：北京東華門南夾道六十二號
電話：（五）五九六六
上海辦事處：
上海（五）乍浦路景林廬十四號
電話：四〇六九六

代銷處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本期定價每冊二千元

訂閱：
一卷十二期　二萬二千元
二卷廿四期　四萬二千元

東北區　零售每冊東北幣三萬元
訂閱：
一卷十二期　東北幣三十二萬元
二卷廿四期　東北幣六十萬元

東北代訂處　東北各地新華書店

北京市軍管會登記證新字第五十號
華北郵政總局登記證第七十二號
華北郵政總局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CHINESE-LANGUAGE PERIODICALS

TRANSLITERATION: Hsin chien she

TRANSLATION: New construction

YEAR: 1950

NUMBER: 1 - 12 of Volume 2

LIBRARY: Hoover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c., Ann Arbor, Michigan.